

# 目 录

## 首刊前言

- 我的回忆.....云祥生 ( 1 )
- 贺色鲁父子列传.....刘映元 ( 23 )
- 土默特旗保安队始末记..... ( 57 )
- 殷石麟 忆述  
殷梅园 整理
- 忆我在抗日时期.....张希孟 ( 71 )
- 古稀奢谈少壮史.....尹万国 ( 94 )
- 土默特左旗毕克齐镇耶稣教会拾零.....靳 祥 ( 106 )
- 土默特历年编佐的情况.....鹤 年 ( 107 )
- 土默特高等小学校简介.....王奎元 ( 111 )
- 附：文庙官学碑记..... ( 118 )
- 土默川蒙古族人名与蒙语地名考.....苏 芳 ( 120 )
- 蒙藏学校土旗籍学生名单.....孙继祖 ( 133 )
- 小召简史
- 兼述“七大召、八小召、  
七十二个绵绵召”..... ( 134 )
- 王庆先生 忆述  
赵国恩 整理
- 呼和浩特火居道与城隍庙孙氏家族.....孙明亮 ( 146 )
- 道家对联一则解.....边福全 ( 152 )
- 满泰小传.....程景华 ( 153 )

巾幗奇人白大姐.....	张尔杰	( 156 )
记绥远辛亥革命时期的刘会文.....	长 城	( 163 )
回忆灾年当乞丐.....		( 174 )
	陈铁生	口述
	张尔杰	整理
解放前的毕克齐商业概况.....	宿耀武	( 180 )
政协土左旗《文史资料》		
编辑方案(摘要).....		( 183 )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名单.....		( 186 )
政协土左旗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征集资料参考题目录.....		( 187 )
征稿启事		
编后小记		

# 我的回忆

云祥生

## 一、家庭简况

1914年，即民国三年，我出生于内蒙古土默特旗一个人口众多、家业破落的家庭里。父母亲都是勤劳俭朴、忠厚善良的农民。

老家原是大毕克齐村的住户，祖先宗骨多少辈都埋葬在大毕克齐北敖包山脚下。随着满清政府无止境地屯垦土默特旗的土地，在祖父时期赶上户口地，赶着少许牛羊，扶老携幼由原籍迁居中海流。中海流是个草水茂盛的好地方。太祖父森盖甲布，热爱劳动，生活刻苦，辛勤务农放畜，家业逐年好起来。到祖父晚年时，家庭变成吃饭的多，劳动力少，加上天年不好，刚刚兴旺的家业很快就破败下来。

那时我父亲弟兄五人，三俗二僧，父亲为最小。大伯父名叫阿木格，汉名云尚仁，少年时读书，青年时在本旗总管公署工作，中年升任秘书长兼任旗立文庙街书院教师。娶妻二房，生三男二女。二伯父名阿哈达，汉名云尚文，在家帮祖父劳动和管理家业，娶妻二房，生一男二女。三伯父名阿色楞，汉名云尚礼，幼年削发当喇嘛。因祖父和二伯父病逝，祖母申请旗署批准还俗，掌管家业，娶妻一房，生三男二女。四伯父名莫楞太，汉名云尚智，在三伯父还俗娶妻后，也私自离开喇嘛庙到大青山北牧区花尔盖力更招赘一年轻寡妇，生二男一女。父亲名阿咕噜，汉名云尚信，后改名云忠信，青少年时期一直读书，婚后生三男一

女。

自从三伯父还俗掌管全盘家业以来，因他幼年削发当喇嘛，只知供佛、敬神、诵经，不与社会交往，更缺乏劳动知识，所以料理这个人口众多的大家业，每况愈下，以致财务亏空，入不敷出。

到1918年即民国七年春，在祖母死去一周年，这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终于维持不下去了。于是，就请老舅来给分另遗产，经过分争吵嚷了几天，才勉强分开。当时，父亲分得老马一匹，小牛一条，破土房三间，沙质地、碱地三十亩。父亲虽读过很多书，擅书写，但因天灾人祸，妻子儿女拖累，从未离开家庭到社会上做事。

## 二、失去母爱

1919年即民国八年冬，我已五岁，我们村曾经遭受官兵和土匪双重骚扰的灾祸。这次受害最严重的是我们家，当时被害的惨景至今记忆犹新。那是一天大雪纷飞、冰封大地的午后，父亲正在清扫院内的积雪，母亲身怀有孕在屋整理破旧衣被。哥哥受父母之托去舅父家求借未归，姐姐帮母亲整理，我和弟弟在后炕边取暖边玩耍。外面突然“砰！砰！”几声枪响，随着枪声，村里的狗“汪！汪！”地叫起来。这时扫雪的父亲把扫帚扔下进屋告诉母亲：“情况不好，估计军队进村里来啦！”我们全家顿时紧张起来，只见母亲情不自禁地打哆嗦。

旧社会反动统治阶级造成的恶果，使人民群众对军队的来临看作兵进村，犹如狼进院。这是广大群众多年来的总结。因为那时候的军队，是反动统治阶级残酷迫害群众的工具，对待人民群众确实比豺狼还厉害。因此，乡间劳动群众一听说军队进村，就谈虎变色。

进村的军队，说是剿匪来的，身着土黄色军装，人数比村人多两倍。十几户蒙古族小村庄，一霎时变成兵山兵海的世界，人叫马嘶，闹得好象天塌下来。这时，风刮得更起劲儿，雪下得更猛烈，鹅毛似的雪片飞扬，刺骨的寒风卷起雪花冲破了发黄的窗纸，发出凄凉的怪叫声。

在风雪声中，骤然间喊声震地：“站住！站住！看你狗日的往哪里跑？砰！砰！”清脆刺耳的枪声传向远处，使村民们更加心惊肉跳。进村的军队派出警戒，在院内或登房顶，监视村内和院内人们的行动，同时严禁村里人们自由出入。一个军官把部队分开两部分，一部分把全村的大小人从各家户赶出来，集中在当街韩家大院南墙外，三面围起来，用插着明晃晃刺刀的枪口对着群众。一个军官瞪大眼睛威胁地说：“据调查报告，土匪流窜到你们这一带，有的溜进你们村里，有人把土匪窝藏起来啦……谁先交待，否则一经查出，就与土匪一同论罪。快说！快！快！”。

凶神恶鬼般的军官吼叫了一番，群众鸦雀无声。只有一个小孩儿，因在暴风大雪地冻得实在支不住了，呜哇地嚎啕起来，军官立即恶狠狠地骂道：“妈的巴子，谁的孩哭？快把你的狗崽子哄住，这些野蛮鞑鲁顽固不化的畜牲，拉出去统统枪毙！”这时，父亲实在忍不住了，就向军官说：“老总，我们村里所有住户，都是善良的劳动人，他们决不会有包藏土匪的行为，请看在孩子的面上让回家去吧！”父亲的话音未落，一个军官象发了疯的野兽，声嘶力竭地吼叫：“什么人在捣乱？捣乱就是通匪的坏人，给我抓起来！”一声令下，立即跳出恶魔似的五个兵，冲进人群把父亲拉出来，气急败坏地对父亲下毒手。他们拳打脚踢和用枪托痛打一顿后，从韩家大院拿出一丈二尺长的杠子，先把父亲的上衣剥掉，叫跪倒在地，然后把杠子压在父亲的小腿上，杠子两头各站一个兵，手持皮鞭，一左一右“兵！兵！”抽打父亲的皮肉。父亲虽遭如此毒打，咬紧牙关不哼一声。他们逼问父亲：

“何时同土匪勾结？土匪送过什么贵重物品及钱财？你把土匪头儿小九则和他的东西藏在什么地方？如实招供了就放你回家。”父亲对张牙舞爪的军官严正回答：“我是真诚爱国的庄稼人，土匪同我没有丝毫关系，你们没有本事打土匪，却来迫害良民，可恶！可恨！”。于是，更触怒了他们，就把父亲的腰背和两腿直打得青一条、紫一片，有的地方皮开肉绽，鲜血淋漓。

乡亲们看到他们皮鞭毒打父亲的惨景，就象抽打在自己身上一样心痛，他们急切想把父亲解救出来，齐跪在雪地上含泪恳求：“老总，他是个好人，他有四个小儿幼女，婆娘又快生育啦，你们看在孩子与女人的面上，请放了他吧！”但是，群众的恳求不但不予理睬，反而命令士兵把群众拳打脚踢赶开，直到父亲被打得死去活来，不成人样后才住手，拖到雪地里派数名士兵看守起来。

派出去的另一部分军队，挨门逐户地进行搜查：挑柴堆，挖草垛，进屋翻箱倒柜，看见象样的衣物就顺手抢走，说是土匪放下的赃物。在搜查中，把各家户的瓢、盆、碗筷扔满地，米面撒一摊，有的水缸、菜缸及饭锅被打烂。这帮大逆不道的暴徒，借口剿匪窜到我们村里，无恶不作，全村被闹得鸡飞狗跳，洗劫一空，横遭一场料想不到浩劫。

当夜幕降临，官兵并没有搜查到所谓匪迹，却大发一次横财归来，命令部队集合。一个沙哑着嗓门的军官向群众宣布说：

“云忠信是抢劫犯小九则的同伙，我们要把他带回去处治。”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全村伯叔、大娘婶子们又为我父含泪苦苦哀求。可是，他们不仅不答应放人，还骂：“你们这些野蛮的刁民，要包庇坏人吗？”这时，母亲当即从人群中冲出，抱住父亲的腿不让带走，士兵打母亲，母亲不离开，不松手。这时从旁闪过来一个军官，横眉竖眼，怒发冲冠，恶狠狠地骂道：“妈的巴子，这个臭婆娘不想活啦，快滚开！”随即举右脚对母亲肚子狠

踢两脚，母亲“啊呀”尖叫一声倒在父亲足下。

这时，狂风暴雪刮得更起劲了，在风雪交加中，看到母亲被官军毒打得将要毙命的惨景，姐姐、弟弟哭成泪人，我心疼父母无辜遭此迫害，眼泪象泉涌般流在破衣襟上，霎时冻成了冰块儿，而村中的伯叔、大娘、婶子、哥嫂们也都流出眼泪。他们边流泪边在内心咒骂这伙野兽般的“刮民党”祸种，才是名副其实的土匪。这些官兵名为打土匪，而见到土匪老远放上几枪，待土匪把抢得老百姓的财物丢下时，他们却拣来进城出卖了。这次借口剿匪窜来我们村大抢一通回城，既立功又发了财。这不就等于官匪一起勾结，共同抢劫，贼喊捉贼吗？

在风雪严寒的暮色中，父亲经村中几位年长伯叔苦口哀求，终于保释回家。但官军放开父亲还要三堂兄特木尔顶替并强带走了南庄。官军开走后，乡亲们把父亲、母亲扶回家，有的从家拿来姜片、红糖给父母亲熬喝姜汤，驱寒散冷；有的跑邻村拿来黄表纸、白酒和谷草化灰给父亲起血疗伤。在乡亲们热情救治下，父母亲渐渐好转，可是母亲当天夜间小产了。

父母亲被反动军队残害得一冬躺在阴暗冰冷的屋里呻吟。隔壁邻居的大娘婶子们，为母亲身体恢复请医治疗。经过一个时期的医治，父亲被毒打的伤病逐渐恢复。可是，母亲的病，虽服了好多药物，一直不见大效。她面黄肌瘦，眼窝深陷，带着一副愁眉苦脸，乍看见没有活人样儿，人们都替她担心。

冰封雪飘，寒风吹得人们的眼睛都睁不开，穿上老羊皮大衣也抵御不住刺人肌骨的严寒。何况许多人穿着单薄破烂的衣服，哪有不受冷冻的呢？我同弟弟的脚手已起了冻疮，行走很艰难，整天依偎母亲左右苦闷。

飞雪迎春到，天气变暖和了，积雪很快融化。父亲的伤病基本痊愈，他把拐杖已扔掉，能在户外阳光下做一些零星的家务事，这使我们全家人都高兴。可是，母亲的病一直不好转，清明

节前一场大风后，病情更加沉重起来，觉不能睡，饭不想吃，即使勉强吃上几口又吐掉。她说：“被军官踢的地方，肚内长出疙瘩，疼得不能翻身，大概离死不远啦。”

就在这时，不知谁给出了个怪点子说，这是官军引来了魔鬼，小产又冲了家神，可给病人念念藏经，驱一驱鬼，禳一禳神会好的。当时束手无策的父亲就听信了，托人向南庄财主借债几十元钱，从喇嘛洞召一一广化寺请来一位白发白须老喇嘛，给母亲念念送鬼禳神经，反而使病危的母亲不得安宁，因而受到不应有的震动和刺激，以致病情有增无减，死神更加缠不放松。

老喇嘛在家念经送鬼折腾中，除用美酒佳肴殷勤招待外，还给送香烟钱和布施钱几十元，并把母亲出嫁时外祖母陪送的几件较好的衣服和首饰也都骗走了。老喇嘛给母亲念驱鬼经后，说：“妖气降宅，全家有灾。”于是，老喇嘛又继续念了三天平安经。

五月五日这天，乡下人都过端午节。我们家因母亲病重，没有做粽子，我喝了两碗稀粥就赶上小牛和老马，同伙伴们到郊外放牧去。这时，刚出来的白斗林走近跟前向我说：“毕力格，你阿爸叫你赶快回家去，把小牛、老马交给宜昌、正贤、宜敏他们。”

听了白斗林哥的话，我赶快往回走，边走边想：是妈妈病危了吗？老人家早晨还能坐起来笑着说她的病有好转，还吃了一点点面条，并说以后再不麻烦我们啦。我走到村口就听见院内传来的哭泣声。我快步进院，看见左邻右舍的嫂子大娘们来到院里，流着眼泪议论着：“她受了半辈子苦，临死还遭受那么大的灾难，现在一生就这么完结了！”“啊！毕力格回来啦，快进屋里来吧！”

我跨进门就看见母亲直挺挺地躺在一扇门板上，紧闭双眼。哥哥和弟弟，都痛哭流涕地央求：“额吉！您醒一醒，看上我们一眼，同我们说一句话吧！”她（他）们大概已哭多时，声音都



沙哑了。当时，我的心象刀刺，就同哥哥、姐姐、弟弟一起痛哭。实在没有想到，早晨母亲还能吃半碗饭，并有说有笑，岂知这是临死前的回光反照。从此，我们就永远失去了母爱。

我的母亲是国民党反动军队杀死的。这件事，在我们几个幼小的心灵上留下极大的创伤。我万分痛恨国民党反动军队，永远忘记不了这一深仇大恨。

### 三、凄惨悲愤的生活

母亲断了最后一口气，哭得最沉痛悲伤的是姐姐。把母亲的遗体装殓好放进棺木里，停在院内窗前。姐姐每天大哭三次，从东方微明她就起来痛哭一场。姐姐本是很美貌俊秀的一位姑娘，自从母亲去世，她的脸上就象挂着一层煤灰，没有一点儿光泽与润色。她情感变得很脆弱，有些难处就痛哭，稍有不顺意就流泪。她对什么事物都不感兴趣，表现神魂颠倒。当时，我既想念母亲，又同情过度悲伤的姐姐。有一天午饭后，我陪同姐姐哭后赶上小牛和老马出郊外放牧，因一时思想不集中把老马掉进臭水坑淹死。它是我们家当时的主要劳力，也是生活的唯一依靠。性情暴躁的父亲，对我既没有打，也没有骂，反而安慰我说：“不要难受，它自己不想活啦！”我象母亲死去时那样痛哭了一场。

天气又渐渐寒冷起来，可是我们兄妹姐弟几人还穿着过夏的破烂衣衫。穿的鞋是蛤蟆大张嘴露五趾，说是穿的鞋，不如说是脚脖子上的套圈儿。住屋是两大间破西房，虽然烧上火，屋里不比屋外暖和多少。煮饭蒸气扑到墙壁和屋顶上，就厚厚挂一层冰雪，装饰得象水晶屋。说实在的，我们的住屋，到隆冬严寒时分冻得连狗也拴不住。可是，当时我们土炕无席，只有两条破烂污脏的被子，父亲同弟弟盖一条，我同姐姐盖一条，哥哥一人盖一条破毛单过夜，睡到半夜就冻醒，起来披上破被子围一圈儿烤

火。

那时，我们穷困且不安然，债务丛集，如牛负重，旧债还未交清，母亲病中请医吃药、念经和埋葬母亲时又借了新债。因母亲患病，庄稼又没有耕种，五口之家过冬的衣食还想不出办法解决。父亲和哥哥整天整夜在发愁、说梦话。可是，债主对穷苦人是不怜惜的，经常上门来逼债，今天不是毕镇天合店派人来讨债，明日就是铁业铺来向父亲说：“我们主人叫告诉你，借款今年再不能拖欠，务必想法还清，有钱有粮都行，不然要来人拆你们的房。”几天后，南庄陈财主派狗腿子到家说：“我们老爷说，祖银今年本利全缴，如果不愿交，就叫你大儿子给做工顶债。”真是“债主上门，两眼鸾铃，不是图钱，就是谋人。”

父亲是个勤劳勇敢，性情耿直的人。他长期养成一个脾气：“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哪怕三天不吃饭，宁肯勒紧裤带也不轻易向人张嘴求告。他老人家觉得轻易求告别人，比被人在脸上打两巴掌还难受。当时，我们没有应付债务和困难的好办法，家里只有一头小牛，而小牛在老马淹死后就是我们家唯一的畜力。小牛比我小两岁，却比我高一头，夏秋两季吃得滚瓜溜圆，紫红色的皮毛引人喜爱。他接替老马已能帮父亲和哥哥犁田拉车了，是全家人的命根子。

父亲因债务和生活问题，苦闷了一秋天，最后下定决心，硬着头皮准备忍痛把小牛卖掉，给各债主开付债利和解决一部分过冬的衣食。可是，万没想到南庄陈财主早就把小牛看在眼里，谋在心中。一天财主儿子陈三领着三个狗腿子踢门冲进屋里，脚蹬炕沿，眯缝两眼向父亲说：“早给说过了吧，今年本利要交清，准备好就送去，你不送去，我们来收取。准备好了吧？今天我们特来取钱要物，你把准备好的钱拿出来让我们好走，如果不愿交钱，那就叫你儿子跟我们去做工顶债，你有什么意见？”

父亲沉默了片刻说：“今年我家里人闹病，女人去世又多化

了钱，庄稼没有耕种好，实在无力还清。你们收回去还是给别人放债吃利，我今年只付利，来年想办法全还清吧。”

财主儿子陈三听后，睁圆双眼，提高嗓门说：“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每年有个来年。不行，今天就要你还清。你说无力还清债，又不愿让你儿子给我们做工顶债。你无力还清，你们怎有办法吃饭？你老狗不老实！”随即提起文明棍儿，就把我们的饭摊子打翻，豆腐糊糊流下半炕！父亲和财主儿子陈三讲理：“你们有钱放债吃利，我答应付利，你们要本利还清，我今年无力全清，而你们上门来就发野蛮欺负人！”

“蝎子的尾巴，阴沟的风，毒蛇舌头，地主的心。”财主儿子陈三就象疯狗似地更加野蛮残暴、拧眉翻眼说：“野蛮你怎么样？你不快还帐，还硬嘴顶你爷爷！”就举起文明棍儿“啪啪！啪！”把父亲打得鼻口流血！待父亲向财主儿子陈三扑去拚死时，却被一个狗腿子使了个眼色，就把财主少爷陈三拉出门外，顺便把拴在院门外的小牛强拉走了。父亲要追去往回夺小牛，经哥哥姐姐才劝住，我们同父亲站在院门外望着那被夺去的小牛，伤心地叹息而已。我同弟弟情不自禁地带着哭音向父亲说：“阿爸，用我保小牛换回来，帮咱们耕地拉车吧！”说罢，我就失声痛哭起来，父亲也不由得流出伤心的眼泪说：“孩子不要哭啦！这个鬼世道，穷人是被欺压得没有法活下去的，要有志气记住这个仇恨！”

由于生活和债务的重压折磨摧残，使父亲衰老得很快。本来是将近四十岁的人，头发就全变成银色。额头象风吹湖面，皱纹犁犁道道乍看就象七十有余的老头儿，腰背也有些驼了。但父亲为抚养几个儿女长大成人，每日照常带领上大的儿子积极进行生产劳动。旧社会的海流村地板不好，是个瘠薄落后的地方。老马水淹死，小牛被债主拉走，父亲为了生活就只有给有钱人揽工放牧或利用农闲季节刮碱土积存燃料生产土盐度日。

生产土盐这种劳动法，不仅苦重，而且困难也大，不注意灾祸常出现。首先把燃料和碱土准备好后，必须到盐务局领取生产执照和交纳了盐税金才能生产。如果事先没有领取生产执照和交纳盐税金进行生产，而被盐务局的盐警缉私队查获，轻则被打骂后罚款，重则就被拉去蹲监坐牢。

我记得1927年（民国十六年）春，三月的一天下午，阴沉沉的天色，刮着大黄风，风卷沙尘和碎草叶四处飞扬。有十几名饿狼似的盐警缉私队穿着青布服装，各骑一匹马，身挎长短枪，冲进我们村里查禁贩卖私盐的。他们下马后，把村里的小孩子抓住叫溜马，一把马交给小孩儿，他们就象发了疯的野狗挨门逐户进行搜查。借口搜查私盐，进屋乱翻腾，有的还调戏妇女打骂男人。如我们邻居韩秃圪赛的女人和韩纳森的女人，因一只鸡的事先吵骂，后就打起架来，正遇上盐警缉私队进院查私盐，盐警缉私队两名队员以调解为名，趁机分别把两位妇女叫进屋里谈话，抬手动脚地企图强奸，两位妇女当即反抗，而两个流氓盐警未有得逞。但盐警缉私队员恼羞成怒，反口污蔑两位农村妇女调戏他们，把两位妇女打得脸肿鼻青。有人看不过说了几句不满意的话，也被痛打一顿。

这次查私中，韩益力盖、韩乌力塔、韩四十九、刘秃车、刘六十五等把盐警缉私队的赵高升和刘凤岐队长，请到家给包饺子烙馅饼、炒鸡蛋、喝烧酒等殷勤招待外，还给送了出差马工费和鞋袜钱。因而被表扬为守法模范盐民，虽到家各处查看就无事过去了，父亲和二堂兄纳木吉勒自以为领有生产执照，并交纳了盐税金理直气壮地进行生产，因而对赵高升和刘凤岐等，到家查看时既没有殷勤招待，又没有给送马工出差费和脚步钱，结果就惹恼了赵、刘二队长，他们找茬儿无事生非，当即叫来盐警缉私队员们，把父亲和二堂兄痛打一顿之后，要带走送县衙门问罪，经村中的叔叔大爷们再三说情，各罚现大洋三十元才算了事。

父亲平白无故被国民党反动警察毒打之后，心情本来就不好，可是又惨遭盐警缉私队以违犯法律与超时限的莫须有的罪名毒打并罚了款，这样的折磨使父亲一下就病倒了。哥哥借车拉了一部分盐出卖，给父亲买药看病和换些粮食糊口，走了十多天未回来，他走出时家中只有几升高粱，眼看就要断炊。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和姐姐叫我背一些盐出去换些吃的。当时我就背了三十多斤盐，先到红岱东西村走街窜巷叫卖了两个小时，但既没有人问，也没有人要。实在使我灰心丧气，于是就背到别村去叫卖。下午四点多钟，我走到得力素村，边走边叫卖，从村南口叫卖到村当中，从路北一家楼门院里冲出很凶猛的两条大黑狗，一前一后绕我身转圈圈儿，因我背绳拴在身，盐袋压着背，前来的狗只能用脚踢，不能用手打，而背后转过来的一只狗咬住我的一条腿使劲往后拉，我支撑不住就摔了个仰面朝天，两条狗齐上来咬，我当即大喊大叫，“啊呀，来人快打狗，狗咬伤人啦！”

霎时，我的破棉衣服被扯得更破烂，撕得条条缕缕，皮肉被咬得鲜红流血，两条恶狗还继续在咬，鲜血继续在流，我继续在喊叫：“狗快要咬死人啦！人来快管狗呵！”这时才从路西破门里跑出约五十多岁的一位老大娘，她先把狗打走，返回来很同情关切地问我：“咬得厉害吧，快起来走走！”我说：“您的狗把我咬成这个样子，我走不了，盐卖不出去，我家里人要病饿死的，大娘您给我想办法救救我全家人吧！”说罢我放声大哭起来。

我痛哭流涕，感动得大娘也流出眼泪来，她叹了口气说：“孩子，咬住牙，擦净眼泪，不要哭啦！我给你说，狗不是我家的，是北门院财主家的，我在屋收拾破烂中，听到哭叫声和狗咬声，跑出来帮你打狗的，看你被咬成这样，怪可怜的！我扶你先到我家喝一口再说吧！”大娘随即扶起我，又帮助把盐袋抬上领到她家，先烧开水给我喝了碗，给吃了个窝窝头，从外面找来半块儿

砖，端来一盆凉水。她找来一个小板凳儿坐下，边给我消毒疗伤，边盘问我的家庭情况。大娘皱了皱眉头说：“噢，你是王毕克齐村王家的外甥子吧！我去年去你家买咸盐，在你们家吃过饭，你父亲可是一个公道又热情的少有的好人！你父母都身体好吧？”大娘一面赞扬父亲公道热情办事的好名声，一面给我治伤，这时不禁引起我思念母亲流出眼泪哽咽着说：“母亲已死去五六年啦，父亲和姐姐现在都在病中，哥哥进城买药和买粮走了好几天不见回家，家里一点吃的东西也没有。所以父亲叫我背盐出来换点儿吃的。我的盐卖不了怎么回去呢！”我伤心地又哭起来。

大娘问清我的家庭情况，她也流出同情的眼泪说：“孩子，我已说过，咬你的狗是财主家的，他们在村里留下一个看门喂狗犛老头儿就全走城里去啦。而我是个寡妇穷老婆儿，光景不甚好。听了你们家的情况，比我家还穷苦，唉，家穷没办法，饿罪难受，你把咸盐给我倒下，我给你装上五升糜子，一斗硷荬（盐蒿）籽行不？”

听了大娘叙述，并答应给我解决问题，我高兴地说：“我完全同意大娘热情的帮助，并感谢大娘的好心。”这时我感到狗咬伤痛，经大娘医治大为减轻。当即我忍着痛站起来，把盐给大娘倒在缸里，大娘从土仓里给我装了珍珠似的五升大黄糜子，一斗黄绿色的硷荬籽。当时我噙不住感激的热泪象断了线的珠珠滚到破衣襟上，我跛着脚忍痛背上糜子和硷荬籽，回到了家。

出了得勒索村，日早落西山，瑰丽的晚霞染红了大半个西天。用盐换粮遇上好心的大娘帮我解决了大问题。我高兴得不感觉天黑一人行路孤单，把狗咬的伤痛也忘记了。我走至海流北庄西边时，晚霞早已消失，夜色象墨染似地漆黑，田野无人，只有天空的繁星闪射着光亮的小眼，送我回到家院。

弟弟早入梦乡，父亲和姐姐还没有睡。姐姐听见叫门声，点着灯给我拉开门，在灯下看见我背回的袋子比走时重多了，已知我把盐卖出换回来粮，她就高兴地嚷开了：“毕力格有办法，我们正在发愁天已黑啦，还不见你，你走什么地方去来？你怎么这样晚，腿也拐啦！路上摔跤了吗？”

我就把卖盐换粮的情况细说了一遍。听后，父亲感动地说：“你受苦受惊了，但不幸中有幸，遇上了好心人，天下哪也有好人，穷人爱穷人。”

我们因老马水淹死，小牛被财主拉走，家里穷困得不怕贼偷老鼠盗，只靠收积碱土淋碱水，拣柴拾粪熬盐出卖维持生活。劳动中衣服和鞋袜被洒上的盐水渍得很僵硬，破烂了父亲给缝补，钢针一下扎不进去，就用指甲顶针管。有一次父亲补破袜子，把针管倒顶进指甲盖里痛得父亲额头上冒汗，父亲忍痛把针拔出鲜血随即冒出，把父亲的手全染红了血。钢针扎进父亲的指甲里，痛在我们的心里，特别是看见父亲血染红的手，我们就想起父亲被国民党反动军队，以通匪的罪名打得遍体鳞伤，母亲被匪军官脚踢倒，倒在雪地里休克的情景，就抑制不住情感痛哭起来。但父亲故作镇静地说：“不要紧，针扎了一下没什么，针火不伤人。三国时有个叫关云长的，中毒箭后，叫华佗医生给他刮骨疗毒呢！不要哭啦，你们快烧些棉花灰给我止血吧！”

父亲在平时或逢年过节，看见我们思念母亲苦闷伤感时，就是以讲故事或说笑话的方法来转移我们的苦闷情绪，直讲到我们高兴快乐起来为止。

## 四、父亲的为人

父亲念了好多年“四书”、“五经”，文化程度是比较高的，并且还有一笔好字，一手熟练的珠算。有知道父亲底细的好多朋

友，多次上门要求父亲办个学校，教育他们的子女。这样既能挣钱，又能抚养孩子。

但是，父亲不愿离开自己的孩子，去寻求轻闲与清静。他对来要求的朋友们说：“我的脾气不太好，性情暴躁，知识又浅薄，教育不好你们的孩子。文化程度不高，能力不强，肯定把事情做不好。如果硬要做力所不及的事，那么就会耽误你们孩子的前途，所以我是不愿去办学教书的。”

还有些好心的朋友和邻居弟兄们，常到我们家，同父亲聊天，在谈论中向父亲提说：“老弟，我们看到你这个男保姆，一天太累太辛苦了。你拉扯上一个老伴，一方面帮你烧茶煮饭，缝烂补纳，另一方面帮你搞好家庭生活，减轻你的负担，这样几方面都有好处，请你认真考虑，千万不要固执。”

“感谢你们的好意，根据我的实际情况，我是不愿离开穷家庭的。我家的实际情况是：家景贫寒无有钱粮，不允许添人进口增加负担；有几个苦水中泡大的不成器的孩子，如娶上贤良的还可以，若娶上个心地不贤良的，虐待他们，到那时我是要老伴呢，还是要子女呢？要老伴儿就要抛弃子女，要子女就得赶走老伴儿，要是那样，就不如不办好。再说，没有老伴儿，虽然多受些劳累，但心是一条，劳动完了同孩子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倒也轻松自在。”

父亲同邻居朋友谈论中，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了一位老头儿。高高的个，留有二络胡须，容貌端正，举止文雅，言谈有理。他穿着青布大褂儿，头戴瓜壳儿帽，眼戴一副墨镜，操着南方口音，自我介绍说：“我是落地举子，是三代帝王齐复藻的后代，名唤齐国万，会写梅花篆字等等。”他手里拿着两张纸，上面画着喜鹊登梅和驴驮寿字的丹青画图。

中午，齐国万想在我们家吃饭，当时，是山药蛋谷米粥就腌菜。父亲打量了他一番，简要询问了来历，就同意给他吃饭。饭



后，齐国万要把那驴驮寿字和梅花篆字画送给父亲，而父亲却说：“你吃饭我不要钱，关于你的书法珍品，我穷家薄业，是欣赏不了的，再说，我这茅庵土屋连个摆放的地方也没有，你快拿到别处卖去吧！”

齐国万不听父亲解劝，硬要把驴驮寿字梅花篆字画赠送父亲，并且说：“我看你是喝了不少墨水的秀才，因时运不至，落地务农了吧，我们见一面不容易，这是千里有缘来相会，交个知己的朋友，你把我的笔墨留下。”而父亲还是再三不要，齐国万坚决要送，经过两位老人的再三推让，把个驴驮寿字画扯成两半儿。齐国万愣怔在旁，目不转睛地凝视他的破烂寿字画。父亲看了齐国万表情说：“我说穷家薄业，欣赏不了你的珍贵物品，现在扯成两半儿，哪如你拿去卖给识货的富贵之家多好啊？”

齐国万如梦初醒，抬起眉头：“唉！确实可惜，可惜！”随声把扯烂的驴驮寿字画，收起来折好，拿在手里，抬头望一望天空。低头观看四周，好象有什么心思急欲表白似的，但不言语，呆在房门前动也不动。

父亲是一个爱贫怜弱的人，看见齐国万的欲哭似哭的可怜相，就把刚卖盐的一元钱给了齐国万，并装了二升米送走。想不到齐国万得寸进尺，一月后又来我们家，带着一副愁眉苦脸奴婢相，恳求父亲给他找一个冬季教书度日的地方。父亲心软意慈，经不起三句好话磨缠就答应齐国万暂住在家中，他却去南庄走西村打问了十多天。齐国万在我们家吃住了十多天，我同哥哥、姐姐伺候他十多天，可教书的地方没有寻下，而齐国万对父亲就不高兴起来。他认为父亲走村打问，是敷衍塞责欺骗他，不够朋友的品德，而就想办法寻隙讽刺父亲，他说：“繁忙周村转，日出日落返。不知君何事，闲去复空还。轰雷闪电驶，无雨不过关。一连十数天，使吾心不安！”除此之外，齐国万早注视到我们住屋迎

门墙上关云长肖像两边贴的对联：“鸢飞欲穴地，鱼跃海中天”。曾向父亲说：“老弟！我看你墙上这对联词意太旧了，我给你换写上新词做为留念。我们相认后，感到你这个人很厚道，为人克己，我愿同你交个知心朋友，以换写对联做为我的纪念品。”

父亲说：“破烂家庭，烟熏气打不需要。”而齐国万坚决要给换写。紧说慢说就把他的黑布挎包打开，取出文房四宝，研墨换写新词对联：“等暇读书必难读，待余救人总无救”。新词对联写好后，齐国万叫哥哥把旧对联取下，换贴上新词对联后，齐国万偏过头向在炕上吸烟的父亲挑衅似地说：“老弟！你看新词对联如何？词意新鲜吗？笔墨均匀吧？”

曾念过十多年“四书”“五经”有相当文化水平的父亲，对齐国万要给写新词对联的用意全已了然，在炕上早就不高兴地狠抽着烟，因而，待齐国万写完贴出后，征求之声一出，父亲憋在肚里的烦火一下就爆发出来了，他怒目相视地质问：“你写的新词是什么意思？你给我解释解释？我看你是个穷秀才，以窜乡卖墨维生实是可怜，我以同情款待你，可是你吃下我熟的，拿上我生的，我儿女侍候上你，你却不知足，饱饭生余事，居然舞笔弄墨讽刺人，藐视人，疑神疑鬼，你实质是不识抬举、没有良心的东西！快拿上你的东西走起！”

齐国万当时张口结舌地说：“有——有——亏！有亏！”“人贫志短，马瘦毛长，我走，我就走。”父亲听后，更生气地说：“你少说废话、少放毒！赶快滚！”

是年深秋气候温暖，各种庄稼全已割倒，农民们正集中车马人力往场上拉运。而“天庆源”、“大盛魁”等大资本家和商驼，又来到我们村放牧抓膘，刘宽海和刘秃车等几家揽放了几大群。因而，畜粪很多，穷困人家有少许庄稼放在禾场上顾不得碾打收藏，就带上女人娃娃起早贪晚忙拣畜粪，为生产土盐准备燃

料。在这期间，哥哥和父亲非常繁忙与辛苦。哥哥专门拣畜粪，一天能拣十几大筐，已积存下一大堆，晒下一大片。父亲是利用早出晚归的时间收积碱土，已收刮下二十多车，有的已担挑到村边淋盐水池跟前。他们为此，在茶余饭罢或休息时喜笑颜开地谈论着，好象得到什么珍宝那样高兴。

的确，生产土盐度荒年或维持穷困生活，是一条较好的出路。早晨点火开锅熬煮，晚时就见收成。有盐就有粮和钱，不愁吃和穿。所以，父亲和哥哥把碱土和燃料准备好，又经商量先把少许庄稼碾打收藏，提早进行土盐生产抢卖高价。

二堂兄纳木吉拉同父亲打的一样的算盘，因而前禾场，我们铺开糜捆子，噼哩啪啦地打腾着，后禾场上二堂兄把谷穗头摊开，用马拉碌碡一圈儿一圈儿地碾压。时过中午，两边黑云慢慢阴上来。随即狂风卷着黄尘和碎草叶猛烈地刮起来。这时，那些休息和闲聊的人们就忙乱起来，有往家收晒粮的，有抢柴的。二堂兄回家吃饭去，二嫂替二堂兄来碾压，二嫂想在大雨来前把碾压的谷穗头收拾起，就把马卸掉叫小儿子拉回去，当时二嫂四处寻找接耙，而我正用她家的耙子，二嫂不知我用她家的耙子，找不见就喊叫起来：“谁拿走我们的耙子？快给送来！”但没有接应，于是她就发怒气骂开了：“谁拿走你祖奶奶的耙子？驴×堵住耳朵听不见，装着死猪不言语，快给你奶奶送来！”骂得实在难听刺耳，嗓门高，三里方圆都听得见。今天在公共禾场收打庄稼只有两家，这分明是在骂我们，但她不指名道姓。而父亲听见骂声后，就问我：“毕力格，你是借用谁家的耙子？是不是你二哥们的？是就赶快送去！”

二嫂在村院里是有名的厉害人，谁也惹她不起。如果不注意侵犯了她的一点儿利益，那你就不能太平，她要同你吵个没完，骂个不休。二哥是个没本事又胆小怕事的人，身体虚弱劳动不强，就常受二嫂的气。二哥出外办事如果办不好或办不成回到家，轻则

要挨二嫂一顿臭骂，二哥曾经挨过打，还给二嫂下过跪，因而二嫂名扬四海，人们叫她母老虎。我对二嫂欺负二哥曾有过打抱不平，今天借机想气她一下。因此，我没有回答。我也没有听见父亲让给二嫂送耙子，任她扯开嗓门骂去吧！骂的不疼，烂了喉咙，再想骂也不能。母老虎向来是骂够了，骂烂了喉咙，就不骂啦。

这一下使矛盾激化，战斗锋芒直接引来。二嫂睁圆双眼挺起头，手叉腰，放大嗓门更加恶狠狠地骂起来：“你是个野圪泡，你拿祖奶奶的东西，只管自己舒服地使用，眼看大雨来，你不管别人死活，顶上脸不给奶奶送来，我几次喊叫要耙子，你驴×塞住耳朵了吗？你说，母老虎吃过你们的肉，喝过你们的血，还是搞过你们哪一个人的心肝？你要逞凶，就来碰一碰你祖奶奶，你不敢碰就不是人做的……”

因平素我对二嫂有偏见，就以挑衅的态度来回答：“借用迟送一会儿，你就立嘴伤人，不分老小一起骂个不停！这是你们祖宗传教下来的吗？谁的耳朵驴×塞住啦？谁是个野圪泡，你是货真价实的母老虎，你看爷爷把你这个狗头敢打烂不？”随声我把搂耙冲二嫂头上空“嗖”扔出去，吓得二嫂慌忙蹲下，贼眉鼠眼地瞅着我。而没想到，我一时感情冲动，用力过猛，就把搂耙子从空中摔下来，几根耙齿全被折断，谁也用不成了。但此刻大风仍呼呼地一个劲儿地刮，风里还夹着雨点，噼里拍啦地乘风洒下。父亲看到这冒失的举动，火气就爆发了，他骂了一声“不争气的狗东西”，就把手里的扫帚翻过来从我髓骨上“啪，啪”地狠打了两下，结果扫帚把打成两截。老人家拣起后半扫帚把边追边打骂我：“闯祸的东西，我非打死你不可！”

我们在场里的吵骂声，惊动了家院里婶子大娘们，她们都跑到禾场看热闹。有的挡住发怒的父亲，解劝说：“你五叔，气消一消吧！不要追打啦！我侄儿刚回来几天，原谅了他吧！”有的帮我给二嫂消气说好话：“他二嫂，你不要气啦，大不记小啦，

看雨越下越大啦！快起来收场去吧！”

经过同院的婶子大娘们的劝解，二嫂的气消了大半，就忙收她的场了，而父亲的气一直没有消下来，只是有婶子大娘挡住打不上我，但坚决要把我赶走远离家庭去。

父亲的暴躁的脾气，街坊邻居都知道，一旦发作就象毛草火似地一时难扑灭，于是婶子大娘也不敢轻易把我领回家。在这种情况下，我后悔自己做事单纯幼稚，冒失蛮干惹下一场不应有的祸端使父亲伤感生气，这是不忠不孝的具体表现。自作自受，我只好到村外废土堆里躲避，等待晚饭后父亲气消失后再回家。这时风慢慢地小了，然而雨越下越大，我的衣衫已快湿透，在外待不住，只好转到村西关帝庙里避雨。

进古庙神房，我站在当地环视端坐的关云长和立地两边的周昌及关平塑像后，回想一天经过的情景：偏激的情绪，使我冒失做错了事，使父亲生气不原谅我被赶在野外，我怎么办呢？到哪里做什么事呢？越想越苦闷，我认识了自己的欠缺，下定决心不离家，不能离开哥哥姐姐、弟弟，更不能离开费尽心血抚养我的可爱的老父亲。他老人家为我长大成人历尽千辛万苦。他严格的管教，是为我尽快改去错误向好的方面发展，这种打骂是恨铁不成钢的做法，从内心是关心我疼爱我的。我既然做错了就应该诚恳地接受教训改正错误，于是搬人说情，请求父亲宽容我，把我留在他身边教育我。

我想到这里，在庙里就觉得烦躁得呆不下去，欲回村，请人给我做父亲的工作。父亲在村里他最信任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村西头住的嘛尼，他是“单府”的后裔，我大姑母的独生子，同父亲同窗读书十多年，感情比较深。嘛尼年老不能独立理事和生活，祖父母就把他接到我家抚养。表兄嘛尼比父亲大两岁，在生活中是父亲寝共床，食共桌长大的，相互情感深，他性情也刚直，为人忠厚，大胆勇为，并很有才学与见识，所以父亲信任

他，并彼此相处得很好。另一个是邻居韩四十九，同父亲是舅姑表弟兄关系，他性情温和很有智谋，遇事沉着冷静，办事周全。因而，村里凡来官差征收勒索之事，全村都委托他应酬办理，村中人们有些矛盾纠纷亦请他调解说合。因而村里公认他有韩信之才的办事人员。而我要求父亲宽容我的说情人正是嘛尼表兄和韩四十九表叔。我离开关帝庙，在漆黑夜幕里，雨沙沙地下着，我深一步浅一步地走到村西头嘛尼表兄家。

表兄走山后收秋储藏未回来，家里只有表嫂和表侄们，我进屋，他们正围坐在一起吃晚饭，我侄子很热情地说：“叔叔快上炕吃饭！”我说：“泥手泥脚地就在炕沿边坐吧！”表嫂给我边盛饭边问：“你走哪来，衣服湿成这个样子？”

我抬头看了表嫂一眼，接过饭碗叹了一口气说：“今日下午同二嫂吵骂了一仗，把搂耙叫我摔坏啦，当时激怒父亲把我打了一顿，还把我赶出门外，再不让我回家，雨下来了，我顶雨到关帝庙，一人有些怕，就跑到你们家。”说完我热泪盈眶说：“真不要我啦！我不知怎么办呀！”接着表嫂说：“收起泪吃饭吧！吃过饭我送你回去，不会赶走你的。”

吃过饭，表嫂把碗筷收拾完毕，拿上雨具领我回家，从屋里灯下出来，天色更黑得什么也看不清，细雨嗖嗖下个不停，我们俩在泥泞的路上东倒西跌地走回家。正好二十家姑夫也来到我家，我同表嫂进了屋，看见父亲同姑父对坐着，面前放着一碟盐菜和一盘炒豆芽，一小壶白酒两个酒盅。边谈边喝酒，姐姐在灶前忙着煮面片荷包鸡蛋，看见表嫂进来忙把手里的活放下向表嫂打招呼问好后，父亲和姑父也让她坐下，表嫂坐在炕沿边，我站在表嫂身后近旁。而父亲看了我一眼，喝了一口酒说：“你倒有办法，雨夜搬兵，请来一位大人物。可你的过错，谁也不能包涵代替的。”

接着表嫂就说：“五舅，不要生气啦，我兄弟们从小就很

苦，他做错了事，管教管教是应该的，叫他今后注意再不要做错就好啦！在这阴雨天，您把他赶出去到哪里呢？如果出了问题您就后悔心疼了。”

父亲喝了一口酒说：“你说得对，我同意你的说法，老虎再凶也不伤子，何况我是个人呢？你五姪去世后，我艰苦劳作，俭衣缩食，还不是为了他们长大成人吗？可他的强脾气不改，我是不原谅他的，今日下午在风交雨来时都在忙场，因使用耙子此事就同他二嫂吵骂起来，进而把人家的耙子摔坏，这还了得，这怎能使我不生气呢？怎能不好好地管教他呢？”

父亲的话音一落，姑父接着说：“管教，我完全同意你的，不过你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可你在大雨天把他赶在门外，这样做就不太妥当，我不同意你这种教管办法的。”

“什么教管妥当不妥当，谁象你教管儿女小时不补到大尺五。对儿女在小时爱如掌上明珠，顶到头上怕掉下碰烂，含在嘴里又怕热气化了。因此，做错了，你不教管，也不打骂，他就上房搬砖撂瓦。结果呢？他长大成人，不听老人的话，不懂事理，进而蛮横不讲理，游手好闲，爱吃懒做的二油腻，被坏人引诱走上犯罪的道路，死无葬身之地！而你把我大外甥，不就是养而不教的结果？那不等于害了他吗？”父亲就这样带生气地批评了姑父。

时已到深半夜了，细雨淅淅沥沥地继续下着，檐流水齐唰唰萨啦啦地流着，两位表侄关心母亲的安全，顶着雨找上门来，表嫂站起来向父亲和姑父告辞时说：“五舅，我的孩子找我来了，我该回去啦。天晴后，您同我五姨父去我家吧？我请求您，对我表弟再不要难为他了，原谅原谅他吧！”

“好的，你既是个热心人，又是一个贤良的人。你为表弟的事，在雨夜里，踏着泥水来往够辛苦啦！我钦佩你助人为乐的精神，我一定听你的话，看在你和你五姨父的面上，再不打骂他

了，希望你放心，领孩子们回去休息吧！不过我还有一句话你可记住，你也有五个孩子，可不能爱过头，他们做错事不管教，导致害他们一辈子。”

雨过天晴，空气新鲜，经过两天风吹日晒禾场干硬了，庄禾又能碾打了，父亲同哥哥抓紧时间把所有的庄禾全碾打完，粮食贮存入库后，父亲进城到盐务局领取土盐生产执照，付纳了盐税金回来，就开始生产土盐，全家人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劳动，把积存下的碱土全变成了盐，这时正是城镇乡村各户腌秋菜的季节，用盐户带上钱和粮到我们村买盐，买盐的人络绎不绝，象赶集似地热闹，我们生产出来的盐，很快卖完了。盐换下杂粮十来石，卖现款三百多元。这一回，我们的光景一下就好起来了。不仅还清了债利，换了冬衣，留足口粮，买了一匹马，还给哥哥办了婚事。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刘鸿军



# 贺色奋父子列传

刘映元

从辛亥革命前后，到抗日战争期间，此一中国历史重大的变动阶段，土默特旗涌现出好多不平凡的人物。除了为无产阶级解放而献身的先驱前辈，和致力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志士仁人，在封建官僚与旧知识分子这个阶层中，亦有不少为维护民族利益作出贡献、和因抗敌救国而流血牺牲的名门望族，也都应该载入地方志书史籍。沿着大青山由东向西排列，第一家便是呼和浩特郊区西把栅村的贺家。由于贺家不仅出过民国初年绥远特别区唯一的蒙古族国会议员贺色奋，而且出过土默特旗第一个留学日本的贺云章、以及仅有的几个国立大学毕业生中的贺耆寿。他们父子三人的经历，正是代表了清末到抗战结束以前，土默特旗四十多年的社会发展动态，和同一时代的人由于受家庭的影响和认识的局限所走过的不同政治道路。

## （一）由牧马人变为佐领

贺家是从贺色奋开始发迹的，在他以前的贺家的祖先都是放马的牧人。清朝光绪初年，归化城南和绥远城东，除了高亢地被汉族农民开辟为农田，下湿地还是成片的草场。那时从外蒙赶回的牛羊，由新疆卸下货物的骆驼、晋陕鲁豫在归化城购买的马匹，全在城南城东的八拜、碾格图和西把栅村等地放牧养膘，土默特“都统衙门”征收小草捐税，附近不会种地的蒙古人借给客商放牧牲畜维持生活。贺色奋的祖先揽的是马店给介绍的马群，冬春夏三季每天有十匹八匹马送来，等到秋高马肥以后，才成群

赶进杀虎口或得胜口往内地各处贩卖。贺色奋的祖先终年披风顶雨，昼夜放马，生活非常艰苦，他从小就是光着屁股、在不备鞍鞴的马背上长大的。

农田侵占牧场，牲畜破坏庄稼，农田和牧场间的矛盾，常使蒙汉人民为之发生冲突。有一年贺色奋的父亲放马不慎，马跑到西把栅村北的徐家沙梁，吃了城东恶霸地主徐福安祖父的田禾，被徐家沙梁的村社派人将贺色奋的父亲捆在龙王庙的露明柱上，遭受了一顿黑牛皮鞭痛打，还赔偿了庄稼的损失。。贺色奋的父亲对此气恨不过，想到“都统衙门”告状，按照《大清律》和《理藩院则例》的规定，归化城的厅官都不能处罚蒙民，小小的徐家沙梁村社私立公堂拷打蒙古人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本村的一个蒙古朋友劝告贺色奋的父亲说：“你打官司也不顶屁事，章盖（佐领）和百什户（领催），都被汉族的老财们‘喂熟’，和他们站在了一起。到了堂上他们也不给你说好话，‘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我看你是天天告状呀，还是给人家放马呀？”贺色奋的父亲虽然觉得这话很对，可是因心中愤怒难消，便到处求人问计，有一个汉族老乡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应当暂时忍耐，只要你的儿子能住进衙门，顶上个一官半职，非只徐家会向你认罪，就是蒙古的豪强也再不敢把你欺凌。”贺色奋的父亲一听这话很有道理，便决定节衣缩食，供养儿子读书识字，住进衙门给自己争气。

土默特部的蒙古人，在清朝受民族压迫，大多数被归化为顺民，当然不敢单独挺身出来造反。贺色奋的大儿子贺建邦和已故的内蒙古文史研究馆馆长荣祥，和早已死去的土默特中学校长孟学孔（毕克齐蒙古人、现呼和浩特政协副主席孟绍的父亲）、与现今健在的九十四岁的内蒙古政府参事室参事赵国鼎，都是归绥中学最早丙班分为一二两班的同窗。贺色奋是稍晚于荣祥的父亲都格尔扎布与任秉钧的祖父诺蒙格呼勒（字九如）的同时代人。那么

贺色奋的父亲因受凌辱而让儿子发奋学习满蒙汉三种文字以求仕进，是在一八七五年至一八八五年的清朝光绪前期，其时康有为还没有主张君主立宪，孙中山先生（一八六六年生）尚未掀起推翻清朝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浪潮。贺色奋的父亲只有“望子成龙”来解脱自己受欺压的处境。

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于一六三二年（明崇祯五年，未改成大清的后金天聪六年）把土默特部征服，将明朝所封的世袭顺义王取消，把土默特部分裂为左右两翼，每翼设立六个参领（甲浪），参领下编成五个佐领（苏木）。两翼虽由平民出身的部长担任世袭都统，但由满族人所任的副都统指挥一切。因为土默特部不象其它蒙旗那样※，没有成吉思汗子孙世袭的扎萨克（通称为王爷），所以台吉（贵族）的势力薄弱，两翼六十个佐领官（章盖）中，一半是包括台吉在内的“世管佐领”或世袭“勋旧佐领”，一半是平民推选的非世袭“公中佐领”，从六十个佐领中，产生十二个参领（噶兰达）。这是清初一百二十多年土默特部的编制情况。

到了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以后，有一个顺义王的后代喇嘛扎布，在清朝平定回疆战争中和镇压外蒙台吉叛乱上立了功勋，乾隆皇帝便笼统地把他任命为土默特部的扎萨克。一时土默特部出现了两个都统和一个“王爷”的三重领导，弄得事权不一互相扯皮。所以在一七六三年（乾隆二十八年）前后，藉故先把喇嘛扎布降为不理政治的“闲散王公”，然后将两翼的世袭都统及其子孙编入北京的“蒙古八旗”，由绥远城将军兼任土默特部总的都统，留下一个“旗员”（由“满洲八旗”和“蒙古八旗”与

注：※ 土旗与察哈尔各旗皆属军事旗，原因是被征服者，而且又在入关前。所谓“率上来归”者，取消王公制。

• 按：喇嘛扎布家谱是乾隆二十一年（1756）因功晋封辅国公。（编者加注）

“汉军八旗”出身的官员)担任副都统领导十二个参领,在归化城老城路西“都统衙门”对面巷子里的“议事厅”办公。因为“世管佐领”或“勋旧佐领”都是“胎里红”的贵族,绝大多数依靠祖荫当官,全是些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不能舞文弄墨,也受不了“住衙门”的约束,结果土默特部的十二个参领,几乎全由“公中佐领”产生。所谓“公中佐领”并非由“苏木”中的箭丁推选。平民子弟念成书住了衙门以后,在初当小笔帖式(又名小笔写契,等于办事员)时,遇缺就能兼任骁骑校(副佐领)。升为大笔帖式(相同于科员)以后,遇缺就能兼任佐领。参领出了缺以后,也就非这些大笔帖式莫属了。这样一个顶替一个,逐步往上提升,于是“住衙门的”便形成了官僚集团,故土默特部的“噶兰达”大半出身于平头百姓。贺色奋也是凭自己勤奋努力,沿着这条蹊径门路,先由马童变成书生,再由书生变成骁骑校和章盖,碰上辛亥革命前后的机遇,又因自己的特殊表现而受到当局的提拔和社会上的推崇,遂成了民国初年土默特旗“噶兰达”中的显赫人物。

贺色奋最初在归化城小东街魁星阁底下文昌庙东跨院的“蒙古书坊”攻读汉书。这个书坊是“都统衙门”的“十二家参领”专为“噶兰达少爷”们做官而设立的高级私塾,他们不惜钱财以重金聘请山西“忻代三州五县”的举人秀才来担任老师,故归化城各衙门的掌案子弟亦在里边就读。老师为了多收束脩,富商和地主的儿子亦收进去听课,贺色奋的父亲为了名师出高徒,也倾家荡产筹措巨额学费,把贺色奋送入“蒙古书坊”启蒙深造。贺色奋是个蒙古名字,老师给他起了个“汝祥”的表号。故以后贺汝祥这个名字比贺色奋在归化城和土默川还要出名。他在“蒙古书坊”读完了四书五经,便到南文庙(归化城有两座文庙,北庙是汉族的文庙,在老城西门外的杨家巷)的“启运书院”学习满文和蒙文,以考中翻译生员作为能住衙门的资格。无论书坊和书

院，都是走读性质，贺色奋每天骑马往返四十华里，中午用炒面拌开水充饥，正如当年荣祥的父亲都格尔扎布在“启运书院”念书，住到朋顺召里边终年吃炒米炒面一样艰苦。因为“噶兰达少爷”和世袭章盖相同、讲究吃喝玩乐并不安心读书，考试成绩落后于平民子弟。贺色奋还没住进衙门，徐家沙梁的徐老财打听见他在“启运书院”名列前茅，便请城东的几个蒙汉绅士为“说话人”，牵羊担酒跑到西把栅登门向贺家赔礼道歉。贺色奋的父亲本着蒙古人一向容忍宽恕汉族老乡的传统，君子不记小人之过，招待了一顿“和气饭”，便善罢干休。贺色奋住了“都统衙门”步步高升，对徐家也未进行报复。如若是想报复的话，一个蒙古“噶兰达”很可以想方设法利用权力把徐家沙梁的“仇家”逐离出归化城东的“汛地”。

土默特部在乾隆年间改制后的“旗员”副都统，多是“满洲八旗”的公子哥儿，他们昏聩无能，完全仰仗门阀裙带关系坐官。自从一七五九年（乾隆二十四年）乾隆皇帝派协办大学士刘统勋私访归化城，斩了绥远城将军保德，归化城同知护理归绥兵各道普喜和绥远城同知胡世图，刹住了这里“旗员”们的贪污之风，历任的土默特部副都统，虽然不敢为非作歹，但多半不是进行社会调查，给地方兴利除弊，而是钻在都统衙门里边吃酒看书咏诗。有的甚至耍鸟喂鹰，或者站在房上大放风筝，以此来消磨时间，挣四品顶戴官的俸禄银子（据说是每年为四千八百两）。于是多年以来土默特部的“都统衙门”由“十二家噶兰达”中的三个大参领主事，一个叫“兵司关防”，一个叫“户司关防”，一个叫“操演营关防”。其中“操演营关防”主持把箭丁轮流集中在小教场进行春操和秋操训练。“户司关防”“兵司关防”则是副都统的左辅和右弼。如同新城“将军衙门”里边，由大协领所担任的“兵司正堂”和“户司正堂”一样。除了重大事件由副都统请示将军决策，一般行政事务都交给“兵司关防”和“护司关防”处理。故

“兵司关防”和“户司关防”为“都统衙门”掌权的参领头目。

## （二）从库伦跑回来告变

一九〇八年（光绪三十四年）土默特部前任副都统文哲珩（驻防绥远城旗员）因和钦差垦务大臣兼绥远城将军贻谷互相参奏而被革职，至于六十个佐领，虽是蒙古的小官，但也为一方的主宰，尽管蒙汉分治，汉族的地主老财，也得巴结奉承，不敢得罪当地的“章盖”。清政府给土默特部派来个新任副都统三多。此人是驻防浙江杭州的“旗员”，因受江南汉族文人影响，很有旧学知识，诗书画三者俱佳，尤其是受君主立宪浪潮的推动，很想为清朝做一番救亡图存的事业。所以这个三十多岁的新副都统到达归化城以后，给土默特带来了一派维新气象。如利用煤厘局罚款，樽节每年酬神演剧钱五百两，作为开办费和经常费，在小东街文昌庙院内，为内蒙西部创建了第一座图书馆。除过科学图书，经史子集即达一万四千四百余卷。此外还成立了时政讲习所，把土默特高等小学堂毕业的学生，招收到所内亲自培训，结业以后分派到新式陆军和各苏木中宣传新政，如同民国时的各县巡回讲演员与部队政工员，启迪民众和士兵的爱国思想。三多励精图治，表现出具备封疆大吏的才干，便于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由土默特部副都统提升为比绥远城将军还要重要的驻外蒙的库伦办事大臣。

三多是土默特部改制以来的最好的一个副都统。他不仅锐意振兴，并且注意发现地方上的人才。贺色奋在三多任内，尚是一个兼任佐领的“都统衙门”的笔帖式，由于他壮年有为精明强干，而被三多看中，所以三多到库伦的时候，把他和另一个笔帖式武尔恭（民国时曾任东胜县知事）选为随员。并把归化城的汉族拔贡郭象俊（民国时曾任国会议员，绥远区教育厅厅长和绥

远通志馆馆长)由初等小学堂堂长提升为“库伦办事大臣衙门”的文案。他们赴任不到一年，在团结外蒙王公军民共同抵御沙俄帝国侵略上，尚未大展鸿图，便遇到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岁次辛亥）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沙皇俄国扶植外蒙宗教上层哲布尊丹巴活佛和封建王公杭达多尔计，分裂祖国统一搞“外蒙独立”早就秘密进行。武昌起义前夕，沙俄便给外蒙的叛国集团拨来步枪一万五千枝，弹药七百五十万发，并派出一营俄国步兵和几百名哥萨克骑兵，以保护俄国使馆为名开到到库伦城中。十月三十一日（农历十月十一日）外蒙古傀儡皇帝哲布尊丹巴登基。十二月四日把清朝的驻库伦大臣驱逐出城。因为变起仓卒，三多无力挽回局势，当电报局被俄国兵把守之后，三多即刻派贺色奋给绥远城将军堃岫送信。库伦位于后套狼山的正北，距归化城二十七八天的路程，他用白布缠裹全身，拿上令箭和银牌，沿途换马不换人，日夜兼程往东南奔驰，共鞠死快马两匹。饿了啃携带的炒米，渴了吃路上的积雪，五天五夜跑进绥远城将军衙门。亏了他自幼放马，才创出了他人难以创出如此快速的奇迹。当时轰动了新旧两城，将军堃岫当时把他提升为上默特部的参领。武尔恭和郭象伋跟随三多，被俄国兵押送到恰克图，乘坐西伯利亚大铁路火车，又转中东路、南满路和京奉路，迟了半个多月狼狈抵达北京。当阎锡山的革命军在刀什尔被上默特部的陆军打退，由托克托城向南退走，归绥的局势趋于平定。在快过春节的时候，三多才打发武尔恭和郭象伋回到归化城。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上半年，山西的归绥道仍由绥远城将军堃岫，副都统成麟和兵备道台麟寿这些满族的“旗员”给维持局面。七月间插起中华民国的五色国旗。八月间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派前清“二十镇”统制张绍曾为绥远城将军，前清“第五镇”副统制贾宾卿为上默特部副都统，潘礼彦以观察使代替了从前的归绥兵备道台，所属二十厅改为县，同知和通判均改为知事。上

默特部“都统衙门”的原“户司关防”诺九如（任秉钧祖父）年老告退，都格尔扎布由“兵司关防”调为“户司关防”，提升参领达恒泰为“兵司关防”。十月举行第一届国会众议员选举，没有土默特部的名额，全体参领由达恒泰领衔具文提出呼吁而被参议院否决。乌伊两盟应出的众议员，也都被汉族人顶替。乌盟选出的是蔡汇东，伊盟选出的是王亭芳，前者为写过《西盟会议始末》的将军张绍曾的幕僚，后者不悉是什么方地的袁世凯御用的政客。袁世凯虽然也标榜五族共和，让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出任了蒙藏事务局总裁，但是对于西部蒙旗人士并没有放在眼里。

这一年中国的大事，主要是孙中山先生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让给迫使清帝逊位的总理大臣袁世凯，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被推为理事长，袁世凯为了专制独裁，以“北洋政府”的势力限制国民党的活动。其次是外蒙叛国集团与沙俄擅订友好条约，并与西藏叛乱集团呼应，互相承认独立。同时收容内蒙陶克陶和松彦光汗（字海山，喀喇沁右旗大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等马贼首领和政治野心家，为他们组织军队充当开路先锋。一月间在哥萨克骑兵配合下，占领了外蒙的军政中心乌里雅苏台城（前营），把乌里雅苏台将军（清时外蒙的最高长官）奎芳也驱逐出境。六月六日陶克陶和松彦光汗攻陷科布多城（后营），除科布多参赞大臣溥润及军民七百多人，在“俄军保护”下脱离险境。据苏联学者廓索维兹记载，“有数千人的科布多城最后剩下三十三人”（见《从成吉思汗到苏维埃共和国》）。单是归化城“三大号”中的元盛德一家就死了八十余口。外蒙叛国集团在外蒙得势以后，派出间谍煽动内蒙王公和宗教上层，并给卢占魁的“独立队”也装备了俄国武器，积极准备南犯内蒙各盟。故张绍曾接任绥远城将军以后，即组织了晋北防守总司令部，把山西的“晋军”和大同一代的“毅军”，连同宁夏护军使马福祥的“西军”，都征调到东起锡盟苏尼特，西至阿拉善旗之间布防。



张绍曾的幕僚都不熟悉蒙旗的情况，尤其对外蒙更不了解。于是把土默特部的参领贺色奋聘请为“将军衙门”谘议。贺色奋由此代替了达恒泰，成为“都统衙门”的“兵司关防”。

### （三）挽救了土旗的危亡

外蒙叛国集团的军队在俄国炮兵集团的协助下，于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七月南犯以前，内蒙局势非常危急。尽管张绍曾派其参谋长朱泮藻率领孟绍曾团，把乌盟盟长四子王和伊盟盟长杭锦旗的老阿王，都请到归绥新城的前清武备学堂，并召集十三旗扎萨克和土默特部“兵司关防”和“户司关防”，举行了好几个月的“西盟会议”，发表了拥护共和与反对分裂祖国的通电。但是归化城公主府的朋楚克、土默特部的龙图章盖、伊盟王爱召的活佛王登尼玛等，均参加了叛乱集团。他们用封给公爷和装备俄国武器的利诱条件，鼓励各旗和土默特部的军队哗变。堵挡外蒙“库兵”南犯的防线拉了好几千里，晋北防守司令张绍曾之下共分为中路朱泮藻、东路陈好夷和西路孔庚三个司令。中路部队共编了两个混成旅。除孟绍曾以第一旅长兼步兵第一团团长的那一个团，是宣统三年阎锡山革命军留下的“第一镇”的正规军，其余两个旅的步骑兵各一团以及炮兵，都是原来归绥新旧两城的蒙古兵与满族兵，以及驻在山西口外“大同镇”的巡防队拼凑而成。土默特部的步兵营，由发义率领编入第一混成旅孟绍曾兼团长的步兵团，土默特部的骑兵营，由福坦率领编入吴吉昌第二混成旅李春秀的骑兵团（见《绥远通志稿》军事卷）。这两个混成旅，都于一九一二年十二月编成。贺色奋以“兵司关防”身份给全体官兵做了政治思想工作。除了福坦骑兵营的连长玉禄（武尔恭的本家弟弟），把所部在武川伊克尔拉走外，其余官兵在跟“库兵”作战中都表现良好。一九一三年六月间，陶克陶和松彦光汗

的马贼土匪部队协同俄国炮兵占了绥北重镇百灵庙以后，孔庚的“晋北西路”失守了乌兰脑包和大余太，陈希夷的“晋北东路”也将滂江放弃，朱泮藻的“晋北中路”亦由后厂汗此老退到武川县城北面二十里的前厂汗此老。此时如果勇敢善战的土默特步骑兵一倒戈，晋北前线那就不堪设想。幸亏张绍曾把他任“二十镇”统制时的徐恩荣“八十团”（冯玉祥曾任过该团的营长）从滦州调来增援“晋北中路”。于七月八日发动反攻，十日下午四时收复百灵庙。同时发义的蒙古步兵营打散了外蒙的喇嘛队伍，守住了陶林县城。“晋军”的赵守玉团在昆独仑召以北的沙坝子，击退了“库兵”和乌拉特三公旗叛众，绥包两地才转危为安，免于遭受烧杀奸淫的浩劫。“库兵”在察哈尔、热河和东三省，亦被何宗连的正规军、米正标的“毅军”和张作霖的“奉军”挡住。沙皇和哲布尊丹巴活佛方知难而收兵，被迫签订了中俄蒙的“恰克图条约”，外蒙取消独立改为自治。战争结束以后，玉禄的人马在草地畔上徘徊，发义和福坦的步骑兵被张绍曾收枪遣散。贺色奋目睹此种情况、恐土默特的兵士流离失所，变成卢占魁的“独立队”，便让归化城“大盛魁”经理段履庄出面收抚。派武尔恭把玉禄叫回，编为“绥远游击队”，并任召河的银海喇嘛为团长，给商务会成立起“保商团”。以后这两支蒙古部队，成了剿除土匪和保商护路的劲旅。尤其是玉禄的游击队，马福祥任都统时，扩编为“老一团”。在一九一七年卢占魁南下参加陕西“靖国军”绥西“哥老会”发动海水大潮时，成为保境安民的劲旅，团长玉禄和连长多才等，都为剿匪而阵亡，尤其在玉禄阵亡以后，满泰、李根车和晋梅五相继任团长时，为我党的地下活动，做了不少的掩护协助工作。

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北洋政府”决定，在直隶和山西两省边墙口外，划热河、察哈尔和绥远三个特别行政区，为将在内蒙地区后建省奠定基础。绥远区行政区，把原在察哈尔右翼设

置的丰镇、凉城、兴和、陶林四县（此时尚未设治集宁）拨归察哈尔行政区，保留原来的乌伊两盟和土默特部设置的归绥、萨拉齐、托克托、清水河、和林、武川等六县与伊盟前后套设置的东胜、五原两县。承德府城和宣化府万全县的张家口，原来就设有热河都统和察哈尔都统，故把绥远城将军取消，一律以都统为特别行政区的最高军政长官。这样归绥新旧两城不能同时并存绥远特别区和土默特部两个都统，要把土默特部的“都统衙门”和绥远城的“将军衙门”同时关闭，另组织一个绥远特别行政区都统公署。意味着“北洋政府”不承认土默特部存在，将土默特部的蒙古人拨归各县知事统治，原来的“十二家噶兰达”和“六十个章盖”做不成官事小，把土默特部分裂瓦解事大。所以土默特的官民听到这个决定非常愤慨，尤其是贺色奋和都格尔扎布等负责参领，决不肯把元朝迄今存在了六百多年的土默特部和土默特人在土默川的主人翁地位，在他们手里给葬送。于是他们派武尔恭和郭象伋为代表前往北京请愿，依据历史演变既成的事实，决不能把土默特部随便取消。都格尔扎布为了给两个代表以壮行色，除由公支旅费而外，并以私人名义向商人借了五百两“盘缠”，以作为招待首都各报新闻记者的费用。经武尔恭奔走各方，郭象伋拟稿据理力争，“北洋政府”终于打消了原先的意图，把土默特部改为土默特特别旗，参照察哈尔八旗和四个牧场的首长称谓，将土默特部副都统亦改称为土默特特别旗总管。这是土默特旗在民国初年的一件大事。荣祥先生总纂《绥远通志》为其父都格尔扎布立传，提起其父参预此事经过中有“参领贺色奋力赞之”的语句。武尔恭和郭象伋从北京回来，贺色奋叫武担任归绥县民团团总，收抚蒙汉散兵游勇绥靖地方。把郭象伋安排到土默特高等小学教书，培养各苏木派来的青年学生，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继孟学孔之后担任了校长。

土默特特别旗总管公署，于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一月正

式成立。原来的“都统衙门”旧址被绥远特别行政区财政厅所占（即解放初的归绥市人民政府所在地），总管公署移到大北街路东，从前参领们的议事厅办公。首任总管章夔一是广东番禺（广州）汉族人，为绥远城将军改为绥远特别行政区都统潘矩楹（清时的“二十镇协统）的幕僚。以后的历任总管，亦都是历任都统的亲信故旧。例如绥远都统蔡成勋的弟弟蔡成诒，在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就担任过土旗总管。直到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七月，当时统治华北和后来任晋绥绥靖主任的阎锡山，才开始让土旗的蒙古人满泰和荣祥相继担任了土旗总管。总管公署成立后，把“兵司关防”和“户司关防”改为科室，贺色奋仍保留为参领未担任科长，但以特别区都统署的谘议从事了议会活动。让后进的参领佐领在总管公署工作，在旗县并存的情况下，坚持旗县分治。

#### （四）当选“安福国会”议员

“北洋政府”时的国会，是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参众两院的参议员由省议会选举，众议员由选民中的选举人投票表决。热河和察哈尔与绥远三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后未曾组织区议会，热河和察哈尔左翼各县的省议员，参加顺直（北京顺天府和直隶省）省议会。察哈尔右翼的丰凉等四县和绥远八县的省议员，参加山西省议会，晋绥虽然分家，仍是藕断丝连的样子。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土默特旗的荣祥所以能当选山西第二届省议会议员，不是代表蒙古民族，而是他的前辈贺色奋、汉族同学赵国鼎、满族同学赵增寿、与回民俱进会会长白维礼等，发动归绥新旧两城的选民都给投票，显示出民族团结的结果。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第一届国会参议员选举，山西省议会选出丰镇的班廷献。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第二届国会参议员选举，山西省

议会也只选出归绥的龚秉钧。两次参议员选举都没有轮到蒙古人身上。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第一届国会众议员选举，没有土默特部的名额。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六月，因大总统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在参加俄战问题上发生了“府院之争”，黎元洪受“督军团”压迫，下令解散了参众两院。绥远选出的第一届国会众议员李景泉（归绥人）和补了王定圻（包头人，民国五年被袁世凯杀害）缺额的郑化国（归绥人，抗战时期被日本人所杀）跑到广州参加了拥护孙中山先生的“非常国会”。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六月，段祺瑞组织新国会，举行第二届众议员选举时，绥远区的归绥道选出包头的卜兆瑞，郑化国由广州跑回竞选为候补，乌盟选出陈震，于捷三候补，伊盟选出曾毓照，纳吉尔格勒候补。这次土默特旗有了名额，由于贺色畚为土旗作出好多贡献，当然选民一致投了他的票，章子怡候补。除章子怡的族别待考，陈震、曾毓照和于捷三非但不是蒙古籍，而且也不是绥远的汉族人。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七月，发生“直皖战争”，“直系”联合“奉系”打败“皖系”，段祺瑞下台，曹锟解散了第二届国会。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曹锟操纵的“北洋政府”举行了第三届国会参众两院议员选举，土默特高等小学校长郭象伋参加了众议员竞选，四月一日汉族选举人在道尹公署投票时，郭因得到贺色畚的支持而当选。四月十日蒙古选举人投票以前，因四月七日广州的“非常国会”选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政府大总统，“北洋政府”遂下令停选。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六月，黎元洪经北方军阀电请入京复职，主张恢复第一届国会，故第三届国会没有开成。所以说贺色畚是民国以后绥远区唯一的蒙古族议员（以上见《绥远通志稿》考选卷）。他的挚友也是土默特旗的挚友郭象伋虽未出席国会，却藉此成为绥远区社会贤达。他在马福祥于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六月任都统后，由全区学务局长升为全区教育厅长。郭象伋和郑化国都是归绥县西区

兵州亥村人，郭是一个寒儒，郑早已是一个全绥远的大绅士，非常善于活动。当时绥远区六县知名人士参加竞选的很多，如果不是贺色奋出来以他在全绥远的声望，发动土旗的参领佐领给郭象级拉票，郭是很难当选的。

“北洋政府”的第二届国会，是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六月五日，袁世凯因称帝失败气愤病死，黎元洪以副总统的身份出任大总统职，由段祺瑞组织内阁；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五月在参加欧战问题上，黎段发生争执。第一届国会拥黎反段，被段祺瑞领导的北洋军阀“督军团”解散；六月十四日安徽督军张勋，以调停总统府和国务院的“府院之争”，率领“辫子军”入京，保皇党首领康有为亦于二十八日由天津抵达；七月一日康张把清朝逊帝溥仪拥出，导演了复辟的丑剧，三日段祺瑞在天津马厂誓师，十二日指挥以其“皖军”(段祺瑞是安徽合肥人)组成的“讨逆军”占领北京把康张赶跑；段祺瑞由此掌握了政权，于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给自己组织了国会。段祺瑞和冯国璋(曾任大总统)与王士珍(曾任陆军总长)，原为袁世凯以清朝北洋大臣，在天津小站组织新军时的骨干，所以被目为“北洋三杰”；段是“皖系”的首领，以后打败段的“直系”曹锟(直隶天津人)是“北洋武备学堂”出身，连同“奉系”的张作霖(奉天黑山人，出身于“毅军”)和“晋系”的阎锡山(山西五台人，出身于日本士官学校)等，跟袁、曹、段表示过效忠和好的督军，都列为“北洋军阀”的范畴。所以，他们先后组织成的北京政府，均谓之“北洋政府”，而段祺瑞是利用其政团“安福俱乐部”操纵议会，故第二届国会又名“安福国会”。

“安福国会”与“安福系”均因“安福俱乐部”而定名。而“安福俱乐部”之名称是由于该俱乐部设立在北京安福胡同而得名。“安福系”的领导人主要是有名的王揖唐(安徽合肥人，曾任“安福国会”众议院议长)，梁鸿志(福建长乐人，“安福国

会”参议院秘书长)和徐树錚(江苏肖县人,段祺瑞的国务院秘书长),山西阎锡山的驻京代表浑源人田应璜也是“安福俱乐部”的主要骨干。田应璜字子琮,为前清进士,曾任过山西大学校长,在山西省议会很有势力,第一届国会选举时,和他的大女婿丰镇隆盛庄人班庭献(曾任浑源县知事,阎锡山统治华北时的平绥铁路局长)均被选为参议员。田应璜替阎锡山周旋于“皖系”和“奉系”之间,为北京宦场上的活跃分子,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张作霖入关后,曾支持其组织内阁。贺色奋系土默特旗老一代的官僚,没中过科举和留学过外洋。他竞选众议员,本想在议会中代表蒙古人说话,在没有到北京以前,根本不知道民国以来的政治复杂情况。晋绥原先是一家,察绥两地的人多是由山西移去的,到了北京之后,浑源州人和土默川人便成了近同乡。绥远在北京没有会馆的时候,议员和大学生都在光绪皇帝老师大同李殿林所成立的“三晋东馆”或山西的“三忠祠”中居住和集会。这样绥远人就跟晋察两省的人士滚到一起,特别是通过田应璜这座桥梁,程度有深有浅地和阎锡山联系起来。除察区凉城的“安福国会”议员张钦,因参加过山西的辛亥革命早跟阎锡山接近,“晋军”二次进驻绥远后,即担任了绥远省教育厅厅长。绥区包头的“安福国会”议员卜兆瑞,就是由于投靠了田应璜后来被阎锡山所重用。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晋军”二次占领绥远,在绥远建省前后担任了省公安局局长。田应璜的“山大”学生,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山西第三届省议会议员萨拉齐人杜宗预(字晋臣)也就担任了卜兆瑞的秘书。卜兆瑞任绥远省会公安局局长时的侦缉队长萨拉齐人亢宜斋,也是近代土默川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他在绥远时还不出奇,到了北京以后,便成了华北的“鸦片大王”,设立“长安饭店”,纳与丁果仙齐名的“晋剧”坤伶“九岁红”为妾,北京人称他为“亢老板”或“亢二爷”。他跟日本浪人和华北的帮会联络,与各方面的特工组织和地

工人员来往，倒弄了二十年烟土，从来没有破案，日本投降和解放以后，亦未被捕判刑，由于他跟贺色奋的儿子贺之章，后来替傅作义在沦陷区收集情报有关，所以在此处顺便提出。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十一月，徐树铮率“边防军”高在田等部开往外蒙，在赴库伦出任西北筹边使以前，曾向贺色奋垂问过边情，他写了建议书欲聘贺担任顾问，但因其年老而未能成行。徐在平地泉建立机场，动工往库伦修铁路。哲布尊丹巴声明取消自治，表示拥护中央。因“直皖”战争发生，徐离开库伦回到北京，日本主使白俄恩琴部队于一九二一年攻陷库伦，对商民大肆洗劫屠杀，又拥哲布尊丹巴为博格多可可汗，外蒙出现了日本羽翼下的第二次独立。

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夏天，山西省议会的荣祥、韩俭、阎肃、赵子让、李正乐和任秉钧（字和卿、萨拉齐县汉族人）等六个绥远区议员，赴京向国务院控告绥远都统蔡成勋为征收烟税而广种鸦片，亦得到众议员贺色奋和卜兆瑞和参议员刘峙（字孔嘉、归绥城东脑包村人，一九一九年龚秉钧死后，他候补顶了此缺）三个京议员的支持和呼应，才使蔡成勋退出一部分赃款，给绥远在北京和归绥恒昌店巷购买了两处会馆。贺色奋因为参加的是“安福国会”，也只好随波逐流，给国家和地方无法作出其它贡献。“安福国会”解散后，贺色奋即放弃政治活动，以绥远在野名流，于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病死于大召前家庙巷本宅。贺家在抗战时遭了重大厄运，后代走向败落，不悉贺色奋的生卒年月，无从知道他活了多大岁数。

## （五）成立绥远毛织厂

“安福国会”的参众两院共有三百三十多个议员，贺色奋在这些达官显宦里边，不象在土默特旗出入头地，故不是“安福



系”的成员，也未加入阎锡山的政团。可是由于他结识了田应璜以后，他在北京读书的儿子贺云章就和田应璜的儿子田汝弼（日本农业专科学校毕业，曾任德王“蒙疆政府”的晋北政厅长官）、田的二女婿张恺（山西浑源人，日本高等工业学校毕业，曾任太原火药厂厂长和金陵兵工厂的总工程师，以及日伪时的“北师大”的校长），五女婿苏纪忍（山西猗氏人，留学美国学工，曾任阎锡山的平绥铁路局总工程师和傅作义的平绥铁路西段管理局局长）这些人交往起来。受他们影响，贺云章到日本考入高等工业学校，经他们拉引，贺云章以后便加入傅作义抗战前后在华北所布置的地下组织。

贺色奋共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因其思想保守未让女儿读书。长子学乳名万寿，和荣祥、孟学孔、赵国鼎在归绥中学丙班分为一、二两班同学时，起学名为万建邦。他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而数理英语考试多不及格，没有毕业就参加土默特旗公署工作，所以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王定圻任监学时所编的《归绥中学同学录》中没有他的名字。民国初年土默特旗蒙古人，以父亲名字的首一字为姓时，改名为贺建邦，他当了土默特旗总管公署十五六年科员，于一九二九年病逝。贺色奋的次子蒙名若圪洞、汉名贺文化，从小不爱读书，喜欢踢拳弄棒，与萨拉齐水洞沟门的云连升和陈全忠为友，有人说云和陈他们是“捻军”黑旗军首领宋景诗的徒弟尤四喇嘛的弟子。贺色奋看见贺文化性情粗暴，常和武林中之人往来，始终未敢让他到“蒙古队”和“老一团”中带兵，怕给生事惹祸。贺色奋的四个儿子中，以第三子贺云章和四子贺耆寿最为头角峥嵘，贺云章字叫翰卿、贺耆寿是以乳名为学名，按陈玉甲（注）

【注】陈玉甲字云贵，河北丰润县人，清军“二十镇”出身，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即随张绍曾来到绥远，历任军政要职，与乌伊两盟的王公头结拜，为有名的“蒙通”，解放前任包头警备司令，五十年代初病死于内蒙政府参事室参事任内。

于一九三六年所编《绥蒙辑要》记载，是年贺云章为三十七岁和贺耆寿为三十三岁推算，贺云章生于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六年），贺耆寿为一九〇三年（光绪二十九年）所生。贺色番当了七八年参领和“将军衙门”与都统公署谘议，每月领的是为数不多的干薪，只有任国会议员二年多期间，弄了一万多块现洋，当时的国会议员，每月五百元车马费。他没有购买土地房产和在商号中投资，除了必要的应酬开支，全都花在三子和四子的念书上面。

民国初年绥远区的蒙汉念书人，都是念完私塾才住高等小学，贺云章和察素齐的荣耀先约于一九一七年在土默特旗高等小学毕业。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即相随考入北京蒙藏学校初中。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贺云章和田应璜的二女婿张恺结交，看见张从大学毕业后到日本留学考入高等工业学校，他即立志于科学研究，专心学习日语。他在初中期间掌握了大学预科（高中）的全部知识，约在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即东渡日本，在张恺的帮助下，进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一九二四年即学成纺织技术归国，因为荣耀先和蒙藏学校的土默特高小四五两班同学，为庆祝他学成归国，曾举行了欢迎合影留念，康济民先生（现年八十六岁，北平大学法学院毕业，曾领导过“百灵庙兵变”，任过“绥境蒙政会”委员，起义后参加革命工作，现退休在土左旗把什尔村养老）还保存着这张像片。其时张恺已担任了山西火药厂厂长。一九二四年他利用肥田粉发明了“恺字炸药”和木柄手榴弹（见《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在一九二五年打退樊钟秀进攻山西时发挥了强大的威力，引起了全国的注意，在科技界取得了地位，一九二六年便担任了太原兵工厂厂长，除在山西任教，并于暑期到天津、北京讲学。贺云章从日本回来，就到太原找他，在那里日本“高工”的同学很多，不悉贺担任了哪个厂子的工程师。

阎锡山派田应璜为代表，和张作霖、吴佩孚联合，于一九二六年把冯玉祥的“国民军”在雁门关和南口打败，“国民军”退

到五原以后，决定由“晋军”接管绥远政权，“奉军”掌握京绥的交通，故由“晋军”第一师师长商震担任了绥远都统。一九二七年前半年，阎张继续合作，故张任“军政府”大元帅后，任阎为副元帅，并让阎的代表田应璜筹备组织内阁，不料阎看见“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南京，冯玉祥的“国民军”也控制了洛阳、郑州和开封，一面把田应璜留在北京应付张作霖，一面派其山西五台同乡赵丕廉潜赴武汉、南京勾结了汪精卫和蒋介石。是年六月自任“北方国民革命总司令”，在太原和归绥插起青天白日旗帜，于九月中旬沿京汉、京绥两路打开“奉军”，田应璜因无颜见张作霖而气死。“晋军”虽然两路失利，一度放弃雁门关北十三县和绥远全区，但在一九二八年“晋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三集团军”和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的一、二、四“集团军”配合北伐，于六月八日抢先进入北京（是年改称北平），并收复绥远，占领冀察，遂使阎锡山由山西的督军兼省长，变为统治华北四省（一九二九年察绥建省）、两市（北平和天津）军政首脑。张恺因不满阎锡山，辞去太原兵工厂厂长的职务去了北平，贺云章先于五月间“奉军”撤离绥远后，由太原回到绥远，满泰担任了土默特旗的总管，即把他聘为土中兼土小的校长。

土默特旗的中学，是一九二五年“国民军”的总管赵席聘在土默特高小基础上，成立的一座简陋中学。本来土旗有一笔钱可以作为基金，但是叫满泰投资到“山西省银行”作了股本（详细数字可以从山西政协《文史资料》选集中查找），贺云章一看没有发展前途，勉强担任了半年校长，便于一九二九年春天，参加了平绥铁路局工作，因为他认识的田应璜的大女婿班廷猷是局长，五女婿苏纪忍是总工程师。一九三〇年秋天阎锡山联合反蒋，因张学良的“东北军”入关而告失败。阎锡山于冬天逃到大连，张学良叫傅作义率部开到绥远驻防。张恺在这以前，被蒋介石聘为金陵兵工厂总工程师。贺云章因无其它出路，也跑到南京托

张恺给寻找工作。一九二一年八月傅作义经张学良推荐出任绥远省政府主席不到半月，日本人派专机把阎锡山送回大同，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阎趁此于一九三二年二月被蒋介石任命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早在大连港口避风期间，阎锡山就检讨了此次反蒋失败的原因，是因山西的封建官僚资本，没有战胜江浙的先进财团所致。心想但能返回晋绥定要加强经济建设，实现“工业山西和农业绥远”，然后再问鼎中原。所以阎在出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后，先决定了“山西省政建设十年案”，因为张恺是山西的人才，于一九三二年派人到南京把张请回，委其负责领导名叫“太原经济委员会”的决策机构。一九三三年曾派张前来绥远，他写了一本《绥远调查报告》（见内蒙图书馆的张万仁先生冰呼和浩特“地志办”所写《艺文志》的待访书目。）贺云章随张恺从南京经太原回来期间，经张恺和苏纪忍介绍被傅作义主席留下，筹建“绥远毛织厂”（呼和浩特第四毛纺厂前身）。一九三四年六月动工，十一月试车，一九三五年三月正式投产，名义上由于存灏兼任厂长，实际上由副厂长贺云章负责。贺从南京回来曾在国民党绥远省党部兼过职务，当时绥远“省党部”的七个执行委员中，代表蒙古族的执行委员是荣祥本家侄儿经天禄（“同盟会”员经权之子，字革陈，“北师大”毕业，曾任国立蒙旗师范和伊盟中学校长，起义后任内蒙人委参事），一九三五年六月“何梅协定”（国民党军政部长兼“军委会”北平军分会主任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梅津美治所缔订之丧权辱国协定）规定国民党在华北停止活动以前，贺云章可能兼过“省党部”的蒙旗党务推进员。呼和浩特市纺织工业局“党史办”，不知贺云章的真正政治背景，在《呼和浩特毛织工业历史概况》（载于《呼和浩特史料》第二集）上，说他由国民党绥远省党部而来。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德王在百灵庙成立了“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以下简称“百灵庙蒙政会”），贺云章也担任了一个挂名

参议，但他的主要精力，完全用在“绥远毛织厂”的施工和生产方面，所以说内蒙西部的机器毛纺工业，贺云章为主要奠基人之一。

## （六）创办《蒙古响导》月刊

贺云章的弟弟贺善寿在蒙藏学校读书时还很幼稚。一九二六年“国民军”和“奉军”在南口作战时，学校停了伙。他和康济民困在北京，有一个阶段是熬面自己做饭充饥。考入北平大学政治系读书时，便跟托克托县的焦守显（字子明，原为绥远地方政团“祁焦派”的领袖，后任国民党西北公路特别党部书记长），武川县的于存灏（字静漪，“九一九”起义前为绥远高等法院院长），丰镇的班浩（字养吾，班廷献之子，曾任绥远第一中学校长）等“相好”起来。并通过妻子丰镇富彩霞（“北师大”毕业）的同学关系，结交了右玉刘慕真（“北师大”毕业，曾任山西的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的丈夫灵丘人李江（字冠洋，曾任山西教育厅长）才逐渐成熟起来，变成一个青年政治活动家。

据《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记载，阎锡山于一九三一年利用“九一八事变”东山再起，出任统治晋绥军政的太原绥靖主任后，为了笼络晋绥的知识分子，让李江给组织了一个“青年团”，其核心组织为“中社”。“青年团”的理论委员会虽罗聘了侯外庐、张友渔、邢西萍（徐冰同志）等进步教授，但由丰镇的张子佩和梁子材（曾任傅、董《奋斗日报》总编辑，起义后为呼和浩特市政协副主席）为秘书主任和秘书。“青年团”的干部委员会的成员均为“中社”分子，总干部委员中有绥远托克托县的焦守显和凉城的李济生（阎锡山私立进山中学校长），绥远干部委员中有于存灏，丰镇隆盛庄的寿耀南（起义后任内蒙人委参事）和张淑良（字可旌，曾任国立绥远中中学校长，起义后任内蒙文化局副

局长），归绥的杜寘德、托县的李显、于存灏为负责人。“中社”的人拥贺耆寿的父辈张钦为理事长，于一九三二年成立了反对“CC系”潘秀仁和赵允义“潘赵派”的西北实业促进社”（设在旧城小东街），十几个理事中除前述的焦守显和于存灏外，贺耆寿和班浩（被“潘赵派”鼓动学生闹风潮离开一中，任苏体仁的绥远财政厅科长）亦为其中的理事。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的大革命期间和以前以后，土默特旗的大专院校毕业肄业学生，绝大多数参加了无产阶级革命，其次是加入了国民党，只有贺云章和贺耆寿投靠了阎锡山和傅作义。

一九三三年夏天，绥远的“西北实业促进社”趁傅作义将军率“三十五军”开往河北参加“长城抗战”的空隙，鼓动绥远一中、一师和“中山学院”三校学生，砸了潘秀仁为厅长的教育厅。现在健在的内蒙古图书馆张万仁先生，是第一师范学生砸教育厅的首领。他被一师开除后，经焦守显和于存灏介绍到太原，由李江让“中社”的成员赵仲容（注）给拿钱，转到私立成城中学高中读书。张在旧城周家巷班浩家中所设立的“指挥部”开过好几次会议都没见到过贺云章的弟弟贺耆寿参加，那时贺耆寿尚在北平大学读书。担任“西北实业促进社”的理事是在“平大”毕业回到绥远以后。贺耆寿创办《蒙古响导月刊》的登记立案日期是一九三五年三月三十一日（见《绥远通志稿》社会卷）。贺耆寿在“平大”读书期间，土旗总管公署还弄过这样一个笑话：土旗总管公署向来对考入国立大学的学生发给助学津贴。一九三〇年以后考入北师大城东的古路板申的卜文林的妹妹卜效夏，经同学云秀桐（云继先的夫人）介绍，和城东二十家子村住“中国大学”的汉族学生张遐民（后任国民党绥远省党部书记长及绥远财政厅长，

---

【注】赵仲容原名赵永宽，山西崞县人，留苏时与蒋经国同学，回国后与土旗在武汉大学读书的女学生经瑞云结婚，后任包头县长，“三青团”绥远支团干事长，国民党中央“青年部”副部长等重要职务。

现为台湾辅仁大学教务长兼教授)成婚,同时贺耆寿跟丰镇住“中大”的汉族女生富彩霞结为伉俪。当时满泰任总管时的几个老科长,思想还很封建,便把卜效夏的那份津贴转交给富彩霞,说什么“不给外出的闺女,要给咱们娶回的儿媳妇”,其实他们是因怀念旧长官贺色奋,故对贺耆寿偏心眼照顾。

一九三五年夏天,贺耆寿已经加入“实业社”,这一年张万仁从成成中学毕业回绥远向于存灏们要钱,准备报考山西大学,因当初他们对张有过这样的诺言。张抵绥后被招待到“实业社”食宿,这才认识了贺耆寿。张对这个英俊能干的蒙古青年产生了很深刻的印象。特别是那时贺耆寿已创办了蒙汉文合璧的《蒙古响导》刊物,由贺耆寿他们把栅村的伊钟秀老先生(内蒙古大学已故图书馆主任伊锦文的父亲)把汉文稿件翻译成蒙文写在石印药纸上。他亦食宿于“实业社”,并有专室进行工作。《绥远通志稿》上说《蒙古响导》创办时,傅作义给拨了一千元开办费。

“实业社”因为关系不同,亦在好些方面予贺耆寿以支持。

贺耆寿所办的《蒙古响导》是跟德王唱反调的一个刊物,它主张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并提出了有力的论据,揭穿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德王的“百灵庙蒙政会”实现其“满蒙政策”的阴谋,起了一定政治作用,收到很好的宣传效果。这种爱国表现,不仅被傅作义赏识,通过李江和张恺的反映,阎锡山亦知道了土旗有这么一个反对德王的爱国青年。“百灵庙蒙政会”成立时,国民党中央还成立了一个“蒙古各蒙旗地方指导长官公署”

(以下简称“蒙古指导长官公署”),由何应钦任长官,阎锡山任副长官,阎锡山的老师赵戴文(字次陇,山西五台人,老同盟会员,曾任国民党中央内政部长及山西省政府主席)为负责参赞,机关设于北平,贺耆寿被这个“蒙古指导长官公署”和以后的“绥蒙指导长官公署”聘为参议。

## （七）“绥境蒙政会”的骨干

“百灵庙蒙政会”成立以后，不仅蒋介石派李才桂率领所谓“蒙古旅行团”到百灵庙搞特务工作，而于一九三四年夏天，为了杀鸡给猴看，把德王的亲信韩凤林（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于北平被蒋孝先的“宪兵三团”扣捕处死。傅作义亦派人前往百灵庙对“百灵庙蒙政会”进行瓦解，成员有陈玉甲、卜兆瑞以及其它打入内线的人，领导者为绥远省政府秘书长曾厚载。

一九三四年冬天，蒋介石亲自到归绥接见了德王，把他的身价地位越提越高。随后日本的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也从长春飞到百灵庙对德王更进一步争取。德王权衡了谁给的枪多，谁给的钱少这一利弊，经过一番比较，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二日（农历正月十八日），配合李守信的伪军完全占领察北六县的形势，在锡盟西苏尼特旗德王府，秘密成立了伪“蒙古军”总司令部，改民国二十六年为成吉思汗纪元七三一年，易青天白日旗为成吉思汗的红黄蓝三色旗。。消息传出后，四月二十日发生了百灵庙兵变。有土默特旗的云继先、朱实夫、苏鲁岱、任秉钧、康济民和察哈尔部正黄旗的贾鸿珠（纪贞甫）率领保安队一千余人起义，把队伍从百灵庙拉到土默川和德王划清界限。接着，傅作义为达到“察绥分治”，另立“绥远省境内蒙古各蒙旗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以下简称“绥境蒙政会”），让土默特旗总管荣祥负责筹备，由经革陈、贺耆寿、胡凤山（字瑞岐、正黄旗人，贺耆寿“平大”同学，土旗任秉钧的妹夫，后任“绥境蒙政会”委员，正黄旗总管，起义后在内蒙古自治区民委工作）担任秘书（见经革陈《绥境蒙政会始末记》）。“绥境蒙政会”成立后，“绥远境内各蒙旗地方自治指导长官公署”（以下简称“绥盟指导长官公署”）也相继成立。德王恼羞成怒，索性于五月十二日，在察北



嘉卜寺（察省主席宋哲元设治为化德县，德王改其为德化市）组织起伪“蒙古军政府”公开叛国投敌。

“绥境蒙政会”由绥远十八旗扎萨克和总管为委员，伊盟盟长扎萨克旗沙克都尔扎布为委员长，乌盟盟长中公旗巴宝多尔济、伊盟副盟长杭锦旗阿拉坦鄂济尔、乌盟副盟长四子王旗潘第恭扎布等为副委员长。“绥蒙指导长官公署”由阎锡山任指导长官，傅作义为副指导长官，绥远垦务总局局长兼绥西屯垦会办石华岩负责参赞。“绥蒙指导长官公署”和“绥境蒙政会”均设于归绥。“绥境蒙政会”和“百灵庙蒙政会”的组织一样庞大，由国民党中央政府给拨款，下设秘书、参事、民政、保安、教育、卫生六大处和防共训练、建设、财务三个委员会，各处处长和各委员会委员长，均由“绥境蒙政会”委员兼任。荣祥兼教育处处长，经革陈为主任。成天吃喝嫖赌的达拉特旗康王兼实业处处长，贺耆寿为主任兼“绥蒙指导长官公署”参议，终日念佛的郡王旗图正兼任建设委员会委员长，主要委员是绥远毛织厂副厂长贺云章。荣祥和经革陈叔侄俩只掌握一个处，贺家兄弟却掌握着一个处和一个委员会。土默特特别旗总管满泰，于一九三四年九月病逝以前，为了笼络上旗各方面人才，均聘为佐领或骁骑校。贺云章为左翼二甲四佐的佐领，贺耆寿为右翼四甲三佐的骁骑校（以上均见陈玉甲所编的《绥蒙辑要》）。从一九三七年五月“绥境蒙政会”成立，到全面抗日战争开始，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虽然贺色奋去世了，然而却是贺家最鼎盛时期。

## （八）兄弟三人为国牺牲

中国全面抗战，是由绥远抗战揭开的序幕。傅作义将军在一九三六年冬天，取得了红格尔图和百灵庙两次战争胜利，除了他的“三十五军”坚强勇敢善战，他的情报工作做得也很好，这就是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傅作义将军很有政治头脑，也有象“军统”和“中统”那样的特工组织。百灵庙战役结束不久，王英的伪“大汉义军”在四子王旗大庙，解决了德王的穆克登宝师，并杀死了好几十个日本人，而后全部反正，这是因傅派曾任张砺生“骑二师”旅长戈武成（集宁人，后任张砺生“晋察绥边区挺进军”副总司令）前去给石玉山等作了反正工作的缘故（见一九三七年一月《申报周刊》所载石玉山向记者的谈话）。尤其是傅的“机要室”所领导的“电务组”不仅设有监视台，善于破电，而且还跟派到各地的秘密电台保持联系。傅作义在一九二八年任天津警备司令时，就结识了他的晋南同乡田应璜的五女婿猗氏人苏纪忍，以他大哥傅敬斋“自成功”的本钱，让苏在平津成立贸易公司作掩护，从居住在天津租界地“安福系”的余党身上，观察日本人的各方面的动态。出任绥远省主席以后，让“青帮”大字辈的头子刘长荣（孙兰锋的营长）开设“新绥旅社”进行社会调查联系，在察北风云紧张时，曾派他的驻张家口办事处处长刘云峰，潜赴张北县城和李守信接洽。一九三七年八月上旬，傅指挥华北第七集团军东进以前，就托苏纪忍叫贺云章不要离开归绥，因为归绥万一失守沦陷，贺是蒙古人又留学过日本，留下作为内线比出去随军乱跑更能发挥抗战作用。所以八月二十四日张家口沦陷，傅作义被阎锡山调回山西，荣祥领上贺春寿等跑到伊盟扎萨克旗去找沙王，而贺云章留在归绥未走。还有归绥商务会的文读杜晋臣，他于此时已把家眷带回萨拉齐，准备跟上同乡同学白映星（山大转到北大毕业的学生、曾任过绥远中山学院院长）等参加“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突然被人叫回归绥协助商务会长贺秉温 and 贺云章筹备组织了“维持会”。

归绥由马占山指挥留在绥远的李大超“国民兵”和土默特旗官兵为主的白海风“绥远蒙旗独立旅”在大黑河之线抵抗了三天三夜日寇，于十月十四日下午撤离。据李守信特赦后在刘映元为其

整理回忆录时说：他当天进城后即被贺云章和刘长荣，招待在归绥富商“德余泉”财东兰培茂家中，由兰的小老婆“二娃子”给斟酒布菜吃饭，晚上由贺云章给找了一个归化城最漂亮的暗娼，到杨家巷的一个小院中伴宿。十月二十七日日伪成立伪“蒙古联盟政府”时，把归绥改为厚和浩特，将原绥远绥东五县四旗和绥中土默特旗境内的归、萨、托、和、清五县，成立了一个巴彦塔拉盟。委贺秉温为厚和浩特市市长，刘建华（汉人起蒙古名为纳木尔）为厚和浩特市警察局长，补音达赖（德王的姨父）为“巴彦塔拉盟盟长”，日本人金井章二为伪政府的最高顾问。德王为了团结整个蒙古上层人士，争取伊盟的沙王等“国统区”王公没有计较“绥境蒙政会”的前嫌，把贺云章也任命为“巴彦塔拉盟”的民政厅长。

归绥又名西口，依靠跟外蒙和新疆通商而繁荣，自从一九二八年外蒙封锁边境，和新疆主席杨增新被民政厅长樊耀南刺死连续发生内乱，完全依靠输出鸦片维持各行各业，所以“德中和”土店的经理贺秉温，被推选为商务会长。因为打仗和军运，归绥在一九三七年冬天，集存有好几十万两烟土无法运往平津，因此烟土行市大跌，依靠钱庄贷款的上店，面临着倒闭的危机。于是贺秉温托贺云章向李守信求情，想望李跟金井章二疏通一下，李慨然允纳，金井章二也给了李一个很大的面子，准许土行挂专车向平津发货，使土行渡过了难关。李守信亲口对刘映元说：“贺云章领上贺秉温向我送了十万块‘驼骆票’，（能十足兑换现洋），我初来乍到厚和，想收买人心，在绥远人跟前表示大方，分文没有接受。我看见贺云章很穷，让土行拿出一万块送给贺云章，权当他的跑腿钱，结果弄了个皆大欢喜。”可见李守信已和贺云章交为朋友，用李守信的胡匪术语讲，贺云章把个日伪的实力派给“焊上”。贺云章把李守信给的钱，以及傅作义给的“特支费”，完全用在地下活动上面，自己并没发财。因搞这种工作，上下都得

打点，连日本特务机关和宪兵的“腿子”们，也得请客送礼。他们这些人成事不足坏事有余，非钱不能说话。贺在死以前搭救过不少人，只是行贿而不受贿，以致死后萧条没有一点积蓄，老婆因贫困而不能在归绥生活，跑到乡下另行改嫁，留下的一个独生女儿，也就成了农村的家庭妇女。

傅作义将军离开绥远，因为参加平型关和忻口战役和孤军防守太原，绥远人有七个月不知其下落。到一九三八年四月，“三十五军”因八路军牵制住同蒲路北段的敌人，突然从晋西北通过绥南，前来反攻归绥，人们这才知道这支抗战部队仍然存在。反攻归绥虽然没有成功，但使投靠敌人汉奸感到威胁。傅在山西河曲站稳脚步，便派卜仁山（抗战前省会公安局侦缉队分队长）给刘长荣送来电台。杜晋臣因暴露身份，被日本人扣捕公开枪杀。这一年九月一日，日本人把“蒙古联盟”和“察南”与“察北”三个自治伪政府，合并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仍由德王担任主席，首府移到了张家口，“察南”和“晋北”两个伪政府改为政厅。李守信的伪“蒙古军”总司令部一直留在归绥未动，伪“巴盟”盟长补音达赖因是德王的心腹，也经常驻在张家口，副盟长默尔根巴图尔（亢三）兼任土默特特别旗总管。“巴盟”公署实际由民政厅长贺云章负责。这样除了日本特务机关，归绥成了李守信、贺云章和刘建华的“半个天下”。一九三九年年初傅作义将军离开阎锡山的“第二战区”，到后套组织了“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军统”和“中统”的人，也到了五原和陕坝。这时傅派卜兆瑞任省会公安局局长时的四分局局长包头人裴荟（字子文）打发回包头参加了商务会，收集情报送到河西魏达山在沙畔所设的那部电台往五原拍发，并打发郑心杰（字冠三，曾任袁庆曾的宪兵队长和公安分局长）联系裴荟和刘长荣，这一条线是归“副司令长官部”参谋处的情报科科长郭维周领导。最主要的是华北大部分沦陷以后，“安福系”的王克敏和王揖唐，出任了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即为“华北政府”主席），跟傅作义的绥远财政厅长苏体仁（朔县人，留日学生，受阎锡山指示出任了伪山西省省长，日本投降以后由傅作义保护随阎锡山逃往台湾）。田应璜的二女婿张恺（日本投降后，到张家口给傅办了个兵工厂）担任了“北师大”校长。田应璜的儿子田汝弼，出任了伪蒙政府“晋北政厅”长官（后改为大同省省长），这样苏纪忍在张恺客厅的立式大座钟里安放小型电台，可以把田汝弼、苏体仁和贺云章等处收集的情报，由苏纪忍以“晋南行商”和“凉州土客”（注）的身份，携带到北平，由张恺直接和傅的“机要室”通话，使日本特务机关不易查觉。

蒋介石派到绥远的“军统”大特务高荣，字叫子欣，是跟云继先从小长大的萨拉齐县水涧沟门汉族人。一九二五年受荣耀先领导和土默特旗在蒙藏学校念书的朱实夫等好多人同去广州住的“黄埔军校”四期，故认识贺云章。高荣大约于傅作义没回套以前就到达了陕坝。他来归绥主要是和厚和警察局长刘建华接头，刘早就是“蓝衣社”的人，由万福麟介绍给德王，军统杀韩凤林时，他事先就知道（见德王的回忆录），德王脑筋迟钝，刘建华非常狡猾，德王对他没有怎样怀疑，进入归绥后委刘为警察局长。高荣来到归绥通过刘建华和“巴盟”公署科长梁芝祥取得与德王和李守信的联系，并派马汉三到张家口给德王送通讯密码。高荣在归绥不免要找贺云章，并以蒋介石的代表身份，对贺进行争取。贺云章为了刺探军统在绥远沦陷区的活动情况，也跟高荣有所接触，但决不会跟“军统”的人亮相”。贺对一切爱国人士，都设法掩护解救。对大青山的八路军地下工作人员也一视同仁

---

（注）山西晋南商人，垄断着陕、甘、青、宁的商业，所谓的“凉州西客”和“凉州土客”都是晋南人，其中以猗氏杨家财主势力最大，字号和买客遍布于晋冀绥各主要城市。

予以帮助。奎璧同志生前曾对贺云章的侄儿贺希同志说：“你叔父给咱们也帮过忙。”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五军”攻入包头一天一夜，居民和商号送饭和烙干粮，慰劳从西北门进入半个市区的抗战部队。

“三十五军”撤离后，日寇进行了第一次大搜捕，将裴荟连同包头商务会长董武山，以及刘长荣与归绥“大盛魁”经理段履庄扣捕，刘长荣和裴荟只字未有供出组织内幕，后来都被押送到张家口秘密处死。一九四〇年一月日军攻占后套，三月间“三十五军”收复五原，日伪军受到很大损失，归绥特务机关长桑原自杀，日伪军退回包头，在绥包地区又进行了第二次大搜捕。刘建华着事不妙，便领上吴君玉跑到包头过黄河逃往重庆。日本宪兵队在吴君玉家中搜出小型发报机和“军统”的名单，把贺云章、梁芝祥和托克托县县长肖兆庚扣捕，梁芝祥将德王和李守信与“军统”联络的经过供出。李守信匆忙从归绥跑到张家口，与德王一起主动向驻张家口的日本军部岗部司令官和田中信一参谋长交待，说是“你们不许我们建立蒙古国，我们只好去找老蒋。”日本人因为觉得他们说的很对，并且树立这样两个傀儡颇不容易，马上难以更换，便对此事没有深究。

凡是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一个地区的领导人对人数有限的被领导者，可以说是心中有数，根本用不着建立名单。“军统”和“傅统”是两个特工体系。他们互相监督而又彼此保密。贺云章已经和李守信“焊上”，无须找他的副官吴君玉。在《德穆楚克栋鲁普自述》中，谈到德王和“军统”往来，只是提到刘建华和梁芝祥，并没有提过贺云章的名字。德王和李守信非常恨傅作义又瞧不起傅作义，贺云章非到形势所迫或时机成熟之时，决不肯冒然提出要给他们牵线。梁芝祥和吴忠玉都是热河蒙人，梁在吴家留下不少来往的痕迹，被捕后显然是咬定贺云章为“巴盟”公署的“主犯”，以减轻自己的“罪责”。结果梁芝祥以坦白从

宽而留下活命。贺云章因为矢口否认一切，而被日本人用凉水灌死。

贺云章死后他的二兄贺文化，为了替三弟报仇，跑到托县北德尔图村成立民团，收罗散兵游勇，想望扩充成一支队伍杀上几个日本人，以消忿解恨，然后过河找四弟贺耆寿参加“新三师”或是上山投奔奎璧同志，参加姚吉吉司令的八路军。这个有勇无谋的“噶兰达少爷”又是“二八少爷”因练过武术，在擂台上也许能比划几下，可是对于带兵打仗，却毫无军事知识和经验，根本不懂社会上的复杂情况。结果被一个“老刮野鬼”的土匪混入，在“拧枪下马”哗变时当场击毙。贺云章在被捕期间，虽经严刑拷打并没有胡说，尤其是未将苏纪忍的“特工”组织供出。贺死以后，由替父报仇打入日本宪兵队担任翻译的杜晋臣的儿子杜思恭，代替了贺的“绥远联络站”的领导职务，所以苏纪忍在沦陷区能来去自如，始终未被日本特务机关发觉。

苏纪忍和傅作义直接来往，到了陕坝亦不露面，对外极端保密，知道的人很少。他的夫人田玉册女士（北师大毕业，抗战胜利后任过绥远女师校长），是以家庭教师的身份和傅的夫人在后方一起居住。后来为傅的高级干部眷属团在石咀山创办了“奋斗小学”。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前夕，傅担任了“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后，组织了一个“战地复员委员会”，由张钦担任主任委员，“中统”头子张庆恩和苏纪忍任副主任委员，苏的突然出现，连傅的随从秘书阎又文都感到陌生。日本天皇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接受了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孙兰峰于十三日接收包头，是苏纪忍领导着王英的伪“绥西联军”顾问儿玉尧从西门出来把孙兰峰迎接进去的。抗战期间给傅领导地下工作，抗战胜利后才公开。从家庭出身和历史渊源，以及各种迹象来看，贺云章这个硬骨头铁汉是为“曲线救国”而死。对于参加伪政权的人也应当一分为二评价，贺既不同于补音达赖，更不同于日本关东军所“嘱托”的陶克陶与金

永昌之流。

贺云章死后不到三年，贺耆寿在伊盟扎萨克旗亦被陈长捷屠杀。原来贺耆寿、经革陈、胡凤山和厢蓝旗总管阿灵阿等，于一九三七年九月撤离归绥，追随荣祥到扎萨克旗，把“绥境蒙政会”的关防卷宗，交给沙王后即去了榆林。不久白海风的“蒙旗独立旅”于保卫归绥战役结束后，也从包头昭君坟过河，开到陕北府谷的麻地沟驻防。白海风派任秉钧和康济民，前往榆林向邓宝珊将军洽领弹药，邓和荣祥让贺耆寿和康济民前往西安代表“蒙政会”跟蒋介石的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要求补充装备一支蒙古抗战部队，后来编为“新三师”开到扎萨克旗附近的通岗浪和桃力民驻防。一九三八年春，先是“绥蒙指导长官公署”在榆林开始办公，“绥境蒙政会”也于夏天恢复工作。经过改组，任朱绶光（曾任阎锡山的参谋长）任“绥蒙指导长官公署”副长官，荣祥任“绥境蒙政会”秘书长。因乌盟六旗扎萨克、伊盟的杭锦旗阿王、绥东四旗除厢兰旗阿灵阿以外的总管，都参加了德王的伪蒙政府，故委员短了十个人。所以“绥蒙指导长官公署”把贺耆寿，经革陈，胡凤山和沙王的干儿北平雍和官白大喇嘛与姘妇所生的白音仓都增补为委员。蒋介石为了笼络沙王，还让沙王担任国民政府委员，并给沙王成立了一个伊盟保安长官公署，派“军统”特务褚大光（东北人）前往伊盟，褚自称其为“保安长官公署”的参谋长，把抗日战争以前，张学良派到杭锦旗给阿王训练迫击炮兵的顾兆忠提升为副官长。他们和白音仓狼狈为奸，欺哄沙王和沙王的儿子鄂齐尔呼雅克图（鄂贝子），白音仓一手遮天，尽往“蒙政会”里边安插“东路口音”的人。荣祥经常住在榆林，经革陈担任了沙王府附近再生召所设的伊盟中学校长。留在沙王府围堡外“蒙政会”的上默特旗人，以及住在萨扎召的“绥蒙党部”特派员赵成璧等（察哈尔人）都受到排挤，贺耆寿非常下练，白音仓嫌他在“蒙政会”碍眼，一九三九年春天傅作义返回后套



时便建议沙王把贺耆寿派到陕坝，当了代表沙王的办事处长。

扎萨克旗是乾隆年间，从乌审旗分出的一个旗，所以又小又穷，牧民成年吃不饱炒米，而白音仓，褚火光和顾兆忠等，拿上沙王领导的好几个机关的经费，从榆林娶上“米脂婆姨”当小老婆，过着吸食鸦片的腐化生活，对于保安队官兵的军饷，克扣不给关发，西协理鄂齐尔巴图和保安队的老瑞排长，对他们早恨之人骨，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之后，蒋介石为了加紧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包围，把白海风的“新三师”调往甘肃，将在山西跟新军磨擦失败的阎锡山“六十一军”军长陈长捷任命为伊盟警备司令，指挥何文鼎“新二十六师”与朱钜林“骑七师”这两部“中央军”，由后套开进鄂尔多斯地区。陈长捷在山西期间就随便杀人，故有个“陈屠家”的外号。他极端反共，一九四一年坐镇东胜不久，便杀了一百多共产党的嫌疑犯，包括乌审旗的台吉奇国贤。一九四二年他为了成为伊盟的“河套王”，开垦了大面积沙梁薄地，以资屯田养兵。这一行动引起全伊盟蒙古官民反对。沙王于一九四二年农历十月初三利用祭成吉思汗陵寝机会，召集各旗王公开会，决定在第二年农历三月二十六日成陵大祭时出兵武装反对。为了缓和矛盾，在这以前曾派白音仓到东胜面见陈长捷，要求其停止开垦。不料白音仓为了讨好陈长捷，擅自答应允许陈长捷开垦一万顷草地，包括伊金霍洛成陵和沙王祭脑包的禁地。所以扎萨克旗西协理鄂齐尔巴图和老瑞排长于一九四三年刚过春节不久，派保安队刺杀白音仓于榆林回扎萨克旗途中。由于陈长捷向沙王索要凶手，顾兆忠等声言替白音仓报仇，于一九四三年阴历三月二十六日，激起扎萨克旗发难和乌审旗响应的“伊盟事变”。

扎萨克旗的起义官兵杀了顾兆忠那一帮人，对土默特和察哈尔的蒙古人没有进行伤害。事变发生以后，陈长捷派“骑七师”贺迪光的十九团，前来包围沙王府，进行血腥镇压。时贺耆寿从

陕坝回来。在“蒙政会”处理公务，沙王父子叫胡凤山召集众人开会，决定派任秉钧到榆林请邓宝珊让陈长捷不要动武，经革陈到东胜面见陈长捷让其勿要把事态扩大，避免再次流血，要用和平谈判方法解决问题。跟贺耆寿的公勤人员，在土旗“老一团”当过兵，他听到“骑七师”已经开到再生召，便劝贺赶快离开“蒙政会”，以免战争开始被流弹所伤。贺奋不顾身，自动要求去再生召劝告“骑七师”停止前进。他到了再生召后被十九团团长贺迪光软禁起来，在发动攻击沙王府之前，被十九团兵士开枪杀害。原因是陈长捷认为行刺白音仓和激起“伊盟事变”都是“蒙政会”中跟“新三师”有来往的土默特旗人鼓动扎萨克旗的“楞蒙古”给闯下的乱子，所以听见贺耆寿到了再生召，便令贺迪光把他就地枪决。贺迪光把沙王逼走后，进入王府掘地三尺纵兵抢掠，因其罪恶深重，师长朱钜林让贺逃跑。胡宗南派绥远籍的黄埔四期学生连钟山为高参，到了鄂托克旗把沙王找回。冬天傅作义随同国民党“军委会”办公室主任姚琮和“蒙藏委员会”蒙事处长楚明善，到扎萨克旗慰问沙王时，对贺耆寿的家属亦进行了慰问，并发了抚恤金，对贺的遇害深感惋惜。连钟山后来担任了沙王“保安长官公署”参谋长，现为内蒙文史馆馆员。据连说贺耆寿在“蒙政会”工作负责，作风正派，他是希望化干戈为玉帛，使伊盟免受更大灾难而死，所以伊盟各旗人特别是扎萨克旗的人提起贺耆寿都表示悲痛和哀思。

一九八六年十月

# 土默特旗保安队始末记

殷石麟 忆述

殷梅园 整理

## 前 言

土默特旗保安队，是一支具有独立性质的地方武装，是以保护土默特旗旧政权和维持地方治安为宗旨的不定编军事组织。在建成到消亡的五年之内，曾经历了几次演变和几度兴衰。这支队伍在旧绥远省的军事斗争史上虽然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但在土默特旗发展的特殊历史时期，却有着特定的历史意义。为此，我作为该部队贯之始终的见证人，愿将这支队伍建成与消亡过程中的若干重要史实记录下来，以供参考。因本人年事已高。精力不济，在记述与分析史料过程中定有不当之处，望乞知情者斧正。

## 一、对成立土默特旗地方部队的酝酿

土默特旗旧政权，是一个在特殊历史时期产生并演变发展而形成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它的特殊结构形式，是清政府和国民党大民族主义向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渗透和压迫控制的集中反映。

土默川地域广阔，人口众多，且处于北塞要冲；向北可由乌拉山口和蜈蚣坝口直入阴山以北广漠草原；向南渡黄河可达晋陕，东西更是通衢大道，连幽燕而接壤宁陇。沃野万里，一马平川，又有黄黑水系网络其间，素有米粮川之称，故而多少年一直是历代统治者垂涎不已的风水宝地。特别是近百年来，由于历史演变

的频率加快，它更是责无旁贷地转变为内地羁縻边陲的核心地带。因而它最先打破陈规，成为西蒙地区蒙汉分治的典型。于是，它的政权结构便发生了很多变化，与其它蒙旗相比，其主要有以下三点区别：一、旗县并立，蒙汉分治。土默特旗地域极大，当初曾领属后来的归（归绥）、包（包头）、萨（萨县）、托（托克托县）、和（和林县）、清（清水河县）、武（武川县）、固（固阳县）、安（安北县）九市县，而且人口也极多。据前辈人口传：在清咸丰年间，征伐太平天国，土默特竟能发十万之众，其时人口之多是可想而知的。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到解放前夕，仅有蒙古人口七万余，并且分布在广阔无垠的大地上，其布局更寥若星空，所见无几。人口的急遽递减主要是民国以来，如果说满清对蒙古人口的削减是用宗教形式的怀柔政策，那么到民国则手段用尽无所顾忌了。除了喇嘛教的传统手段外，官兵、盗匪、灾荒，真是天灾人祸无所不加。于是在督军、惯匪（如卢占魁、杨猴小等）交相荼毒之后，土默特旗土著蒙古人日渐稀少，而客籍晋、陕汉人与日俱增，于是政体也相应发生了变化，旗县分治的蒙古地方政权应运而生。土旗便是首当其冲。二，不设王爷，取缔世袭制，而且旗的最高统治者往往因时而易，并不一定是土默特旗蒙古人，而民国以来就多由汉族人来掌权，从满泰之后才总算是结束了这种命运。三，没有一个明确隶属旗政权的独立军事组织。最初只有一些为数不多的矿巡队，来保护作为土默特旗不动产的大青山矿藏，后来又发展为马卫队，由原先的六十余人扩展到一百余人，一则护矿山，二则平匪患（当然是零星小股土匪）成为一支地方部队的雏形。但是，土默特旗蒙民居住分散，管理多有不便，加之近几十年一直兵荒马乱，故而从地方人民到总管衙门都需要有为数可观的军事力量来保护，为此，在三十年代初期，这个问题又一次被提到旗领导集团的议事日程上来，但由于绥远省当局的制约和历史条件的限制而未实现。

## 二、一场春梦

虽然土默特旗成立保安队在三十年代没有成为事实，但这种念头却从未被打消，以至在抗战爆发后的第一年便搞了一个不愉快的编排，成为保安队建置过程中的一个难忘的序曲。

一九三七年七月底，日军向西推进，步步逼向绥远省。当时的绥远省只有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和白海风的一个骑兵旅，而傅作义将军已率部驰援山西。因此兵力单薄，抵御日寇势在必败。因而，绥远省各级政府机构撤的撤，散的散，迅速解体。各级官员和工作人员也纷纷避乱各奔前程。这时作为绥远省十八旗的首脑机关绥境蒙政会也名存实亡。当时的委员长沙王（伊盟盟长沙克多尔济扎布）已安居沙王府，其它委员也纷纷回旗，只剩下土旗总管兼蒙政会委员、教育处处长的荣祥一人支撑门户。在这风雨飘摇战事频仍的时刻，马占山却站出来，想趁乱创业，开拓绥远地区的百年基业，并拉了一个当时已有名望的土默特旗总管荣祥先生作助手，以壮声威。而荣祥先生也雄心勃勃，亦想相机而图，建置地方武装。于是在向包头撤退的途中，一路招兵募丁，到包头后连原先的马卫队和蒙政会的一个警卫排已有二百余人，将蒙政会的六箱快枪发放，于是一支地方骑兵部队便在这多事之秋迅速诞生了。马占山闻讯后力劝荣祥先生将这支部队编为他属下的一个蒙古骑兵旅。荣祥应允，并延请老行武出身在包头闲居的李根车出任旅长，由我任参谋长。当时马占山在绥东积极部署防御工事，意欲拒日军于归绥东、南两隅，并又将荣祥请到归绥为他压阵，安抚地方。但日军攻势却日胜一日，不久便抵达大黑河东、南岸，向马部发动猛烈攻势，使马占山部遭受重大损失，渐渐不支，于是我奉坐镇包头挺进军总司令部副总司令黎伯豪之

命，带一列车到归绥去接马占山的部队。当我抵达归绥时，形势已十分危急，日军的野炮已能打到城内，街上人声嘈杂，尽是逃难的人。因马占山的主力已沿大青山向西撤退，于是我迅速将荣祥夫妇接上列车，载着数千难民一同向西仓皇驰逃。

到包头后，我也无意于所谓的骑兵旅，李根车因未参与组建，也不常到旅部办公。总之，一切都忙无头绪，很糟糕。我们大家都感到此时组建保安部队实在意义不大，只能增加麻烦。果然，没过几天，日军便抵达磴口一带（今包头糖厂一带），马占山组织力量进行阻击。荣祥先生认为包头确失无疑，便决定渡黄河去伊盟，由于经费和给养不易解决，我们只好忍痛割爱，将这支苦心经营起来的部队丢在包头，只带走一个警卫班和一挺轻机枪。而这支队伍后来竟成了李根车等人置身日伪士林的资本。9月初，我们一行三十余人（当时还有达拉特旗康王及随行十余人）从包头官渡口过黄河，在荣祥先生率领下踏上了伊盟的土地。于是借蒙政会的名义和力量为土旗建立一支地方武装的春梦便随着日军步步紧逼的紧张形势而成为泡影。

### 三、土默特旗保安队组建的原因及经过

一九四一年秋，由于土默特旗人和榆林方面的秘密策反，日伪驻清水河县保安大队长任殿邠，率部反正。这支队伍共计一百二十余人，多系土默特旗人。下设两个中队，云天飞、贺礼贤分别任中队长。这支部队沿黄河上溯而行，进入准格尔旗黄河以南地域时，被当时驻防该地区的国民党二十二军高双成所部段宝山骑兵团全部缴械并押送到陕北神木县，每人发给一张锹，组成一个工兵连。这些土默特旗人均感到上当受骗，前程莫测，加之思乡心切，于是纷

纷逃回黄河北岸日伪沦陷区，这支部队便迅速瓦解，只剩下任殿邠、云天飞、贺礼贤拖家带口，不易离去。为了恢复队伍，任殿邠苦心经营，奔波于榆林、陕坝之间，后终因积劳成疾，于一九四二年冬病逝于陕北境内。一九四四年十月，傅作义将军才批准将这支部队改编为土默特旗保安队。当傅作义将军将这个决定电告蒙旗宣慰使署秘书长荣祥时（当时任蒙旗宣慰使的沙王总也不去榆林，所以日常事务皆由荣祥主持）荣祥先生即刻复电，告诉任殿邠已死和部队基本瓦解的情况。傅作义将军不久又来电说：人员可以重新招募，队长一职希荣祥先生代为推荐。荣祥先生便将我推荐给傅作义，并责成我负责组建工作。（我当时是绥境蒙政会民治处主任）不几日，我便同贺礼贤一起去陕坝，谒见了傅作义将军（当时已任十二战区司令长官），请示部队编制方面的若干事项。傅作义将军以为按原编制一百二十人为好，但因诸多困难，只给了六十个人的棉军装和一些子弹、手榴弹之类的简单武器，枪枝却一枝未付。我们在陕坝、榆林、达拉特旗招募新兵九十余人，由榆林荣祥先生处取回三十余枝长枪和两挺轻机枪（这两挺机枪是荣祥先生由重庆带回来的），加之我在达拉特旗保安队任参谋长时存下的十几枝长枪和十几枝手枪。把九十余人分为两个中队，每中队四十人，由贺礼贤、云天飞分别任中队长。于是，这支在清水河县保安大队空架子上勉强拼凑而成的土默特旗保安队在抗战的第七个年头于达拉特旗乌兰甲坝镇正式成立了。这支部队驻屯在乌兰甲坝镇，归驻伊盟的暂三军军长安春山指挥，但一直未经战火，简直象大财东家闲养的一批家兵。

## 四、回师土默川

一九四五年六月下旬，我接到安春山军长的命令，率部返回土默川。当时我的便衣队常回日伪区办事，因而家中得知我要回去的

消息，于是我的侄儿百岁，从美岱召跑到达拉特旗，给我们当了一个可靠的向导。在一个下午，我们来到达拉特旗东端的一个小村庄里，这里离黄河很近，大约只有十余里。因当时的渡口封锁极严，大村子又易于暴露，所以想由这个小村子向北渡河而去，结果还是走漏了风声，一连三个夜晚，河对岸不时都有日军汽车和马队开过，防范很是严密。第四天，我们只好佯退，向西撤出二十余里后潜伏休息，黄昏时偷偷摸进河岸，租了两只小舢板，开始渡河。由于船小，每次只能渡十人，而马匹还只能涉水而渡，从晚八点钟启渡，到十点才全部过了黄河。一路急行军，十二点钟到了八份子村。在这里略作休息，当地老乡们为我们做糜米饭吃。一点钟又急急赶路，向正北方向的美岱召村进发。我们在拂晓，即五点钟时，从东老藏营子与何家圪窰村之间穿越铁路，清早便安抵美岱召。

我在临过河前便决定驻在美岱召，并派人做了详细的侦察了解，因为这里对我来说有三个极为有利的条件：第一是故乡，人熟地熟，易于开辟工作，兵员粮草都较易解决；二则背靠青山，攻守皆宜，利于战事；其三是离铁路较近，便于控制交通。我把队部安排在天主教堂内，便开始做回来的各项工作。当时我们是以抗日部队的身份标榜自己，因而乡亲们都显得很热情，在混乱中避风的一些散兵游勇也纷纷投身到这支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抗日队伍中，而且其中许多人还携有武器，因此，不到半月功夫，兵员便迅速发展二百多，并拥有一百二十余条长枪和两挺轻机枪。当时日军已穷途末路，不敢轻易出动，对这边沿山区更是鞭长莫及，我们便能安心地在美岱召一带招兵买马，安抚乡民并协助处理地方事宜。



## 五、袭击何家圪窰

在美岱召村驻了一段时间，部队的吃粮开始紧张，因为乡亲们的存粮也已不多了，于是有人出主意打何家圪窰，抢日军红粮以解燃眉之急。我考虑再三，认为可行，于是召开地方村、保长会议，让他们出人出车协助运粮，大家一致表示支持，很快便征调了八十余辆骡马车和四十余辆牛车。当时在美岱召还驻有自卫军一个连（约六、七十人），他们也愿意参加这次行动，于是决定两家合兵强袭。当时我们出动一百五十余人，他们全部出动，总计有二百，其实当时何家圪窰城围中并没有多少军队，只有十数个看管粮库的士兵。那天下午，我便派出十几个人化装进城，收缴了看守士兵的武器。黄昏时分，大队开进城围，匆忙装运粮食。当时车站上也没有多少队伍，并且不摸底细，更不敢轻举妄动，只得给当时包头与萨县的日军司令部去电话求援。一个小时左右，日军的铁甲炮车开到美岱召车站，用重机枪向我城头部队猛扫。城墙与炮车之间仅百米远，连日军炮车上的太阳旗都清晰可辨。日军火力很猛，不一会儿，便将城墙垛口一扫而平。士兵们没有掩身之处，完全暴露在土城上，幸好夜色朦胧，还不曾有伤亡。因而，我只得下令撤退。由于时间仓促，只撤走八十余辆骡马车，四十余辆牛车未装好粮食尽被日军截回。打开粮库的时候，附近村子的老乡们都来抢粮，很是热闹。

回来后，我又委托地方伪乡政府去日军驻地要回被扣留的四十余辆牛车。于是，我们这次行动，在无任何损失的情况下获得意外的圆满成功。这八十余车粮食，不仅解决了部队的吃粮问题，而且也减轻了地方乡亲们的负担。

## 六、收编十八团

由于德国希特勒独裁政权的彻底崩溃，加之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后期的失利和苏军的对日宣战，侵华日军面临灭亡的深渊，于是绥远一线的日寇也心灰意懒，做好了全线撤退的准备。而当时依附日军势力的伪蒙军也深感前途莫测，惶惶不可终日。于是，我们在回绥以前，还顺势收编了伪十八团三个骑兵连，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在打何家圪圙后不久，我的一个亲戚来找我，他叫孟占高，当时在十八团当兵。他一见我便把我唤到外面悄悄对我说，是一连长张锁和三连长王云亭派他来的，并说他们已从达拉特旗秦油坊开到何家圪圙，听到我的音讯后张锁、王云亭便让孟占高来商洽归编土默特旗保安队事宜。张锁和王云亭原先给我当过卫士，在由包头撤退时我将他俩与胞弟一并安插在李根车的骑兵旅中，后来李根车攻打后套时被俘，因与荣祥先生交谊甚厚，故傅作义没有枪毙他，却给当时在重庆的荣祥先生去电问询如何处置，荣祥先生复电说即日返回，容日后研究。当荣祥先生回陕坝后，与李根车同吃同抽，亲密备至。而傅作义也乐得做个顺水人情，交付荣祥处置。后来荣祥先生以李根车年老昏聩不必为虑为借口，求傅作义将军将他放归土默川。而起初留在他部下的张锁、王云亭便辗转到了十八团。如今日军已夕阳西下，他们不敢贸然行动，故而觉得我这里熟人旧谊，且又有抗日大旗作虎皮，可以避难一时。我当时顾虑重重，认为此事实实在棘手。不管吧，旧人故情，何况在人危难之际，收编吧，十八团团长李秀山、团副云景贤与我是蒙藏学校的同学，又与我胞弟曾有金兰之谊，恐担不义之名，真是左右为难。故而第二天我冒雨前去何家圪圙与他们面商此事。李秀山热情地接待了我并留我住了一宿。晚上夜深入静，我

便谈及他们的出路问题。我说：“伪蒙军目前已临深渊，应该及早决断，如果回到归绥，即使没有危险，恐也难免上前线卖命，不如回土旗，人不亲土亲，诸事总好照应。”他们两人面上似有难色，虽然也没说出不合并的话，但总是百般回避，说他们不敢专断，需请示包贵廷方可决定。我看无望，也便东聊西扯，不再谈此事了。于是一夜谈叙并无结果。我想，他们也许另有打算，不愿屈从就驾，也就不再往心里去了。第二天上午吃过饭，我要返回美岱召，孟占高装作送我，悄悄对我说：“三位连长想见见你。”我觉得在此诸多不便，就告诉他今后有机会再见吧，便匆匆返回美岱召。傍晚六点钟，接到傅作义电令，让我在十二点之前接收陶思浩车站，于是，我略作安排，使命部队向陶思浩进发，这时已是夜九点多。我带十余人，先到了美岱召车站，向站长借压子车。站长说坏了，于是又整修到十点多钟。夜间十一点多时，我们从美岱召车站开出，夜间十二点多，便先让部队一步抵达陶思浩车站。当时，最后一批日军刚刚撤走，站长和工作人员正惶恐不安。我对他们略示安慰，然后全面接收了车站，并将部队驻在村镇里。

几天后，传令兵报告说十八团赴绥途经此地，要进村打尖，我当即命令岗哨放进城围。中午，张锁、王云亭、李成森三位连长来见我，再次说明归附之意。我将李秀山，云景贤的意思告诉他们，并婉言谢绝。他们最后声称，如果在回绥之前尚无托身之地，便进大青山刮野鬼去、决不到归绥冒风险。我真是骑虎难下，收编了他们，必担拆台之嫌，不答应他们，倘若这六百多人马果真哗变进了大青山，将对地方贻害无穷。这对于我的地方治安工作无疑是致命之症，将来又如何能摆脱这种恶果必然强加于我的罪责呢？权衡利害，我断然不能袖手旁观。但为了不伤和气，我便决定不在陶思浩收编他们。于是对他们说：“祸害地方可千万使不得，于大家于自己均没有好处。但我也不能现在收编你

们，必须换个时间、换个方式才行。只要十八团从这里开出，无论何时、何地谁来投我，我都双手欢迎。”下午两点多，十八团从陶思浩开拔了，刚走出不足十里，三位连长便丢下团部数十人带着三个骑兵连返回了陶思浩，加入了土默特旗保安队的行列。这样，土默特旗保安队增加了六百余人的生力军，顿时气势大盛，成为一支拥有九百余人的地方军事力量。

## 七、接收土默特旗政权

在陶思浩又住了几日，也就是八月中旬的一天，突然接到十二战区司令部金副官长由包头打来的电话，说傅作义将军要回归绥，次日十点钟经过陶思浩车站，命我部严格执行警卫任务。第二天一早，我便将车站周围和附近铁路沿线部署了双层岗哨，我在站台前专候列车的到来。九点半以后，一列铁甲炮车开了过去，紧接一列军车便开到了，车上是一团全副武装的战士，但都没有下车，只是从车上向外张望。不一会儿，专列也开到了。一停车，金副官长便急急走下车来，让我上车，说傅作义有事见我。我于是随他急忙上车谒见了傅作义将军。他要我简单收拾一下，随他同车赴归绥去接收土默特旗总管衙门。我简单地向傅作义将军汇报了收编十八团的事，他深表赞同地说：“好哇！现在正是用兵之际，能收编多少，就收编多少，至于军队的编制嘛，到时自然会给你们们的。”我于是下车安附了一些军务事项，带着副官、卫士十余人上了车，同当时的十二战区司令部同车抵达了归绥市。

当时的归绥城，日军早已退尽。孙兰峰已以先遣军总司令的身份率先抵达。因而，归绥已全部控制在国民党手中。我一回到总管衙门，便将行政诸项事宜冻结，候荣祥先生回来处理。我自己首先收编了当时旗政府的三个骑兵连，并归到土默特旗保安队

中。这三个连共计六百余人，三个连长是王秉一、满纳胜、吴占云。此时的土默特旗保安队约计一千五百余人，达到了它空前绝后的最高程度。不久，我又派人从伊盟沙王府接回了荣祥先生。

由于傅作义捷足先登，截取了绥远省的几乎全部抗战果实，并拥兵自雄，欲将共产党的势力彻底排除尽净，所以尽力扩充军队，力图形成军事上的绝对优势。但他久经战火，深知失去军事实力的危险，因而采用了利用蒙旗部队和日伪蒙军打内战的蒙区绥靖政策，而土默特旗保安队和准格尔旗部队的整编便是这一政策的具体表现。九月初，傅作义将土默特旗保安队和准格尔旗部队分别改编为蒙古骑兵第一、第二旅，并且迫不及待地都推到了反共第一线。骑兵第一旅由荣祥先生任少将旅长，而傅作义又派亲信李作栋任副旅长，下设两个团，第一团团长满纳胜，我任第二团团长。我团下设三个骑兵连和一个步兵连（这是我的基本部队和十八团的三个骑兵连），当时荣祥名为旅长，其实也没工夫过问百里之外的军戎之事，身为副旅长的李作栋便算全权代表，但对这两个团又有点宜调不易管。我们两个团分别驻在和林县公喇嘛一带抵御解放军。不久，形势紧张，荣祥先生密令我回归绥，于是我便委张锁代理团长，指挥全团，而我则带一个排迅速返回绥。一九四五年冬，这两个团有部分官兵举行兵变，与解放军协作，于是这个旅在此老齐一带彻底崩溃。这些关于战败和一部分人投诚的事是我后来听部分逃回的官兵讲的。总之，土默特旗保安队在充当反共小丑的短暂日子里，便走向了溃灭的路。

## 八、东山再起

在我回城后的第三天，（一九四五年十月二日）解放军便包围了归绥城。城中顿时陷入一片混乱，我也是进退两难，只得在家闲居，听天由命。三个月后，即一九四六年元旦之后，解放军自动撤兵，城中的国民党人相互庆幸，又恢复了一片生气。与此同时，土默特旗保安队改编的骑兵第一旅覆灭的消息也传到我耳中，我虽然自觉晦气，但想到幸免于难，又不觉沾沾自喜。三月份，贺礼贤的步兵连有一百多人逃回，（因两个骑兵团在溃败时，步兵连并不在场，故能幸免），又收编了当时流窜在察素齐一带的日伪散兵部队郭存贵部八、九十人，并收纳了召河锡林莫赖召护召部队齐力布骑兵九十余人。计三处人马二百八九十人，重新组织了土默特旗保安大队。共设三个中队，第一中队队长贺礼贤，第二中队队长郭存贵，骑兵中队队长齐力布。我任大队长，贺礼贤兼大队副。于是土默特旗保安队又算是死灰复燃了。

一九四六年，解放军主力因战略需要撤出绥包沿线，国民党军队又迅速控制了铁路沿线一带城镇村庄。于是我们许多人便以为靠数百万计的国民党正规军和美国的强大援助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忽略了国民党本质空虚和日趋衰亡的客观事实，更热衷于扩充兵力和抬高身价。一九四六年冬，我们又通过当时任土默特旗煤炭总局局长的满纳胜，收编了刚由达拉特旗流窜到萨县的云德胜部一百二十余人。并招募了数十名新兵，通过荣祥先生同董其武将军磋商（当时傅作义已去北平赴任，绥远省主席一职由董其武将军代任），将土默特旗保安大队扩编为土默特旗保安总队。由我任总队长，下设两个大队，第一大队队长由我兼任，贺礼贤任大队副兼第一大队第一中队队长，第二中队队长薛有德，骑兵中

队队长齐力布。第二大队队长云德胜（此人在职两月余便辞职离去，由大队副满纳胜接任），大队副满纳胜（满纳胜任大队长后，云存瑞任大队副）。第一中队队长云生祥（云生祥不久也离职，由大队副云存瑞兼中队长一职），郭存贵任第二中队队长。二大队起初驻防萨县土默特旗煤炭总局，后调驻毕克齐镇。第一大队仍住察素齐，而齐力布骑兵中队始终未离开召河锡林莫赖召一带。

一九四八年初夏，解放军攻击驻守察素齐镇的王有功部，使王有功部溃败而逃，几致覆灭。与此同时，驻察素齐镇的土默特旗保安总队一大队贺礼贤部，起义投诚，随解放军一道撤走。而驻毕克齐的二大队，虽未受挫伤，但于前不久因郭存贵弟抢人一案、解散了该中队，因而，此时土默特旗保安队只有云存瑞一个中队（原云生祥中队）和遥遥相望的齐力布骑兵中队，真可谓名存实亡了。这年冬天，贺礼贤带走的两个中队有百余人逃回，并裹挟了王有功部一个排（因在解放军整编时，贺部与王部的部分士兵编在一起）。我于是又重新进行编排，将两个残缺大队编为一个大队，满纳胜任大队长，云存瑞任大队副兼第一中队队长，第二中队队长×××（记不确切），骑兵中队依旧。除齐力布外，其余都驻守在毕克齐。

一九四九年三月间，绥远保安司令部批准将土默特旗保安总队扩编为保安司令部。由荣祥先生领衔组织，司令部就设在总管衙门院内。荣祥先生兼司令，领中将军衔，我任副司令兼参谋长，领少将衔。下设参谋处，副官处，军需处。参谋处主任克寿卿，领中校衔，副官处主任赵魁武，领中校衔，军需处主任王哲山，领中校衔。有一个武器修械所，近二十人，能修一些武器和造一部分劣等枪枝。一个卫队随驻司令部，队长云根邦，主要任务是护卫和岗哨。此时的土默特旗保安部队，编制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实力却日渐衰退。这场闹剧眼见得是接近尾声了。

## 九、归宿

一九四九年春，傅作义在北平和平起义的消息传到绥远，在军政界掀起轩然大波。而且，解放军的势力也更为明显地扩大，将绥远省的国民党军队包围在归绥以东不到百里和包头以东这一段铁路沿线的狭长地带里。这形势使董其武将军不敢轻举妄动而采取观望态度。而我们土默特旗保安队更无疑是一种虚设机构，几乎没有什么战斗力可言，也仅能维持地方治安而已。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和与战都不由我们选择，而又没有弃暗投明的勇气和能力，只好苟延残喘，唯绥远省保安司令部之命是从。不久，议和的呼声愈来愈高，在以董其武为首的主和派努力之下，更兼之有傅作义赴绥的现身说法，绥远省起义已成定论，并双方达成协议。八月底九月初，董其武派代表去张家口表明心迹，以示欢迎，于是荣祥也派我和几个同僚到集宁以蒙旗代表的身份表示欢迎解放军赴绥。

“九·一九”起义后，我按照土默特旗政府的指示，责成参谋处克寿卿主任校对兵册，清点武器、弹药并附表造册，由主管该项事宜的土默特旗公安局长任儒验收。此项工作一直进行到四九年年底才顺利结束。从此之后，土默特旗保安部队便回到人民群众之中，结束了它五年多反共反人民的历史。

（殷石麟：政协土左旗委员会常委）



# 忆我在抗日时期

张希孟

## （一）打日伪军

抗日初期，我所在的部队是国民党骑七师。一九三七年元月，我在中央军校十期骑兵科毕业，被分配到这个师十九团四连任少尉排长。骑七师师长门炳岳，是保定军校五期生；十九团团长朱炬林，黄埔六期生；四连连长丁之敬，黄埔六期生。该师是由三个骑兵旅改编成的。在当时来说，装备最好，一律德式：德式钢盔，德式八二迫击炮，德式马克沁重机枪，德式捷克轻机枪，捷克七九步骑枪；马的装备也是德式洋鞍，每人有防毒面具。我任第一排排长。二排长赵天榜，行伍出身；三排长沈尚武，行伍出身。驻地在凉城。

七月初，我父亲托人去凉城，拿着信，还有本年女子师范毕业生狄佩兰的像片，征求我的意见，我同意了。准备本月二十四日在归绥订婚。到十五日，我去团部请假，团长朱炬林，副团长陈陶异口同声地说：“师长来了命令，一切假一概不准，部队马上要出发抗日。”我当即回信让改期订婚。

三天后，部队由凉城出发到卓资山。第二天，前进到陶林，二十团、二十一团，师部一齐会合，向驻商都蒙伪军段宝山进攻。这次战役，由董其武先生指挥。董老所部两个步兵团：四三五、四三六。任务是骑七师攻外围山口碉堡，步兵主攻商都城。次日凌晨三四点进入攻击阵地。因联络信号不明、发生误会，自己打起来，惊醒城里伪军，以此造成困难，一早晨牺牲三四百人。

攻占商都后，由骑七师十九团驻守，步兵当即调到平绥铁路向东进攻，在柴沟堡与日军相遇。经过一场激战，傅作义先生所部三十五军撤退到山西。几天后，日蒙联合进攻商都，以猛烈炮火轰击，飞机轰炸。十九团撤出商都，仍由旧路退回陶林。日军进迫陶林，我们阻击一天。我的同学洪任吉战死在陶林城下，另一个同学王清逃跑了。日伪联军继续进攻，骑七师由武川、固阳退到包头。

我请了三天假回归绥探家，当我回到关帝庙街一号时，门已上了锁，全家人都逃到了托县，我赶到托县又说已到河曲，我恐误了假期，赶急返回部队。这时，绥远省已成无政府状态，火车上逃难的人很多。说来凑巧，竟在这列车上认识了狄佩兰父女俩，并让我到包头就跟她结婚。我以军人任务在身，诸多不便，推辞了。火车到了包头，我给他父女俩雇了辆车，问了他们详细住处，送他们上了车。

这时已夜幕降临，我急去黄草洼团部销假。一跨进门，副团长陈陶迎着说：“赶快归队，现在马上出发。”我一个跑步回到二里半，队伍已集合，通讯兵赶忙把马交给我，上马就走。到了昆独仑河，时已夜半，来了个洒水渡河，到对岸已近天明。正在烤衣物之际，两架日机又轰炸，又扫射，炸死两人，伤三人，死马四匹。三天后才到达阿套川。我驻守西山咀碉堡内，门炳岳坐镇五原，开始整训部队。有日伪石玉山部骑兵和安华亭步兵投诚。石部编为骑四师，安部编为五旅，扩大了河套抗日阵容。日本军主力部队再没西向进攻，只派有小股骑兵常向西山咀袭扰。过春节，骑七师二十团攻击了安北县，我的同学于耀荣阵亡。第二年（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九团奉命进攻土黑麻淖（三顶帐房南三十里）日伪绥西联军李根车、三罗汉部五百多人。我们由鞋匠店到段四圪旦下马，这里离土黑麻淖四里。夜晚三时，二、四两连开始向土黑麻淖徒步进攻，拂晓攻占土黑麻淖，击毙伪军数

十人。三排沈尚武每次作战，他总跑在我前头。攻进十字街，直攻到大庙前门，将门堵着，抛了四个手榴弹，打得庙内三罗汉部呱呱乱叫。正在此时，忽然沈摔倒。这时，天已发亮，我看见他胸部淌出不少血，赶紧派人上去拉他，上去的人腿上也受了伤。这时李根车发现我只有二百来人，马上下令四面包围。二连李登良连长可害了怕，乱嚷乱叫：“丁连长，赶快退吧！”丁连长手拿自来德，大喊：“四连不许退，赶快进院上房！”眼看二连都跑了，四连守着两个大院，在房上抵抗，只死了排长一人，伤士兵一人。二连连长阵亡，三个排长，四十多名士兵也阵亡，副连长阮登云受伤，团长派出一、三连，迫击炮连，重机枪连，才把四连的围解了。此次战斗伤亡最大，原因一是团长估错了敌人，认为绥西联军李根车部都是些乌合之众，不堪一击，所以只派两个连；二是用人不当。李登良外号大草包，有名的孬种，可三个排长都是久经惯战的勇士，跟上李登良送了命。国民党的部队只打瞎仗，胜了也不研究，败了也不检查。

在返回五原的路上，我得了重感冒，到五原县已发展为伤寒症，二十天没吃东西。那时医药缺乏，医院因伤寒死去的人很多，我的病也十分沉重，有时清醒，有时昏迷，第二天病轻一些了，部队又要东进，去攻包头，我没有走，在五原休养。适逢军校四期生李尉英成立骑四师政治部，叫我去当干事。几天后，四师由五原开往神木，我随着到了神木，遇见了大舅霍世显和陈志仁。他们要成立自卫军第四路，没有军事人才，让我和他们一起干。我跟霍世显到了榆林，见了外祖父霍国祯，外祖父让我去安康看我父亲去，我说要跟大舅成立自卫军。我三舅霍世昌说：“你大舅守土抗战，守着大烟土，在炕上战呢！他要能成立军队，我不姓霍，可别跟他误了前途。”我于是决心去安康找父亲。

## （二）延安印象

从榆林乘商车到西安，路过延安。延安是革命的摇篮，抗日的圣地。提起延安，我十分好奇，这里是共产党的根据地，陕甘宁边区政府所在地。我没见过共产党，路经延安，我可要好好地观察观察，共产党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能使蒋介石那么害怕。

当汽车到达延安，正是中午，人们要打尖吃饭，正合我的心意。当我在饭馆吃饭时，便有两三个女同志来说快板，宣传抗日。饭后，我便跑到街上踟蹰。街头巷尾到处是醒目的标语，都是宣传抗日。也有街头说快板的，演小型话剧的，也都是宣传抗日。来往的男男女女，三三两两，都唱的抗日歌曲。南望一排排都是窑洞，北面高耸的灯塔也发出抗日的的光芒，延河流水潺潺，到处是简单朴素，整齐划一。在这里看不到呢衣服，武装带，更没有西装革履，人们一律着粗布衣裳。有人看见我是少年军官，就盘问我，知道我是由前方下来的，就劝我留在延安参加抗日。可惜我没有觉悟，对共产党戒心很大，唯恐被留下。汽车发动机一响，我赶快上了车。现在回忆起来，当时由圣地延安培养出千千万万意志坚强的铁汉，他们在全国各地，忍饥受饿，冰天雪地，披星戴月，受尽千辛万苦，牺牲了多少宝贵的生命，紧紧拖着日寇。武士道的日寇，提到“八路的干活”也是谈虎色变，非常害怕、非常憎恨。由此也可想到当时共产党八路军对日寇的沉重打击所起的抗击日寇主力军的作用。

### (三) 安康之行

离开延安，不久到达西安。一下汽车就有人来查护照，这人是宪兵队的，可穿的是便衣。我所拿的自卫军护照已过期四五天，他当即给撕了。我很生气地质问他，他随手打了我两个耳光，我破口大骂，忽然过来几个武装宪兵把我用绳捆了，拉着就走，看的人都在咋舌惊惶。

到了宪兵队营部，半天来了个少校营长，开始审问我：“你从什么地方来的？”我说：“榆林。”“你以前干什么工作？哪个部队？”我说：“骑兵第七师十九团四连少尉排长。”“为什么用假护照？”我说：“不是假的，是我从榆林自卫军总部开的。”“护照过期，你还要野蛮骂人，你知道我们宪兵队，中将上将我们也有权管。你有文化没有？”我说：“我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十期毕业生。”他马上站起来了，“我问你两个人，你可认识韩恩瀚？”我说“是我们队长。”“还有鄂友三、张凤翔、于维亚你认识吗？”我说“是我们同乡，九期学生，我和他们很好。”忽然他哈哈大笑，“大水淹了龙王庙，一家人也不认识了。我是九期的。来人！把绳子解了，谁让你们胡乱捆人？”赶忙让我坐下，并让我吃饭。临走时，他低声对我说：“有点对不起，咱们主要还是防八路的（指八路军），以后你有什么困难找我！”现在回忆起来，当时西安、兰州以至整个大后方，防共比抗日也严重。

我由西安坐火车到宝鸡，转乘汽车到汉中，再到安康。我父亲在这里国立四中当校长。这时正在闹学潮。原因是察哈尔人拥护胡子恒当校长，要将我父亲赶走；绥远省的人极力拥护我父亲。物理教员陈明达，是当时校方的权威人士，在陈的维护下，我父亲没被挤掉。我住了半个月，四舅霍世诚每天领着我吃馆子。我

感到抗日的大后方，比之延安太落后了，没有一点抗日气氛。争权夺利，互相倾轧排挤，弄得一塌糊涂。

陕南的气候较热，盛夏之际，阴雨连绵，泥泞不堪，交通不便，汽车不能通行。我急于找工作，决心去天水骑兵学校。那里的负责人胡竞先（日本留学生）是我在南京时的骑兵科科长。于是我坐滑竿（二人小轿）到城固。汉江水涨，过渡十分困难。不知是什么部队的连长和排长二人，押着三十多个抓来的壮丁，都用绳子串成一链，硬逼船户过渡。船到中流便翻了，三十多人沉入江中，个别会泅水的也因绳子串着而难以逃生。当时政府对人民生命财产毫不负责，没有正确的抗战教育，名正言顺的征兵制变成了强拉硬拖的抓兵制，抓来的兵怎么能完成抗日卫国的艰巨任务呢？解放后，我在呼市新城区参加过征兵座谈，每次征兵，应征者超过征数几倍。回忆当年，实是可悲可叹！

当我到达西安后，遇到十期同队同学田养农，他在军七分校练习营当上尉连长。他劝我到军七分校工作，并领我到王曲（离西安城四十里）校部去见人事科长孙仁山。三天后下了日令（军七分校组织庞大，每天有调动工作的日令），让我在王曲十五期四总队一大队三队当上尉区队长。从此，我参加了胡宗南集团，前后共六年多。

## （四） 在七分校

军七分校是黄埔军校在抗日战争时成立的。主任胡宗南，副主任周佳宾，办公厅主任罗历戎，教育处长彭克定，上层组织如此。下设四个学生总队，除王曲，还有牛渚镇，凤翔、兰州各有一个总队。每总队三个大队，每大队三个队，待遇一律按照黄埔军校毕业生条例。在金谷洞，还有训练士兵班长的教导团、黄埔村的练习营。胡宗南是黄埔第一期生，浙江人，是蒋的最忠实、

最信任、也是最红的门生。在抗日年代坐镇西北，身兼数要职：西北办公厅主任，管辖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等地区；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所部实力，超出集团军二三倍，总有数十万军兵。军七分校、西安战干团、兰州西训团、警官学校，这些培养军政人员的地方，都是为胡宗南集团服务的。这个西北王，人都称“先生”而不叫名。为人好大喜功，俭朴而不治私产，不娶妻室。有人为其介绍对象，他说：“国将不国，何以家为？”以此而更为蒋所宠爱。范长江在《中国西北角》一书中，也曾介绍。在十五期招收了好些大学生。在他部下，黄、大、浙、一最吃得开，黄即黄埔，大者陆军大学，浙即浙江人，一者指老一师。其人野心很大，将青龙岭改名兴龙岭，有称王霸道之意。他之所以不娶妻室，并非为其所说“国将不国，何以家为”，而是有其内在原因。有一位老师名叫郑重午的和我说过：胡任老一师师长时，在上海嫖妓宿娼，得了霉病（即杨梅花柳病）将生殖器烂掉了，不能娶妻生子，因此也不治私产。这个说法很有道理。天主教神父，不娶妻、私心较少的多，也是这个道理。贪财者大多数是为儿女打算，代代作富翁。

胡宗南既负西北重要落镇之责，当然捧场拥护的人就太多了，各处失意之客都来投效。但是胡本人才疏学浅，庸庸碌碌，不堪大任，内部组织纪律非常松懈散漫，以至形成争权夺利，作奸犯科，贪污腐化，成了藏污纳垢，肮脏龌龊的大集团，又没有人才辅佐。我把他比成三国时的袁绍，扩地盘、拥重而不能长治久安，没经几个回合，就垮台了。回忆当年胡占据中国西北角广大地区，抗日是伪，防共是真。在他所属军七分校、战干团、西训团，经常抓走共党嫌疑分子。但是日伪汉奸在其各个驻军地常有活动。一次日机夜袭中，我在西安城内，去野外躲警报，亲眼看见小雁塔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附近，发射红绿信号。出动了许多军警，闹了一夜，也没有抓到一个汉奸。但我也经常看到刑车

拉着汉奸枪毙，究竟是真汉奸、假汉奸那也难说。在兰州中山陵附近，也常发现被暗杀的尸体，据说是朱绍良八战区司令长官部特工人员干的。他们所做所为，哪是在抗日，实是在瓦解抗日力量。

我被任命为西安军七分校区队长后，住在王曲窑洞内。这里有无数窑洞，是张学良部队当年的宿营地。晚上报到，第二天就参加出操，排教练，我发了个“向后转走”的口令，学生大哗。我可发了脾气，正要骂他们，大队长陈上拔来了（陈是黄埔四期，上校级），问我看过操典没有？我有点尴尬，说实话，我没看操典。他让我回去好好看一下操典。回去打开操典一看，原来操典改了，不是德式操典，根本没有这个口令，原因是军队只许向前，向后转暗含着打败仗的意思。第二天第三天我没出操，第四天来了日令，调我到金谷洞教导团骑兵连当副连长。连长是诸邦俊，黄埔六期生。名为骑兵连，实际没一匹马。诸的老婆作风不正，油头粉面，住在西安，任意挥霍，弄得诸吃兵血、吞公款。以此我和三个排长与诸作对，他也阴谋将我挤掉。不想坏事也能变成好事。有一天，团长叫我谈话，说我在连内搞不团结，连长有报告。我正要说话，团长忽然问我认识他否？我说不认识。他说：“我在十期步兵队当区队长，是黄埔六期，后住陆军大学，名叫刘剑铭，从明天起，你到夏店村一营一连当连长，你拿命令去见方营长。”随把命令交我。二日天明，搬了行李去夏店村见过方营长。方领我到一连。他们站了队，营长宣读命令，介绍了三个排长。三个排长都是军七分校十五期毕业生，都是大学毕业文化程度。一排毕人桥，二排包体臣，三排李佑臣。他们和我说：“看过范长江《中国西北角》以后，投考了军七分校。”抗战初期，逃跑大后方的青年，找不上工作，没有生活出路，不择目的，找个出路有饭吃就成。胡为了阻止青年去延安，想方设法笼络青年，所以成立军七分校、战干团、西训团，这样既可扩张力



量，又可争取往延安去的青年。但到十六期、十七期，质量就太差了，中学生也很少，大部分是小学毕业的青年，有知识的青年都去了延安。我接触过许多高中以上的青年，他们都说延安好，共产党好，许多青年人才都到延安去了。

一营一连三个大学出身的排长，对我有点看不起，指使学兵提难题，问我操典（我担任操典课）上弹道公式怎算？可把我难住了，但我虚心地去问三个排长，他们回答我怎么算。以后凡是难题，我都叫三个排长去解答，他们逐渐对我有了好感。他们说前任连长李剑仇（他是黄埔八期毕业）不会硬装会，使得他们看不起他，以此生隙。我想起李剑仇办了交待以后，和我说过：三个排长很难对付，让我小心。初出茅庐的人，好胜心特别强，我有这么三个排长，就不愁干不好。教导团共有三个营九个连，加上骑兵连、工兵连、交通兵连、通讯连、重机枪连、迫击炮连、总共十五个连。一连成绩第一，学术两科都占第一。团长对我特别好，但营长对我可不怎么样，不如对那两个连长亲呢。后来我才了解到，那两个连空额很多，九个炊事用五六个，逃了士兵不报，所得之钱除了到西安吃饭馆，嫖宿娼妓，晚上就去营长家和营长太太打牌，有意识将钱输给营长和太太，营长常请他们吃饭，因此他们的关系超过了上下级。以后，我也逃兵不报，可是团长点名时，还得去雇人来顶名。所雇之人要教给他们年龄、籍贯、姓名，否则会当场出丑。我不会打麻将，但常给营长送礼，以后营长也叫我去吃饭。在胡宗南眼下的教导团如此，远离百里千里的部队可想而知了。所以，在西安穿呢军服着武装的人到处都是，吃饭馆、看戏，花钱不论数。军官们嫖妓赌博，成了风气。但嫖妓宿娼要穿便衣，穿军装遇有宪兵查，可要吃苦头，轻则打骂，重则关禁闭。在大后方各个城市，卖淫的妓女之多，人数占居民百分之二十以上。由敌占区逃亡到后方的青年妇女，找不到工作，无法生活，很多人做了娼妓。男的偷盗抢劫，司空见惯，不以为

。奇各种各样的损人利己、作奸犯科的事层出不穷，社会风气特别恶劣。

我在教导团呆了七个月。一九三九年春天教导团结束，士兵都分配到各个部队当班长，成绩好的送入十七期深造，我被调到凤翔十六期六总队二大队六队当队长。

凤翔是陕西省一个县城，城形如凤，以此得名。据说是秦穆公女儿公主所在地，尚有遗迹保留下来。坐火车在凤镇下车，离凤翔二三十里，再坐轿车到凤翔。六总队住在城隍庙内，总队长李绳武，黄埔一期生，大队长李焕南，黄埔四期生。总队长年龄资格都老，人称老奶奶，什么也不管。大队长老一师当过团长，很有余资，开了个京剧演员，名叫穆洁佩，成天花天酒地，什么事都推给副大队长。所以形成各队各自为政，怎么干也成。学生逃亡很少，只有少用炊事和工勤，队长们也能捞到油水。然而物价飞涨，办公费不涨，给当队长的造成困难。大部分人不愿干，要求去部队工作，因此对学科进展影响很大。离校部远没人检查，什么事都马虎苟且，得过且过。不打野外演习，带上学生去三十里外岐山周围公庙游览，或去凤镇南马嵬坡杨贵妃墓参观。除了游览名胜古迹，大部分军官打麻将逛妓院。学生随便外出，乱七八糟，什么现象也有。一个人学好不容易，向坏的方面去，是极容易，很快我也随波逐流，同流合污。

有一天，我父亲从安康给转来一封信，发信地址是丰镇小东门外志义成。当我打开信一看，不由的心中忐忑不安，原来是未婚妻狄佩兰的信。信内充分表达了她对我的想念和敌占区青年的苦闷。她见许多爱国青年偷着跑到抗日大后方，但她没有勇气，让我回去接她。这封信给我精神上带来了苦恼。我给她复了信，请她耐心等待机会。不久又来信，内附近照一张，我也给她去信附了照片。如此书信来往半年之久，忽然没有了信息。我十分痛苦，每天以酒解闷。凤酒是国产名酒，离凤翔八里地柳林铺所产。

我每天除饮风酒外，打麻将、逛妓院，习以为常。不久学生结业，分配到部队，调我到兰州十七期十一总队三大队第九队当少校队长。

一九四〇年春，我被调到兰州军七分校十七期任队长。由西安乘汽车，汽路据说是左宗棠当年进军之路，两侧都是环抱的大柳树，称之为左公柳，前人有“春风杨柳三千里”诗句，到现在兰州仍有左之后代子孙。军七分校住在东教场。总队长郭歧，黄埔四期生；大队长张公，浙江人，没学历，老一师当过团长。学生质量很低，大部分是小学生，甘青宁人多。兰州这个地方在抗战中是个军事重地，所以经常有空袭，有防空设备，不象西安那样消极，一点抵抗也没有。兰州驻有苏联空军，南面皋兰山，北面北塔山，西面华岭山，都有高射炮部队，日本飞机每次都有伤亡。人们最爱看飞机作战，每次遭遇，互相争夺领空，拼命往高飞，占制空权，飞到高空，由上往下攻击，被打中了的飞机，失去重心，翻跟斗，冒白烟，摔到地上，机身也坏了，司机都没了尸体，大部烧化了，有人拾到马靴或左轮手枪。有一次击中了日本十几架飞机，空军和高射炮部队争功。后来规定了空军在兰州市三十里外迎击，高射炮防兰州市上空，任务明确。苏联的军需物质源源不断由新疆经过兰州市的黄河铁桥运来，以此，黄河铁桥和飞机场是日机轰炸的重点目标。我们所在的东教场，从没轰炸过，但是一闻空袭警报，还是拼命地跑到皋兰山。我们这里军训很紧张，也很严格，不比凤翔。因为总队长郭歧自己监督训练，躲警报也列入军事演习课来执行。生活紧张是训练部队的不二法门，在这里没有吃酒、打麻将、逛妓院的现象，人们都很疲劳，没有时间胡思乱想，更没时间闲逛乱跑，日子过得也很快。每早起床后，就爬皋兰山，总队长、大队长带头。秋末冬初，天气凉爽，我在爬山运动中受了寒，得了感冒咳嗽病，中风不语，十分严重，去河北医院医治。大夫是德国人，他给我诊断时，我咳嗽了

几声，被他拉到院外去，说我没礼貌，当着他的面咳嗽，我和他生了气，他不给我看病，叫我赶快离开。德式的法西斯主义态度，多么令人可憎可恨。后来去了西北疗养院。院长瑞士人，很客气和蔼，在他的精心医疗下，我住了廿多天医院，病体逐渐好转，返回队内休养。当我不在队的时候，队内发生了两件不幸的事：第一是王福田伙同另两名学生，抢了杂货铺，开了小差；第二是宁夏回族青年马国章、王淮生开小差被抓回来押了禁闭，等我回去处理。大队长张公和三个区队长，要求判五年徒刑，关进陆军监狱，指导员贾志谊极力反对，但是孤掌难鸣，等我回来决定。我去禁闭室找两个人谈话，他们说受区队长打骂，才有开小差之事发生。我说：“判你们五年徒刑，误了大好的青春，你们不悔恨吗？”他们哭了。我说：“放了你们，以后还跑吗？”

“我们感队长恩，死也不那么干了。”我说：“我给你们作了保，再跑可对不起我了。”离开禁闭室，当即去见总队长。郭歧问我：“你能保证吗？”我当下作了保证，去禁闭室领出两个人回到队内。以后二生顺利毕了业。以此我和大队长有了隙，他设法要把我挤掉。我住医院花费了许多钱，亏了公款，他就大作文章，要求撤职赔款。总队长郭歧同情我，给了个撤职而没赔款的处分，同时把我调到骑兵大队第三队当队长。

骑兵大队住在师范学校。阿拉善旗达亲王给买了三百匹马，让我去一条山接马。我和兽医带了三个区队长去一条山。一路经过都是些不毛之地，贫穷落后。冬天冰天雪地，女人们穿着单裤子，只有男人才穿棉衣服，因为男人出外劳动。吃的粗米饭、沙葱菜，几年也见不上白面。吃水要到几十里外用水车拉。在这高原上打一口井实在不容易。没有一个市镇，三五十里才有十户八户人家。

一条山比较繁华，有个市镇，那里出产青盐，数量很可观，成队的骆驼不断来来往往驮运盐，以此形成甘肃北部一个重要的

市镇。

我们接上马往回走，已是腊月十几了。回到兰州，已是春节前夕。过了春节，开始训练马匹，出马操教练。一次，我们在华岭山打野外，发现了些穿军装的瞎子也在打野外，你拉着我，我扶着你，有人说是兰州师管区（是训练抓来的壮丁），又有人和我说那是活地狱，那里生活非常坏，营养太差，所以都害眼病，医疗条件不好，死亡率和逃亡率很大，军官们只顾吃空额，喝兵血，都有钱花。到各地领壮丁，有钱的都花钱雇人顶名，这些顶名的叫做卖壮丁，到了部队就开小差走了，又去别处卖壮丁，有的十几次也发现不了，也有个别被发现的就枪毙了。还有一等有钱人给领兵的团营连长花钱卖放，更有给医官花钱，检查体格时说有病，不能服役。因此，所抓的兵质量很坏，再加上师管区生活不好，医药困难，怎么能不病，怎能不瞎，不死亡？所以有人说是活地狱。从军阀混战年代到抗战期间，我所见到的军队，大都如此，把士兵不当人看待。解放后，我在天津北仓六十八军二〇三师，李副师长（长征干部）和士兵摔跤打闹，我还有点看不惯，现在回忆起来，解放军官爱兵如子，兵敬官为父兄，上下亲密团结，如同父子兄弟，所以才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旧军队官不爱兵，兵仇视官。听说作战中，常有打黑枪，兵将官打死的，如此的部队怎么能打胜仗呢？怎么能担负抗日卫国的重大责任呢？解放战争只短短四年，国民党便被打的一蹶不振。在八年抗战中，如果没有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蒋介石早已被打垮，中国也就亡了。

在兰州军七分校，西训团常发生被暗中拉走人的事件。有天夜晚八九点钟，忽然有个学生报告我：“咱们队杨益走到城门洞，忽然上来两人拉着走了。”我赶紧集合了三十多人，带上武装去追。直到中山陵追上，救了杨，并将那两个人带回来，着实拷打，直打得他们拿出军统特务工作证来。大队长姚黎天怕惹

祸，赶快放了，他们也承认抓错了人。他们要抓什么人，谁也不知道。一九四一年秋天，学生快结业了，由兰州开到西安，我被调到校部骑兵科当科员。科长张绍成，军校六期毕业，在骑七师二十团当过团长，到七分校升任少将科长。适逢蒋介石到西安七分校阅兵，校方让骑兵科派一员导马官，条件是仪表端正，精通马术。科长派我担任。我骑着马走在蒋介石前面，这次我看得最清楚，他比在南京时期可胖多了。阅完兵我把马拉走，蒋上了司令台，胡宗南好象一条狗，摇尾乞怜，紧跟在后面。讲完了话，便坐汽车走了。

一九四二年春天，我父亲带着继母及四弟希峻、五弟希浩，七弟希光，来到西安就食。当时我每月百元薪金，能买两袋洋面。物价一日数涨，有钱的大奸商都投靠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巧取豪夺，任意垄断物资，抬高物价，牟取暴利，弄得通货膨胀，印发十元钞票，不够本身印刷费，所以百元、千元、万元乱发纸币，对抗战前途影响太严重，人民生活困难更不堪设想。他们丧心病狂，国家前途岌岌可危。面临这样一个困难之际，我实在发了愁。我父亲怎么也会失业呢？原因是支持他唯一的人陈明达走了，他便被察哈尔CC派的胡子恒排挤出安康国立四中，想到西安找工作。胡宗南手下人说他是改组派，汪精卫出走，改组派遭殃，到哪也吃不开。我实在没办法，去找刘剑铭（刘任教育处副处长），刘和张绍成商酌后，便派到西安端履门办事处当采购组长。因为这是个很能捞油水的工作。检收组长姚继平，组员果福增，他们在把持业务，但必须通过我。以此三人结成联盟，有油水利益均分。最大的一批货是订购五千件美式雨衣。姚果二人找了个蒋姓成衣局，对了保，订了合同，蒋商领了百分之八十定款，给了我们每人二万元，现交了五百件雨衣，每天请我们三人看电影、看戏、吃饭馆、住开元馆（当时西安头等妓院）。几天以后蒋姓逃跑了，成衣局也搬走了。对有三家铺保，一家是西装

店，只够三万元；一家是铜匠铺，只有万元之数；另一家是同义纱厂。找到门上，人家是同具纱厂，西安同义纱厂，姚、果被扣押了。我因没去对保，以故未押。追查责任，审讯从严。姚、果始终没说受贿二万元之事，所以我没牵连在内。我心中老是忐忑不安。

## （五）奉派伊盟“工作”

一九四三年，伊盟扎萨克旗人民反抗国民党陈长捷血腥屠杀的斗争，报到西北办公厅。胡宗南早想插手宁夏和伊盟，当即派少将高参连钟山（字子鸣，绥远省人，黄埔四期），带领三名随员，二十多个绥远和伊盟学生赴伊工作。我来了个毛遂自荐，所以，派我和王静山、贾志谊三员协同连带领学生二十多人赴伊盟工作，随带电台一部，手枪四支。临走时，胡宗南亲自接见了我们，并以张骞出使西域，班超投笔从戎勉励我们。我把贪污所得两万元交给了父亲，父亲和刘珠做买卖，我放心地离开了西安。经宁夏过黄河，雇了骆驼，来了个夜行军。当时夏季，什么也看不见，只觉得一阵一阵刺鼻的沙蒿味。连钟山当过额济纳旗专员，对做蒙旗工作很有研究。我们沿路派蒙旗学生当前哨，探消息。

第二天早晨，奇尚正来报，说鄂托克旗没有变动（奇尚正是鄂旗参谋长的兄弟），奇称章文轩不在（当时鄂旗司令代王爷），他哥欢迎我们去鄂驻扎。于是我们顺利地进驻鄂旗圪角庙。几天后章文轩回来了，也表示欢迎，并答应帮助开展工作。鄂托克旗为首的领导人就是章文轩，掌握军政大权。章系活佛出身，小司令奇恩成，是章姘头的儿子，分掌兵权，是章培育的接班人。次即参谋长和两个大队长，共有蒙兵二百人。从他们谈话中，大多数同情扎旗兵变，所畏者二十六师，骑七师，否则有东投德王之举。此次事变之初，由于陈长捷处理野蛮，只懂军事压力，没有

政治头脑，几乎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我们提心吊胆，恐有不幸事件发生。因为我们不懂蒙语，只靠蒙旗学生作引线，当翻译。工作一开始，我担任外交，贾志谊、杨益章、董然正担任译电。连钟山派我到乌审旗找奇玉山，准格尔旗学生黄克俭为向导，将到乌审旗，突然遇十几名扎旗变兵，拿着刀枪，见我穿着军装，眼都红了，刀枪并举，我吓得魂不附体，多亏黄克俭上前答话说：是西安派来的，给我们来办事，不是骑七师、二十六师的人。他们最恨的是这两个师人，遇到这两师人，当时就打死了。黄克俭费了好些唇舌，才把我救下。

我见到了奇玉山，他表示欢迎，请我吃了五义席，叫了几个蒙古姑娘，歌舞弹唱。第二天他把我送出来，说愿接受西安谈判，保证不会有任何事发生。他知我来时路上受惊，派了二十名蒙骑兵送我到鄂旗。

我们在鄂旗两个月之久，暮鼓晨钟，念经之声不绝，出门一望无垠，黄沙遍地、野草不生，大部分人都不耐烦了。加上连钟山所带亲信随员毛焮南，自诩是戴笠亲戚，掌管经济，伙同连跑宁夏，做买卖。每晚推牌九，挥金如土，所带学生没鞋穿，有赤足者。我和贾志谊决心和连脱离，到榆林去。每人买了个小驴，来了个不告而别，向榆林前进。有天半夜，听见外面马蹄乱跑，贾志谊很机警地将一物埋入土中。第二天从土中拿出，我问他是什么？他不肯说，经我再三追问，他说了实话：在西安临走时王维给了他任务，并给他带了密码本。我问王维是什么人？他说是西北办公厅的特工组长，又说胡先生（胡宗南）不愿依靠戴笠，想另起炉灶，由王维负责来组织技工人员。贾志谊是西安战干团毕业，等于黄埔军七分枝十五期学生。不过他们是政治方面工作，缺乏军事知识。



## （六）陕坝小住

我们到榆林后，就到二十二军政治部主任郭耀武（山西人，黄埔四期生）处找工作。贾是山西人，又有密码本，以此任了中校科长，我以少校科员任用。因为在七分校我是少校，他是上尉，是我的部下，这么一来我成了他的部下。我不愿干，回扎旗吧，我和连不睦，只好到麻地沟找舅父霍世显。

去到府谷麻地沟，住了两个多月，打听到刘盛伍（萨拉齐人我父老友）在萨圪堵骑兵第五师当副师长，我去找他，让他找工作。不想他也寄食矮檐下，不敢多说话，和师长慕新亚言和意不和。这时天气寒冷，给了我一身棉衣，一件皮大氅，让我去陕坝找工作。

路经满壕，遇见郭长清，适逢于铭西辞掉了该部参谋长之职，郭表示欢迎我来担任。其部下大多数是萨县人，一致同意我在这里。晚上祁登文（系祁定远的儿子，大学毕业，现在美国经商，大发其财，和我是朋友，其父是绥远省改组派领导人）和我说：你是有出身的正派人，如果为了发财，可以留下，如要想有前途，千万别和这帮土匪混在一起，久后必然身败名裂，依我说咱们还是去陕坝找工作。于是我和祁登文、焦世通、郝万元，一同去陕坝。正是一九四三年旧历年底，我住在表弟家中，表弟对我很关心，舒服地过了个愉快的春节。

陕坝，是傅作义先生抗日根据地。傅先生接受了门炳岳的任务，坐镇河套川，所属有三十五军、骑四师、屯垦军、二十六师、骑七师。骑七师经伊盟事变后，将师长朱炬林撤职，接任的是张绍成。我前边说过了，张原是骑七师二十团团长，后任西安军七分校骑兵科科长。胡宗南藉伊盟事变之机，将朱换张，乘机把骑七师抓走了。缩小了傅先生的抗日力量，增加了他的实力，但并没影响了傅先生坚强的抗战意志，仍然苦心经营，苦学苦

练，坚守着河套川这一小块抗日根据地。这里代表抗日战争的另一角，物资缺乏，生活艰苦，没有西安、兰州的浮华现象，没有那里的骄奢淫逸、贪污腐化。所有单位都是泥桌土凳，看不到呢军服，武装带，更看不到西装革履之人，所穿都是粗布军服，横腰一字皮带，官兵一样装饰，作风类似延安。听说傅先生每餐二菜一饭，生活朴素。

## （七）挺进大青山

在陕坝过了个客居的春节，我急于要找工作，适逢十期同学张汉琏要去大青山打游击，我和张汉琏到二流子湾，挺五纵队办事处，负责人是邱明星。邱是武川县人，学生时代就为潘秀仁、赵允义拉马送镜，以此得到潘、赵信任。一没才干、二没胆量，只会结党营私，逢迎上司。这些抗日战争中的寄生虫，没胆量到前方抗日，谋求到了办事处的负责人，便养了数以百计的亲戚朋友，将所领到的经费，用来做买卖，谋暴利，既肥己，又恩泽亲友，深入前线的抗战官兵一分钱也花不上。在抗日战争中，这类现象很多。在二湾住了几天，有骑兵回来运弹药，我随着到了大青山。路经高台梁、小余太川、固阳等地，数百里没人烟，到处逃亡一空，所见的是颓垣破壁。这是旧历二月初，一路上铺冰露宿，人吃炒米，马喂蒿草。有时连凉水也喝不上。五六天才到井儿沟北边，见到了鄂友三部邢守忠，住了几天。邢坚决留张汉琏，而我和邢一不熟悉，二不惯于这种生活。于是邢派了一个向导送我去见鄂。

向导领我进了井儿沟，看到山湾内许多矮小的窝铺，他说这就是八路军住的地方。我从出生以来没见过这样矮小的住屋。由于好奇，我特别进去看看。进门只有一尺多的地，便是土炕，炕上只能坐，不能站，连跪也是困难。窗户都用树枝搭成，也有小锅灶。据说在一前晌也有许多这样的窝铺，大部分建在无人去的

深沟杳见向阳地方。据当地人民说，八路纪律特别严，除了行政工作人员，军队很少住民房，和老乡接近。这是一支生活极其艰苦、行动忽来忽去、出没无常、令人捉摸不到的神速的队伍。我初次了解到，在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他们是怎样地在冰天雪地中生活，怎样忍饥挨饿，枪枝弹药缺乏，拼着性命夺取敌人的军用物资来武装自己，怎样任累任怨，戮力同心来和敌人作殊死的斗争。我所看到的只是全国的一个小角落而已。

我在乌梁什太见到了鄂友三。我的突然到来，使鄂十分诧异。五年前我在西安东大街遇见鄂，他请我吃了馆子，他应李正才之邀到大青山打游击，我劝他到军七分校工作。象他这样的人才，七分校根本没有。鄂是黄埔军校九期，专长器械操和马术，他在单杠上能打四十个车轮，每次比赛他是魁首，张治中教育长亲自给他戴过奖章。马术特别好，一次野外演习，出中山门，便马惊套了镫，怒马狂奔时，他以手托地，拉行二三里，两手磨见骨头，忽来了汽车，马稍停，鄂抓着镫革曲身而上，以此脱险，所以一提鄂友三，人多敬佩。此次我来，鄂很表欢迎，当我提到路过井儿沟，参观了八路军窝铺。鄂大吃一惊，他说：你想死了，被他们捉住，想活万难。以后，我对八路军的戒心很大，恐共思想胜过恐日。鄂让我担任中校参谋主任之职。此时参谋长张腾云在养病，所有一切业务，完全由我担任。鄂之为人，待下宽厚，本身智勇双全，足智多谋，所以为人所敬服。唯一的缺点是好女色。上行下效，部队纪律很坏，对妇女随便调戏污辱。有士兵吻了妇女，人家向他报告，他说：“打人骂人惹下人，亲吻人还能惹人？你把我司令亲吻一下？”以此助长了部下的邪气。他的卫士喜从子等轮奸了公山湾十六七岁姑娘。四三年冬，李海龙枪杀了鄂部周贵堂等二十多人。鄂住到永合泰尚威家中，尚威之弟尚三娃是李海龙部下队长，尚母害怕，将三娃妻送到鄂处，投其所好，以图免难，但鄂指名要尚母未嫁之女，尚母无奈，只好将女

儿交鄂过夜，住了数宿，才算了事。上行下效，邢守忠、李存英等人作风大多如此。

一九四四年春天某日下午，从一前晌来了个老汉，和鄂私谈半天，临晚才走。鄂当机立断，和我说：“你带上于文元十七个人，保护电台和修枪匠席师傅，席修好枪，你随后带上找我，务必让祁华将长官部电报发出。”他连夜走了。由乌梁什太到了六道坝，只走出去五六里，没料翌日拂晓，我在睡梦中为手榴弹声惊醒，只听外面枪声大作，四面一片喊声“活捉鄂友三！”“活捉鄂毛驴！”房东二老汉对我说：“张参谋快跑吧！八路军包围了你们。”于是我光头赤足突围而出，跑到六道坝，遇见鄂友三，他说：“你到杨安云家去穿点衣服。”他慌忙带了韩生荣等三十多人去抢救电台。据说昨天一前晌老汉已通了消息。我才意识到：鄂留做试验，要我做替身，居心不良，可以想见了。从那以后，我对鄂敬鬼神而远之，有了戒心。

第二天，鄂下令调来史建福、邢守忠、李存英三个团和郭棠所带二百余骑兵围攻一前晌。下午将一前晌包围，准备拂晓攻击。第二天拂晓开始进攻，直到根据地，只留下了空窝铺墙上写的“打倒鄂毛驴！”“活捉鄂友三！”鄂友三气得跟部下大发雷霆，抓着个钉锅匠，硬说是八路军坐探，用黄色炸药炸死了。问老乡们，都说八路军夜晚从青羊走的路跑了，这路除了打青羊的猎人能走，山区的人也没走过。由此来说，八路军的爬山技术，超过久居山区的人。第二天，把土城子两名保甲长抓来。一名侯罗，一名李生亮，说他们供给八路军给养，要用绳子绞死。两个人面无人色，腿抖得站不住，我看了实在可怜，我问鄂：“侯罗、李生亮光给八路军送给养，给过咱们的东西比八路军还多，为什么八路军不把他们绞死呢？今天杀了侯李，明天没人敢当保甲长，咱们也没法生活了，投鼠还要忌器，何况一个人就随便杀了吗？我反对这样做！”说得鄂哑口无言，他骂了句“去他妈的吧！”两

个人磕了个头，起来腿软得走不了，由鄂两个卫士架出门外。那二人感慨地说：“亏了张参谋，否则已到鬼门关了！”

那时大青山很复杂，除了土皇帝鄂友三，还有红坝圈坐地分赃的王有功，部下有龙王子、二德子、陈国善等人，打家劫舍、无所不为。王有功对鄂也是面和心不和。但王深知，离了鄂他本人在大青山不稳，对鄂还是依靠的，表面还是恭敬的。在六道坝，大沁窑子是日伪地方团队李海龙。李为人野心很大。他经常说：坐天下的是十八子李，应在他身上，他坐不了，有其子李秀源也要坐，是推背图上所言。由此亦可见其人思想落后愚蠢了。

这年夏季，日本人通过崔江、白映星，声言委鄂友三为平绥铁路护路总司令。鄂部下大部分对抗日没信心，厌战情绪很深，都愿接受这钓饵。独有鄂表示坚决抗战，决不上当，我坚决支持鄂的主张。部下慑鄂之威，也不敢再提此事。

秋季八月中秋节前，日本举行大围剿，大扫荡，大青山十八道大沟一齐进兵。日军万余配合靖安军李守信部、地方自卫军讨伐队共二万，所剿目标，为首是八路军。其次鄂友三、王有功，为期四十天。我正病在高黑志气村。这个地方只有三家人。有天夜晚，日军占了高黑志气，点火烧房。医官张吉祥和房东将我用被包了，放在山沟渠内，上盖树枝树叶。天将拂晓，下了阵雨，淋得我冰冷入骨。伤寒病，再加冷水浇，怎么受得了！好不容易盼到天明，日本人要上山烧林。带路的村民唯恐将林烧掉，医官张吉祥等人看见日军进山，都爬山跑了，将我仍留在沟渠内。可恨的日本狗，不断到我附近搜索，把我吓得直冒冷汗。好久，才听见带路的说，山上八路的很多。日本人只有百十个，被吓住了，“开路的！”由小道走了。我才把心安下来，稍微掰开树枝来透透空气。张吉祥也从山上下来，又把我抬回村内。众人将没烧掉的房子整理来住。

病稍好，适逢张万瑞要回河套，我随万瑞进河套休养。临走

时，杜海荣给了我四千蒙疆票，李存英给了我十两大烟。到了五原，我以一元蒙疆换九元法币，共换了三万六千元农民银行法币，我将三万元寄给了在兰州的父亲。这时陈国英任西北公路局特别党部主任委员，我父亲任委员兼秘书，但人口多，收入少，还是困难。

到陕坝，我住在张万瑞家中。有张尔杰、赵大义给我介绍对象。我三十岁了，对象曹仲娥才十九岁，双方一看都中意了。很简单、很朴素地举行了婚礼，住在瓦窑一个空房内，买了张炕席，一切用具都是岳母的。因为岳母无人养活，所以跟过来了。

过了春节，已是一九四五年春天。我的生活十分困难。听说大颀成成立中美训练班，一律美式装备，卡宾枪，马林机枪。负责人高荣，是黄埔四期，萨拉齐水涧沟门人。我一听是同乡，又是同学，便去见他。高很傲慢，透过眼镜可看到他那双诡诈的小眼睛。当我说到找工作，他的回答是：“训练已有了人，现在抗战时期，还愁没工作吗？你等几天，曾国藩成立过湘军，我要成立一支萨军，一定叫你工作。”其人神气十足，骄气凌人，态度狂妄，官僚架子十足，我感到十分失望。我准备走，高的姘头阎思伯很客气地说：“吃了饭走吧！”我说：“吃过了。”回头就走。隔了不久，听说高荣诱奸部下妻子，部下发觉了，用马林机枪打死妻子，又自己枪杀了，搞得满城风雨。此事发生，给傅长官很难处理。因高系军统特务头子，长官亦在其监视之下，只好马虎了事。

不久高派人来找我，他的别动队成立好了，他任司令，总队长陈其祥，下属三个大队，九个小队。要深入敌后（即大青山）打游击，让我当向导，我说生活困难，安不下家，他给了我一万元法币，但在临走时我装病没走。我深知高去大青山，要夺鄂的领导权，鄂决不居人下。况鄂和我说过几次，他说：“我在大青山卖命，高在后方淫乱我的老婆，我与他誓不两立。论交情来说，

我和鄂的关系比高厚几倍。这就是我所以要装病的原因。

高到大青山不久，因和鄂争权，被鄂排挤回到陕坝。鄂给了高五百两大烟，夺了高领导权，连所属别动队也归鄂指挥了。五月，我和郭棠的骑兵第二次来到大青山，鄂带了李存英团和别动军，驻在离萨拉齐十五里的北什图，这里有一丈多高的土城。日本人当即由绥、包二地调来千余人，将北什图包围，先以炮击，后即喊杀进攻。直到离土城百米之处，别动军才还击，打得日军抱头鼠窜。此役给日军以重大打击。日军伤亡很大，跑回萨拉齐闭门不出。

这时全国各战场日军由于台儿庄大败，到处处于不利的劣势。鄂击败日军后威名大振。住在水涧沟门，安排沿山起大烟土。萨、包伪军多有来投降者。守尔沁窑子的李海龙唯恐鄂报周贵堂仇，由萨拉齐请来白映星向鄂求和，在尔沁窑大张宴席，请我们吃喝，并答应向鄂投降。

不久，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有人劝鄂接收归绥，鄂很有成见地说：“咱们就近接收萨拉齐好了，树大招风，接收了归绥，长官回来也不让咱们。”鄂进入萨拉齐后，首先把日本所收大烟土一千箱，每箱千两查收。鄂心满意足地说：“够咱们一辈子用了！”以后，他在天津、北京任意嫖妓宿娼玩舞女，花钱烟地，尽情挥霍。

日本投降了，内战又开始了。可惜我那时一点儿觉悟也没有，还继续为他们打内战卖命，想起往事，悔恨莫及！

（责任编辑 郑守恪）

（本文作者张希孟系土左旗政协委员）

# 古稀奢谈少壮史

尹万国

半个世纪以前，日本帝国主义者奉行田中义一制定的侵华政策，在一九三一年挑起了“九一八”事变。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忙于“安内攘外”，采取了“不抵抗主义”，把东北三省拱手让敌。激起全国各族人民的反对，要求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但无结果。一九三二年二月，伪满州国成立。次年四月，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弃守承德。日本侵略军继续向西推进，进兵冀（河北）察（察哈尔），遭到冯玉祥组织的抗日同盟军、宋哲元的廿九军和傅作义的五十九军（后改称卅五军）的顽强抗击，大长中国人民的志气。

傅作义当时任卅五军军长兼绥远省主席，他在指挥了长城抗战以后，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又取得了红格尔图战役的胜利，十天之后，收复了百灵庙，致使举国瞩目，把他看作是抗日民族英雄。我当时是绥远第一师范的学生，和所有的同学们一样，为我们能有这样的抗日主席，感到荣幸和自豪。到一九三七年，日寇又制造了“七·七”事变，向中国发动全面进攻。傅作义被他的顶头上司“晋绥绥靖主任”阎锡山调走，去守山西。绥远成了无人负责的乱散局面，各学校随之自行解散。我这个勉强算作是小知识分子的人，只好回到现属土左旗善岱乡的西淖尔村家中。



## 一、不当亡国奴 投奔傅作义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四至六日，归绥、包头先后沦陷，敌人马上建立起各级伪政权。日本鬼子到处杀人放火，奸淫妇女的暴行时有所闻。认贼作父，为虎作伥的汉奸、伪军警和日寇一样，他们头戴日本帽，身穿协和服，手持汉林冲（步枪），熟悉各村各户的情况，敲诈勒索，为害地方。当时，虽然有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的队伍不时打击他们，但因他们能搬日本兵，为自卫军力所不能制。

在腥风血雨的情况下，一片亡国惨景，触目惊心。常思自己是受过国家教育的人，岂能当顺民，安于亡国奴？但又该到哪里去抗日呢？为此而苦恼着，盘算着。到了一九三八年秋天，偶尔打听到傅作义在山西的河曲，号召沦陷区知识青年，前去参加抗日工作，于是就相约忽拉格气的陈赋真，什拉村的韩振晋，三和成的冀铭新等人，在黄河封冻之初，深夜离家，绕过日伪据点，履冰过河，经过十里长滩，跋涉到河曲，报名住进了设在棠家会的卅五军附设绥蒙政治学校。傅作义兼校长，苏开元任教育长，周北峰为政治部主任。政治教官有杨文焰，高映明。指导员是赵惠山，军事教官黄克。借住民房作为课堂。

周北峰给我们讲的《政治经济学》和艾思奇著的《大众哲学》，明快易懂，听而忘倦。其他教官讲的和同学们自由阅读的书刊，也全都是由“延安出版社”出版的。每天早上起床，黄克带领跑步，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抗战进步歌曲，不由的情绪高涨，思想充沛，杀敌救亡之心，怒火满腔。

一九三九年二月下旬，苏开元动员全体学生说：“大部队已转移到后套（现巴盟），我们也要去后套。我们为了打日本，一切

艰苦不要怕，你们是青年人，更应该好好锻炼……。”于是每人背一个小行军包，两人背一支步枪，肩膀上套一个被面下粮袋，开始长途行军。经古城前后时，有一条宽四五十米，深一尺多的河流，俗称“无底沙河”。春暖初融，水冷刺骨，男同学三个五个的缩起裤子，沙河而过，女同学可愣住了，我们返回去将她们前拉后推带过了河。由于驻包（包头）侵略军常派飞机侦察轰炸，改为夜行晓住，整整十二个夜行军，克服了山路、沙坡、荒漠、河流的困难，锻炼了身体和意志，到达了五原县城。

我们在五原复课，先住新公中，后又迁到新公中西约八十里的百川堡（解放后改称解放镇），仍和在棠家会一样，借住民房食宿上课。不过生活是大大地改善了。一元钱可买猪肉五斤半，馒头大烩菜，瘦肠渐肥。那时，我还是一个仅仅廿岁的青年，可塑性较强，经过在棠家会和百川堡“附设绥蒙政治学校”的学习，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集体农庄庄员生活的不断提高，产生了羡慕之心，对中国共产党也因之有了同情和敬仰，只知道国共合作打日本，根本没什么党派观念。

## 二、立志打日本 心乃真麻烦

傅作义先生所部的军政人员，在河曲时完全是向八路军学习的延安作风，转进后套之初，还保持着艰苦朴素，朝气蓬勃，斗志昂扬，积极进取的精神。所有干部都是身穿军衣、腰系皮带、足蹬麻鞋的大兵。傅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不尚浮华的楷模。一九三九年八月上旬，他到学校给我们讲了话。他说：“咱们现在工作多，干部少，你们出校实习工作吧。我报中央备案，给你们成立法政专科学校，三个月后调你们回校再学习。”其实，傅的这番话，后来证明是哄人的。接着他又说：“你们参加工作，有三个部门可以自己选择报名。一是军队政治工作，一是动员委员会

做战时动员的工作，一是国民党党部的工作。”当时我认为动员委员会的工作，就是动员人力、物力、财力直接参加抗战打日本的，所以就报名参加了动员委员会。可是，到工作岗位之前，傅又让我们参加了在百川堡召开的为期半个月的“抗战建国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人主要是傅部营级以上军官，和区级以上干部。讨论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生产和生活。有的是要在统一认识的前提下，提高思想，激发抗日情绪，坚定必胜信念。但是，“中国是大贫小贫之分。”“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只有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共产党游而不击，封建割据。”等等侮蔑诽谤之词，出在讲台上。傅作义每日亲自主持大会，作总结发言，可谓用心良苦。

半个月的讨论会结束后，我们站好队，傅作义给我们介绍了两位国民党绥远省党部委员，即托县人耿正模字端甫与集宁人陈国祯字干廷者。傅说：“他们俩是刚从重庆中训团学习回来的，引你们再去陕坝省党部学习一个月三民主义，然后各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工作。不管去到哪里，总之是为了提高自己，充实自己，做好工作，争取抗日的最后胜利。”

我们随耿陈二人到了陕坝，省党部给成立了一个“三民主义研究会”。省委委员分别讲课，讲授《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但主要的是讲述从孙中山到蒋介石的国民党党史。特别强调蒋介石一贯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不提国共合作，不说军民团结，不讲艰苦抗战，更不谈蒋介石把孙中山生前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变成了反苏、反共、迫害工农。甚至还搬出孙中山那句“马克斯是病理学家，而不是医理学家”的错误结论，作为理论依据，用填鸭式的办法，强予灌输。当时廿来岁的我，虽然也多少接触过一些马列主义的书，又听到上述有关蒋介石的吹捧，脑子里真乃麻烦。心里想：“反正谁说谁有理。”由于自己的理论水平低，对共产党的实际情况知道的

很少，因此，对国民党和蒋介石产生了一些信念。但对他们关于共产党的污蔑诽谤之词，还是少信多疑。所以从棠家会带来的几本进步书籍，如《政治经济学》，《解放周刊》等，始终密藏偷阅，舍不得扔掉。可是，一个月的“研究会”结束后，记不清是耿陈谁对我们说：“国民党是执政党，领导中国人民抗战，你们应该相信国民党，相信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自己也有前途，你们应该入党，不愿入的也不勉强。”于是我们就由耿正模，陈国祯介绍，加入了国民党。

### 三、供职动委会 敌机狂轰炸

一九三九年九月，结束了“三民主义研究会”。由于省党部和动委会的主任委员，都是傅作义兼任的，我被拨到动委会工作。动委会的副主任委员是周北峰，秘书长于纯斋是实际的负责人。作风民主，与省党部大不相同。所有人员对战时动员工作，进行了热情洋溢的讨论，信心十足。我被分配到五原县，担任第四区动委会主任干事。当时的区动委会又是地方行政机构，主任委员等于区长。区设主任委员一人，主任干事和干事四五人不等，薪饷一律廿元。谁是国民党，谁是共产党，谁是无党派，互不相知，亦不互问。但凡生活艰苦，作风正派，积极肯干的人，多被疑为共产党人。

此时，日寇飞机经常飞临后套空袭。有一次，廿八架敌机轰炸五原城，炸死居民八十多人。据说傅作义将军也险些遇难，他周围的卫士被炸弹爆炸的气浪，卷起土柱掩埋，敌机去后才又掏出来。但此次死难群众，并不是被炸弹炸死，而是集体藏在一个大窖里被压死和闷死的。从此，政府号召在野外只挖单人掩体洞。一九三九年九、十月之交，敌机三架空袭四区所在地乌镇，距我约廿米的洞里藏着区主任干事杨国烈，一颗炸弹丢在洞边二尺远的地

方，幸未爆炸。敌机又用机枪俯冲扫射一阵，然后向包头逸去。杨国烈从土里爬出，忽听得有一妇女大声呼救，人们赶快按她指给的地方去掏，原来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名失忆）也被埋在土里，给掏出来救活了。正是由于日本飞机的不断狂轰滥炸，锻炼了后套的军民，坚定了必胜信念，他们说：“敌机来了不可怕，炸弹下来就趴下。”

不过，在抗日前沿阵地的大后套，除了以傅作义为首的、艰苦奋斗的绝大多数人而外，也有油头粉面，呢装革履，摆官谱，做样子的极少数人。那就是直属中央的驻陕坝中央银行干部，和“中美训练班”特务头子萨县人高荣之流。他们都是伪装在抗日队伍里的“混混儿”。

## 四、军民同敌忾，五原传大捷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傅作义奉命长途奔袭包头，胜利完成了牵制进攻长沙之敌的任务后，撤回后套。日本华北驻屯军趁傅军喘息未定，力图报复，扬言“膺惩傅作义。”调动三万余众，汽车千辆在黑田重德师团长指挥下，进犯后套。二月三日陷五原，四日陷临河，五日陷陕坝——钻进傅作义将军预置的口袋阵里。

日本侵略军是分南北两路进攻后套的。南路沿乌拉山南麓向西推进，北路由后山出乌不浪口侵犯。驻守乌不浪口阵地乌镇的部队，是宁夏马鸿逵的卅五师马腾蛟部，俗称西军。马师长器貌不扬，瘦削龙钟，老气横秋。他的部队素质不好，装备更差。我记得是阴历腊月廿三日午后约四时许，敌人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猛烈强攻，勉强抵抗到黄昏以前，师司令部就已显出混乱。我们动委会的人谁也没有撤退转移的思想准备。大炮声，机枪声，飞机声，以及坦克的轰鸣声，在乌不浪口和一出沟

口的四义堂附近，交织在一起，震耳欲聋。驻守在离我们不远的副官处的官兵早已不见一人，我意识到西军已完全溃退了，就和干事李昆玉上马驰向五原，次日清晨进了五原城，各机关团体也已走光，商店关门，住户无人，实行了空室清野。于是又向陕坝驰去，陕坝也和五原一样。我俩正在犹豫，敌机三架飞临上空，急忙策马出西门约二百来米，下马卧倒，敌机一高一低，轮番投下十来颗炸弹，又俯冲反复扫射一阵，向东飞去。遂即据鞍上马，迳奔三盛公而去。遥见黄尘滚滚，卷地而起，知是敌人的汽车，坦克亦向三盛公推进，故又改道钻入沙窝以内，饥渴困顿，辗转于阴历正月初一退到宁夏的磴口县城。

磴口城里除了仅有一家肉铺外，任何食品也买不到，都被早退下来的军队、机关、及家属买光了。因打听到副长官部的总参议袁庆曾也退在城里，就去见他请示行动，他指示：“傅长官来电，凡县级以上干部，速回后套，换便衣在乡下工作，配合部队待机反攻，部队现已撤到指定地点……”。我俩遵命回乡，不意两马走失了一匹，二人只好双乘，经三盛公到了头道桥。从群众口中得知侵略军在进入百川堡、陕坝、临河，三盛公及头、二、三道桥之后，由于我军在夜间的袭扰打击，都龟缩到五原城里不敢动，而以大汉奸“绥西联军”司令官王英驻守，妄图“以华制华”。

我和李昆玉换上便衣，变成庄稼人，从临河、陕坝转回乌镇乡下，群众一见，高兴极了。他们认为我俩回去，就证明中国有办法，绝不放弃大后套。我俩和群众吃住在一起，转遍全乡的圪旦（后套的村名都叫××圪旦），宣传、鼓动群众，坚定必胜信念。当他们提出“几时能反攻回来”的时候，我们的答复是“不久的将来。”老话说：“胆生于智，智生于专。”我们好似比过去突然胆大而又聪明得多了。当时傅作义的干部是善于独立思考的。所以中断了与上级请示汇报的情况下，始终没有间断过自己

的工作。

一九四〇年三月廿日的夜晚，反攻五原战役的炮声打响了。在傅作义将军卓越的军事才能指挥下，经过两昼夜的激烈攻防战，全歼日寇四百余人，伪军警、特务机关人员六千来人，击毙酋首水川中将，生俘特务机关长浅沼庆太郎等五十余人。取得了反攻五原的辉煌胜利。我和李昆玉及动委会另外三个干部，在兴奋之余，于战后第二日相偕入城走了几处，凡是小街僻巷中，一个两个、三四个、五六个的敌人死尸，除染有血迹的衣服外，都是赤裸裸地倒卧在那里。五原西街的一座桥下堆着敌人遗弃的大堆炮弹，县政府留下整箱整袋的大米和饼干，说明敌人是经过激烈巷战被歼灭的。

五原大捷是震惊世界的伟大胜利。因为在当时的同盟国战场上，正是到处都吃败仗的时候，所以五原大捷不仅是对中国，就是对苏美英法各国，也大大地鼓舞了斗志，致使傅作义将军名震寰宇。其实，五原大捷是在后套广大群众，特别是五原的农民群众大力支持下取得的。他们曾发挥过傅氏预想不到的积极作用，凡是从五原逃跑之敌，不管是鬼子，汉奸，伪军警人员，都被老乡们活活打死，或投入乌加河淹死。如五原东北十五华里的银瑞桥村，有王大老虎和王二老虎兄弟，就毙敌十二名，缴获机枪一挺，步枪十支。因此，在四月初旬，傅作义先生在陕坝召开了庆功授奖大会，受奖农民有二百来人。傅先生高度赞扬了后套的群众，认为五原大捷是军民同仇敌忾的结果。

但是，敌人的残酷暴行是令人发指的。他们在五原二区所在地的鄜家地，对一名四十多岁的妇女轮奸后，又以刺刀贯穿阴户杀害。类似实例，所闻甚多。又在头道桥以南的杨家河畔，有两名掉队的西军士兵，遇着日军大队，不敢抵抗，跪地求饶，亦被刺刀捅死。由于西军虽归傅作义指挥，但不属傅的建制，故不贯彻傅作义“打敌必胜，怕敌必死”的精神讲话，以致跪地而死，

岂不冤哉！

## 五、艄公向右站，大捕共产党

压根儿就不左的傅作义将军，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孤军独守太原溃败以后，退至石楼、柳林一带收容残部，接任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于次年六月移驻河曲。他在蒋（介石）阎（锡山）矛盾的夹缝中，由于抗日民族战线的形势，借助共产党的政工支援，恢复了卅五军的元气，回军后套，另起炉灶，晋绥分家，依靠了蒋介石。五原大捷以后，立脚已稳，马上站在右边。在百川堡“抗战建国讨论会”的思想舆论基础上，接受了国民党中央派去的特务头子，疯狂的大捕共产党人。所谓“不吃红饭，不屙白屎”的论调听不见了。我们这些敬仰傅主席，上了傅船的青年人，只能信赖艄公在大海里航行。因为傅先生当时是第十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绥远省主席，和省党部主任委员的。

一九四〇年五原大捷后，国民党中央派特务头子张庆恩到陕坝接替了张遐民的绥远省党部书记长。不久，乌镇区委主任吴亚声调走，下落不明。秋季，又将我的助手主任干事马法援扣捕。我经过考虑，忍痛将所存三本进步书烧毁，以防不测。未几，五原县党部书记长包头人李树茂，亲自给我发下国民党员的党证。到一九四一年初，省动委会通知我和李昆玉去开会，二人乘马走到半路，迎头碰见两骑素昧生平的人对我俩说：“你们是共产党，跟我们走吧！”遂被监送到五原督察处分开管押。关了七八天，审讯三次，又转送到陕坝督察处禁闭了廿来天，先后受审四次，但未动刑。首次审讯者叫张中一，后三次是尹燕英，被他打过我两记耳光。最后，他狠狠地对我说：“你看共产党的书，入国民党是假的，信共产党是真的。”即令两个兵将我押解到陕坝西不到十华里的一所高围墙大院子里。这就是“战时青年训练



团”（以下简称战青团）。我见里面关着几百青年，不禁吃惊。当然，其中有的是共产党，有的是嫌疑分子，也有的是二者不居其一的人。但究竟哪个是什么，恐怕连特务们自己也未必知道。

“战青团”给集中青年所进行的受训内容，除了“三民主义研究会”的那一套外，又增加了“青年干部受其蒙骗，”“不听指挥，不听调动，”和“毛泽东在延安抽的好纸烟还是从俄国买来的，”而捧蒋介石呢，竟然因他“不喝茶，不抽烟”就成了“日理万机的伟大领袖。”其论据之无聊，真是肤浅、庸俗、空洞虚弱到极点。与此同时，查禁进步书刊，停唱抗战歌曲。把一个轰轰烈烈、热气腾腾、生动活泼、团结抗战的局面，立即变成了冷冷清清，死气沉沉、情绪低落、思想禁锢的白色恐怖笼罩之地。大后方的八百里米粮川，腥风血雨，草枯叶落。关在高端里的人，谁死、谁活、谁叛？除了特务头子，别人不知道！

然而，有一位铁骨铮铮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确实留芳千古为后人所共知。当我被释以后，传闻有共产党人郭北宸者，被捕之后，坚贞不屈、软硬不吃。因郭系傅作义在一九三四年绥远“乡村人员训练所”的学生，故有师生之谊。傅见特务们对他无可奈何，便带领几个人亲自去说服，不意一见面，郭即抢先开口道：

“谢谢傅长官来看我，见一面就好了，别的话什么也不必说，我是不会改变我的信仰的。”傅作义出来以后，对跟随他的人说：

“我见过不少共产党员，只见到两位共产党人，就是王若飞和郭北宸。”可见傅作义以善于利用叛徒而著称，但碰上郭北宸这样的坚强对手，也无法售其奸。此是后话。

再说我在“战青团”受了四个多月的训，由于我是国民党党员，又审不出什么把柄，于六月末的一天，放我和李有谷，安建国等到陕坝省党部，都当了助理干事，我被分配到社会科工作。经过张庆恩几次介绍，个别谈话，他嘱咐我“好好学习、工作，信仰三民主义，信仰孙总理，信仰蒋委员长。”最后又告诉我：

“经常注意共产党员的活动，出去街上也好，哪个单位也好，注意人们的言行，有什么情况，及时汇报”等语。当时省党部每周有两小时的学习讨论发言，我对三民主义的学习，也比过去重视起来，讨论时积极发言，争取不要再被闹进“战青团”受训。

一九四二年派任安北县党部秘书，我和书记长归绥县人柴生华轮流下乡工作，但未知何故，又于一九四四年初，另派由西安“党训班”派到陕坝的青年干部（名失忆）接任了我的职务，把我调回省党部再当干事——“莫不是又怀疑我是共产党员吗？”的思想包袱暗暗地在背着。此时，张庆恩已专门到调统室搞特务工作，国民党中央派河北省人王玉宾接任省党部书记长。有一次不知为了什么，王与几位省委互相争吵，几乎打在一起。本来在国民党的内部，从中央到地方，都是拉帮结派，各抱集团的，不是勾心斗角，就是争权夺利，所以为时不久，又把王玉宾调走了。遂将多年的组织科长田馨年，提升为不是省委的办公书记长。我的干事职务，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前再未变动，思想包袱也渐渐放下了。

## 六、一任书记长，空话说三年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人们含着激动泪花，在陕坝热烈庆祝一番，省党部即迁回归绥（现呼市），立即派我随里素村人陈国珍到萨县为临时党务整理委员，工作还没开展，八路军已围攻绥包，我又跑回省党部。到一九四六年七月，接任了陈国珍的萨县县党部书记长。给国民党作事没有可靠后台是吃不开的。当时尽管有人把我看作是省委萨县人高存仁的人，但在同年冬季，高却叫着我的名字说：“一民，你以后少管闲事，多做工作。”又在次年（四七年）省执委的一次会议上提出：“尹万国不做工作，尽管闲事。”因此，在一九四七年

三月间，即由高的老友原任县党部秘书赵成章，接任书记长。我被调回省党部监察办事处当监察干事。其实，说我“不做工作”是指我没有调查、逮捕过一个共产党人，因我始终没有遵照张庆恩的嘱咐办事。说我“尽管闲事”是指我肯为地方群众解决一些不公平的事，因我是萨县农村的人。说也幸运，我这个国民党的骨干分子，尽管其他危害人民的罪恶很大，但从来也没有调查、检举、告密、逮捕、迫害过一位共产党人或进步人士，这一点我是安心的。

至于所谓“党务工作”，完全是自欺欺人的空话，“天桥的把式，干说不练。”那时所谓的“党政分家”，倒真是分了，党不仅管不了军，连政也管不了。所谓的“中央以党统政。”“省级党政平行。”“县级融党于政。”说的似乎很有道理，而实际呢？中央我不确知，但省县两级的党，省也好，县也好，谁当了官谁忘了党，因为加入国民党就是为了当官。所以谁在党外工作，谁就翘不着党，开个党员大会，经常是三分之二的党员不到场，唯有蒋介石独掌党政军大权，不管用什么头衔瞎指挥，也是他说了算。省县两级的党，除了特字号的人外，其组织等于政府的附庸，名存实亡。更有使人难以相信的事实是，自从日本投降到绥远“九·一九”起义这四年多时间里，在包头，莎县（现土右旗）归绥三城，所有的大小书店里，买不到一本三民主义的书，足以证明国民党所谓实行三民主义，是挂羊头连狗肉也不卖的“提包公司。”用不着再谈这个主义能否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就够了。因此，我从县党部书记长开始的三年里，空话说得连自己也怪不好意思，早想脱离党务工作了。

好在，由于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傅作义将军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实现了北平和平解放，后又促成董其武先生的绥远“九·一九”起义。错向的艄公，领上我们又走上了正路。我在毛主席对董、傅人员采取了包下来的政策宽大下，投入人民的怀抱，担

任了解放后的莎县工商局局长。兹因土左旗政协文史办征稿，谨以此文献芜。

(责任编辑 张尔杰)

# 土左旗毕克齐镇耶稣 教会拾零

靳 祥

一、时间大约于1900年(庚子年)开始布教传道。

二、牧师：

1、聂牧师(瑞典籍)来传道是第一次复兴教会。

2、红教师(女、美国籍)

3、爱逢茨(瑞典籍)来传道约五年。

4、希文胜(瑞典籍)来传道约三年。

5、阎鸿儒、董庆丰

6、郭存文 传道约四年。

7、张存义 传道约五年。

8、赵永明 传道十五年(1950—1964年)。

9、靳祥 从1981年开始传道至今。

三、信徒：

仅五年(由1981年起)间发展教徒二百名左右，

(责任编辑 赵国恩)

靳祥：土左旗政协委员

# 土默特历年编佐的情况

鹤 年

土默特在清代是一个军政合一的政体，但征使调用权却操之清廷。清朝统治者为了控制兵源，便于使用兵力，实行比丁、审丁的做法。在土默特左右两翼规定，凡出生男孩，必须到土默特的户司在叫做“阿孟堂”（注）上登记，如遇孩子夭亡，还得持甲佐证明到户司注销。这样统治者就可以掌握丁口的多少，增丁减丁的情况，给比丁打下了有利的基础。这为控制兵源，给土默特人民又投下了一道捆索。

比丁是稽核丁口数目，审丁又加入审察丁口是否合格以区分正丁副丁。这些都在清廷派员监督下进行。其重点是放在有无瞒丁、漏丁、卖丁、转丁上，这样要想逃避兵役，是不容易的。正丁都得身体健壮、灵动活泼的丁员，都得参加训练（操演营），应征调，出兵打仗，在无饷的处境下，还得准备衣着、战马、器械，听候征调；副丁一般是体弱有病的丁员，他们留旗当差，当差的地方有：将军衙门、都统衙门，驻卡、防御、波口、护仓、巡逻及参领、佐领、骁骑校等，约计将近千人，每满一年，更换一次，实际就近二千人了。因此，土默特征调兵员，一般在三千以内，只有同治年间，一次征调高达四千五百人，当时正丁已感不足，竟有十六七岁的幼年被征调当兵的。而且历年征调频繁，大大影响了人口增加。

大清一统志载有崇德元年丙子（1636），编土默特为二

注：阿孟堂，蒙古语即户口簿。

旗，以古禄格为左翼都统，杭高为右翼都统，设参领、佐领等员，并驻城中（呼和浩特旧城）。这里只提设参领佐领等员，而没有指明多少丁口、编了几佐，这是一个重要的缺漏，由于这一缺漏，以后大多以十二参领，六十佐领为言，提及编佐情况的绝少，相沿既久，形成定局，一般人也习焉不察，视为当然。

1985年春，笔者到土默特左旗档案馆查阅资料，在沦陷期卷档里发现一纸孤表，照抄于下：

土默特两翼佐领表

佐、领	世管	世袭	公中	勋旧	计	注
原编	17	1	2		20	
增丁	5	4	15		24	
家仆				3	3	台吉家仆
黑徒			13		13	
计	22	5	30	3	60	

因为这是个孤表，既没有编佐年代，又没有丁口数目，有可能在原件正文里有记载，所以表上没有写，正文一丢，就成不明白的孤表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土默特的十二甲和六十佐，不是一次完成的。

1986年呼和巴雅尔同志给土左旗旗志办寄来一封蒙文文件，是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四月，呼和浩特喇嘛印务处扎萨克达喇嘛吹斯嘎巴呼图克图呈复大部（理藩院）所属寺庙创始情况，据说这个文件曾流落西德，经西德蒙古史学家海希格先生把这文件译成德文，并附蒙文原件发表行世，本文件是依据海希

格先生的附件由呼和巴雅同志译成汉文，在文件的开头引叙中有：“……但是，土默特左右两旗二十个苏木建成之后……”的话，这就说明孤表所计原编二十佐是有依据的。

据资料记载，土默特降清之后，以三千三百丁编佐定旗。一说是三千三百七十丁编佐，若以此数编六十佐，连副丁在内，每佐平均只能有五十六丁强，不足清制每佐一百五十之最低定额，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原编不是六十佐是很明显的。若以三千三百七十丁编二十佐计算，每佐可编一百六十七丁强，除去病残，是合清制的，是可能的。（黑徒编佐每佐是以二百丁编的）

据《大清会典事例》，康熙三十三年，土默特有：一旗二十五佐，设参领五员，一旗二十二佐，设参领四员的记载。这时土默特计有四十七佐，参领九员。以原编二十佐加增丁编二十四佐及家仆编三佐，正好是四十七佐之数。也就是说，在康熙三十三年，土默特已有四十七佐，以每五佐设参领一员，应该是九员参领外还多两佐，多二佐不设参领是合情的。

《绥远通志稿》载有：康熙四十六年，四世锡呼图呼图克图和驻镇土默特的费杨古将军议定，为了增强呼和浩特防御力量，将无量寺等七大召黑徒五千多丁，每佐以二百丁编，计编为十三佐，连同原编二十佐，增丁编二十四佐，台吉家仆三佐，才编够六十佐、十二甲之数。但其中增丁编及家仆编之二十七佐，还没有找到文字记载。

清理藩则例中规定，土默特每三年比丁一次，增丁编佐，一定在比丁之后，确定丁口增减才编的。那么增丁编之二十四佐，决不是一次编定而是由崇德元年到康熙三十三年六十七年间陆续编成的，二十四佐数、是综合数。是可以肯定的。

以上是土默特六十苏木编成的情况，此外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提一下。

从崇德元年到康熙三十三年六十七年间，增丁共编二十四

佐，从康熙三十三年到清末一百七十六年中却没有编过一佐，是人口没有增加呢？还是人口增加而没编佐呢？这是一个不能不使人怀疑的事。

入清以来，土默特军事征调是频繁的，动以千百计，最多竟达三千多人，以出征时间论，一走就是半年六月，有的多至二三年之久。其活动地区，大多在山、陕、甘、新等地。征调次多，伤亡人员也在增加，见于记载的约千人左右，有战役而有伤亡人数的也不少，大量死人是官民共苦的事，在家必须应征打仗，唯一的办法是当喇嘛，因为喇嘛不在丁口数内，于是形成两多，即当兵的多，喇嘛多的畸形发展，造成了人口严重削减。康熙之后的没有编佐，或者与此有关。但不是唯一的。主要原因还须考订。

咸丰年间打捻军（俗呼为打南镇）三次征调土默特兵四千五百名，第一次在咸丰三年三月，调归化城兵二千五百名赴山东江苏交界地方备用，由绥远将军托阿明统带；第二次，同年参领乌尔贡扎布带土默特兵一千五百名剿捻；第三次咸丰四年三月，委调一千名官兵（内有土默特骑兵五百名）赴山西防堵，得旨允行。这次征调已有十六、七岁的少年被征调入伍，转战河南、山东、江苏、河北等地，作战时间也延长五六年之久，伤亡惨重。事后清廷为了安定人心，采大加封赏的办法，以遮盖伤亡，缓和輿情。当时土默特兵源锐减，佐领却难裁汰，不得不迁就下去，以不增不裁了事。

这些都属推断，不实不尽之处很多。还得寻查资料，揭示当时实际情况。因为土默特衰弱、穷困与此有密切关系。



# 土默特高等小学校简介

(1724年~1949年即清雍正二年~解放)

王奎元

土默特高等小学校沿称“南高等”，俗称“土小”、“土校”、“文庙街小学”等等，位于呼和浩特市文庙街。

## 一、历史沿革

土默特高等小学校始创于1724年(清·雍正二年)。当时的校名是“土默特官学”。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该官学更名为“启运书院”。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1月，改书院为“土默特高等小学堂”。1911年(清·宣统三年)9月，清廷为了镇压“辛亥”革命，操练军队，但又无法开支，遂把地方办学经费移作军糈。因此，土默特高等小学堂亦只好停办。

1913年(民国二年)11月1日，副都统贾宾卿令再行开办学堂。1914(民国三年)11月1日，土默特高等小学堂复课。同年12月，改学堂为“土默特高等小学校”，并将甲、乙两班改为第一班。

1926年(民国十五年)4月，“土默特旗立第一中学”成立。土默特高等小学校更名为“土默特旗立第一中学附属小学校”。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中学迁离另行筹办，至此，该校成为一所初、高级皆有的完全小学校。

1938年（成纪733年）日寇入侵后，校名改为“土默特旗立厚和豪特小学校”。并附设“土默特旗兴蒙学校蒙文专修学校”。1942年（成纪737年）校名改为“土默特旗兴蒙学校”。

1945年（成纪740年）日寇投降前停课。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10月复员学校时，更校名为“土默特旗立文庙街小学”。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4月后，改校名为“土默特旗立文庙街中心国民学校”。该校名一直沿用至1949年。

## 二、校歌

再早有无校歌，无从考查。民国以后，土默特高等小学校的校歌是：

吾旗小学，  
唯我校宗。  
历史悠久，  
成绩彬彬。  
地灵人杰，  
为世所珍。  
勤爱诚朴，  
冶而成人。  
五族一炉，  
有教无眚。  
山阴塞外，  
赖我振兴。  
勉而后进，

与世并臻。

### 三、经费及管理

土默特高等小学校的办学经费从“土默特官学”成立至解放，一直为土默特地方“政府”自筹；管理也是土默特地方“政府”的事儿，不隶属省教育行政机关，遇事咨行而已。

### 四、历任校长

“启运书院”以前的校长（监督）无资料记载，不得而知。自“土默特高等小学堂”成立后，其历任校长（堂长）如下表：

土默特高等小学堂堂长一览表

姓名	任职年月	备 考
卜瑞机	1907年1月	参领
松阿理	1909年1月	参领
都格尔札布	1909年	参领，松阿理任职没几天即由都接办

土默特高等小学堂更名“土默特高等小学校”以后，其历任校长如下表：

土默特高等小学校校长一览表

姓名	任职年月	备 考
森 额	1914年12月	参领
刘启昌	1915年1月	
郭象岱	1920年12月	
苏鲁岱	1925年3月	实际由孟学孔代行校长职务
孟学孔	1925年8月	
贺云章	1928年5月	
昌 森	1929年1月	
荣 祥	1935年	总管兼任校长
麟 祥	1938年	
恒 升	1939年12月	
云惠盛	1941年底	
荣 祥	1945年10月至解放	总管兼校长，日常工作由教导主任管良处理

## 五、助学金情况

“土默特官学”时，每名学生日给饭钱16文。“启运书院”后，给学生膳费。“土默特高等小学堂”时，学生每名每月领津贴银1.2两；制服、课本亦由公家制备。学堂更名“土默特高等小学校”后，学生每名每月领津贴大洋1.2元。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8月，学生津贴停发。所需一切开支均由学生自备。

日伪统治时期，旗籍学生为官费；每人月支膳费5元、文具费0.50元；并发给制服或制服费。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复员学校后，一切费用仍由学生负担。

## 六、毕业班及毕业人数

“启运书院”以前毕业的班次、人数无从考查。“土默特高等小学堂”设立后，甲班36名学生于1909年（清·宣统元年）10月毕业。乙班由于学堂停办，未能举行毕业。

学堂恢复，更名“土默特高等小学校”以后，历年毕业班次及人数如下表：

土默特高等小学校历年毕业班次、人数情况表

班 次	人 数	毕 业 时 间	备 考
第一班	23	1917年(民国六年)12月	习惯上仍称“甲班”
第二班	17	1920年(民国九年)10月	
第三班	27	1922年(民国十一年)3月	
第四班	29	1923年(民国十二年)8月	
第五班	28	1924年(民国十三年)12月	
第六班	30	1926年(民国十五年)1月	
第七班	18	1928年(民国十七年)7月	
第八班	12	1928年(民国十七年)12月	
第九班	5	1929年(民国十八年)12月	
第十班	12	1930年(民国十九年)12月	
第十一班	14	1931年(民国二十年)12月	
第十二班			
第十三班	14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8月	
第十四班	16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8月	
第十五班	25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8月	

第十六班		
第十七班		
第十八班		
第十九班	10	1941年(成纪736年)1月11日
第二十班	13	1941年(成纪736年)12月
蒙专第一 (甲)班	16	1941年(成纪736年)12月
第二十一 班	26	1943年(成纪738年)1月15日
蒙专第二 (乙)班		
第二十二 班		
第二十三 班		
第二十四 班	19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 7月15日
第二十五 班	30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 7月10日
第二十六 班	39	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 7月15日

责任编辑：王奎元

## 附：文庙官学碑记

库库和屯即归化城，唐之丰洲是也。丹公主之先公大人牧〔注一〕罗土默特蒙古开诚向化，荷蒙太祖、太宗赐以世职得守斯土“是”〔注二〕

都统大人讳丹津，历任卅余年，为人敦厚，秉性忠诚，两旗土默特并凑集商农以及乌兰查卜盟属六旗蒙古，莫不感戴。众民欢与丹大人建修祠堂，各出物料，鸠匠兴工。丹大人自不敢居功，称皆圣上抚育，内外如一，殊恩之所致也。无奈众不我许，愈加力建造。丹大人忆及内地各省皆建有文庙，设立官学。归化城虽系口地，亦〔注三〕向化日久，何不将现修未成之祠堂，稍加展修，改为文庙。设满洲、蒙古教习，恭祀至圣先师，教良人之子弟乎！遂于雍正二年陈情奏请。皇上洞鉴其诚，照所请准行。此乃归化城地方，设文庙官学之所由来也。

吾侪奉公至此，目睹塞外蒙古地方，如此建立文庙，遇丁诚祭，教育蒙童之美事，欢忭之至。通讳智者，于雍正十三年又奏请自学考拔俊秀者七人，授为九品笔奇格齐，随衙办事等因。经理藩院议得：照通智所请，准其设放笔奇格齐七员。赏给九品顶戴。后果出力行走，好送京引见，酌量于本所章京笔帖式选用。等因覆奏。荷蒙天恩准行。自此官学诸生得进身之阶，愈加鼓励矣。

忆及善始务须慎终，后世有同心者，重修斯庙斯学，恐不知

---

注一当“牧”之误书

注二“是”字句上句下都不妥，疑衍文。

注三“亦”当亦之误书。



作者之由，特录刊勒。〔注四〕

雍正十三年岁在乙卯夏四月吉日立

本稿系一九八一年清理原土默特旗都统衙门所藏满清文档时，在废纸堆中所发现。即原土小状元桥和大成殿山门两侧所立之两大石碑上的碑文原稿。作者是通智或其幕僚所撰。

原碑在“文革”时已毁作楼基用。不可查。幸碑毁文存，幸甚。以供修土小史者参研。

一九八五、七、二十八日

责任编辑：万青林

---

注四勒即“勒”之误书？

# 土默川蒙古族人名 与蒙语地名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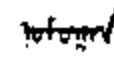
苏 若

土默特蒙语地名有悠久历史。由于蒙语地名形成的年代较早，人们对这些地名的理解，对蒙语地名的来历、含义不能准确地理解。对土默特蒙语地名，学者、专家有所研究，但说法不一，在报刊上也有不同的运用蒙语地名的含义。凡是疑难难以理解的蒙语地名其多数系人名和姓氏。笔者曾参与一九八二年的土默特地区的地名普查，走村串户调查了蒙语地名，但由于土默特蒙古族失掉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已有百年之久，真正懂得土默特蒙语地名含义的人极少。笔者从八二年起注意收集蒙语地名的含义，并写出几篇蒙汉文文章，探讨了一些问题。本文着重探讨以人名得名的地名，征得土默特籍同志的意见做进一步探讨。

## 一、以人名得名的地名

本文所包括的以人名得名的地名为现在的呼和浩特地区的土默特左旗、托克托县和郊区的地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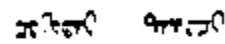
土默特左旗的〔恰台吉〕一名，系蒙语 *Hiataji* ①的谐音，汉语叫康台吉。蒙族一般叫恰或卡（当地音 *Qia*）。此名为明代阿拉坦汗（明人叫作掩答）之义子托克托呼的别号或者《阿拉坦汗传》的作者达云恰。前者的可能性较大。


土左旗〔脑木罕〕一名，不少人认为忠诚老实之含义。笔者根据《北虏风俗》一书的蒙文译本附件《达延汗世系表》记载：  
nòmgan②蒙语为  四子王旗脑木更苏木与此同一含义，以脑木更山得名。脑木更为人名得名，此人为达延汗之孙昆必力格的儿子叫脑木罕，蒙文为“脑木干”的音。

土默特左旗的〔圪力更〕一名，为明代台吉。蒙文音为 Geleg。达延汗后裔哥力各台吉的谐音，还是藏语种的 Geleg，笔者看不准。但有一条，人名乃是接近历史实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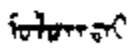

〔五路〕一名，在社会上有多种异说，笔者收集有 Uul，云彩，蒙文副词 Ulu；古部落名 ürüüa；山 ulu，壮语 ürüü，毛发之色 o lo 汉语“第五条路”等。实际上是阿拉坦汗之孙五路把都儿台吉的绰号，他的真名为那木尔台吉。在《达延汗世系表》上有此记载。《古丰识略》上记为“五路台吉板升”是驻牧地。



〔八拜〕一名，在呼和浩特地区，以及《呼和浩特地名志》上有各种不同的说法。说古城遗址为“八拉圪苏”。笔者于一九八三年随同内蒙古大学金峰同志一起发现的达尔架村庙碑上有三名叫巴拜的立碑人。在古人名中也有查干。巴拜的人，即成吉思汗十七代孙、达延汗第八代孙也有巴圪拜的人。此名与蒙文口语上也接近八拜一名。笔者虽然难以肯定究竟哪一巴拜的人得名，但有一条，乃人名是无可非议的了。

〔七乞台〕一名（属郊区），据《大黄册》一书记载：Qigtai taij  是达延汗第七代孙。

〔巧报〕俗称〔巧尔报〕，此名是一条争议的地名，在有关资料上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呼和浩特市地名志》蒙文是小雏〔Qōrbōg〕汉文来历称：小路，〔Qōbūō〕另外在有关刊物上 Qēbōō  “聪明”之意。笔者结合该村附近两个“太什”名联系研究，认为是绰罗斯拜一名的谐音。绰为满都海夫人之父。“太什”在蒙语上是汉语“太师”的含义，其中汗之岳父也作“台什”。满

都海之父乃土默特之恩库特部的绰罗斯拜特穆尔丞相（见《汉译蒙古黄金史纲》75页）。至于“拜”变为“板”，是受土默特蒙语语音的影响，土默特人叫“拜兴”叫“巴兴”。所以“拜”变“板”是可能的。

〔茂林太〕一名，《呼和浩特市地名志》采用清顺治年间的人写作Mö lögtai  是不准确的。《呼和浩特市郊区地名志》采用 Mörtai, 含义为“有马者”。笔者在《达延汗世系表》获知，阿拉坦汗之侄子兀慎·歹成·打儿汗·打儿麻台吉有九子，其老三为摸郎太。在其九子中在土默特地名中出现四条：兀慎（五申）打儿麻（托县有五个打麻营）忽日圪气（虎喇害气）刀儿计（多尔计）八格四（蒙文  把什）。这一现象不是偶然的巧合，地名是历史的见证，是历史遗留下来的痕迹。所以显然不是清代顺治年间的人，把明代人岂有隔几百年后拿到清代命名之理？

〔图利〕一名，《呼和浩特市地名志》采用清代人名。笔者根据史料认为是明代人名 Toloitai   〔图雷台吉〕。

〔哈力拜和阿力拜〕，《呼和浩特市地名志》采用植物大麦义。笔者认为明代人名他儿拜台吉的谐音转义。“他”变“哈”和“阿”，在《蒙古秘史》上常见的语音特点。

〔善岱〕一名，《呼和浩特市地名志》采用自然实体名Xangp 义为“下湿地”。以自然实体得名的地名在内蒙古地区尤其在牧区是常见的。但笔者根据土默特地区的蒙语地名的特点，认为是以明代人闪大台吉得名（又作闪旦）。《北虏风俗》记载，此人与其父一起驻牧于丰州滩西没纳河。没纳河在何处，据考证在哈素海附近。那么，可肯定地理方位是善岱一带，即善岱台吉的驻牧地，理所当然可以得名。

〔独立坝〕一名，《呼和浩特市地名志》未说哪一朝代人，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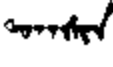
惜蒙文错写为  $\text{ᠠᠯᠠᠲᠤᠨ}$  应当是  $\text{ᠠᠯᠠᠲᠤᠨ}$ 。据史料记载为“的力波儿”，是阿拉坦汗重孙即松木儿台吉之次子，长子为的力盖儿台吉，《北虏风俗》作“跌力波儿台吉”，是辛克都隆之孙即排行第五之松木儿之子。也就是第五世达赖喇嘛之兄（《土默特史料》第二集敖登同志的《阿勒坦汗诸子世系表》和《北虏风俗》11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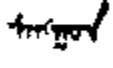
〔什不更〕一名，《呼和浩特市地名志》采用人名，但来历上却成为清乾隆年间的人。蒙文字  $\text{ᠰᠤᠪᠭ}$  Subg “锥子”的含义，不准确。清代有无此人，有无以此起名的人，姑且不论，笔者认定明代台吉 Xebgen taii，是阿尔苏博罗特之孙，驻牧营地，丰州滩西，没纳河附近。其父驻牧营地多罗土蛮（见《北虏风俗》译本133页）。

〔出院〕，《呼和浩特市地名志》采用 Qoin  $\text{ᠬᠣᠶᠢᠨ}$  “特好”之含义。笔者在蒙文辞书中查找，无此词。在《蒙古源流》一书中见到“诺漠库知院”的人名，在蒙文上却与出院一名一模一样，蒙文作  $\text{ᠨᠣᠮᠬᠤᠴᠣᠶᠠᠩ}$  Nemhu Qoyang。





〔把什〕一名，社会上称“老师”的含义已经约定俗成。但以人名得的可能也不能排除。《北虏风俗》蒙文译本119页上记载：巴尔斯博罗特三子之孙即朝台吉之四子叫作 Bāg<sup>x</sup> taij。蒙文的意思就是“老师”、“先生”之意。加上“板升”一词，就是人名加建筑得名。



〔忽拉圪气〕一名，《呼市地名志》采用“放羔羊之人”的含义。含义是对的。但是笔者认为人名与放羔羊毫无关系。而且在达延汗后裔中有三四个类似的人名，虽然汉文不一，但蒙文却一样，汉文有虎刺哈气、虎赖哈和虎喇害气等，也许是为了区别哩。虽然笔者难确认此地名是因哪那一忽拉圪气台吉得名。但在历史上却有此人名，并在历史地名中出现，也是不奇怪的。社会上流传的“胡拉盖”（盗窃的人）那更是讹传。

〔道试〕一名，《呼和浩特市地名志》采用“暴烈不驯服”，  
Dōgxin  其实这一名来历为明代台吉的绰号得名。有关史料记载：明代巴图孟克达延汗七子那力不赖台吉的绰号“倒身”。蒙文含义同。从呼和浩特地区的地名特点分析比较接近于土默特历史实际。


〔三空〕（现名为“三富”）一名，《呼和浩特市地名志》采用清代乾隆年间一喇嘛三更得名。来历人名是对的。但不是清代人，也不是喇嘛，据《达延汗世系表》记载：阿拉坦汗四子丙免台吉之长子叫作 Xānggun taij  汉文作三温台吉。与《呼和浩特市地名志》上的蒙文一致。蒙文音与“三空”“三更”的汉文相一致。“gun”念为“kun”是受土默特蒙语语音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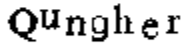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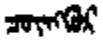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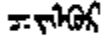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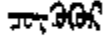

〔格尔图〕一名，《呼市地名志》虽然定为人名，但形成年代写为清雍正年间，并把此名改为现代名格日勒图是不妥的。在达延汗后裔中有两个不同用字而音相同的人名，蒙文作——Gert

Gerut   还有 Gāltu  （后者在《大黄册》为巴尔斯博罗特后裔，即阿拉坦汗次子，而《北虏风俗》记载不彦台吉，《阿拉坦汗传》记为  。


〔达赖〕一名，在土默川地名中一名多地。在土默川历史上人名也不少，可是在《呼和浩特市地名志》上都与达赖喇嘛挂上钩，什么达赖喇嘛驻地管辖……等。四世达赖确实出生在土默川，据史料记载四世达赖出生在阿拉坦汗长子辛都隆汗之五子松木尔台吉家中，据有关史料记载出生在苏不盖（塔之意）村。也有 Dara taij,   的人而汉语文没有“rā”的音只好用“拉”或“赖”来表示。不一定达赖就是达赖喇嘛，那岂不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吗？《呼和浩特市地名志》甚至写成清代有一达赖喇嘛曾住该村那更是荒唐。


〈大岱〉一名,《呼和浩特市地名志》采用与达赖一名一样的来历之说待考。

〈铁帽〉一名,《呼和浩特市地名志》采用清乾隆年间的牧民铁帽的驻地一说,笔者有不同的看法,在明史上叫此名的人不少。从达延汗夫人满都海父亲开始到辛格都隆,都在名字上边加铁木儿,在古代人名中很多特穆里、特木儿、图睦尔等都加在名字的前边或后边。其蒙文都是 。这大概是尊号,例如《蒙古源流》上把辛格都隆名分开写为:辛格·都隆·帖木儿·洪台吉。


〈桥靠〉一名,在呼和浩特地区,是众说纷纭的地名,《呼和浩特市地名志》采用人名基本接近实际,就是蒙文写错   ,在史料上蒙文有三种写法   和  而汉文却都写为朝库儿。在《达延汗世系表》中有三个朝库儿(《北虏风俗》蒙译本126页、135页、121页)在地名上《古丰识略》记为〔桥扣儿〕,日伪时期的资料记为桥靠儿。《呼和浩特市郊区地名志》解释为靠桥的村。如果把蒙语历史地名都颠倒过来解释,那成何体统?

〈合林〉一名,是人的绰号道高隆台吉得名,可是《呼和浩特市地名志》改变了来历含义,随意解释,其来源是《呼和浩特市区地名志》。二者基本一样,《呼和浩特市地名志》记载:“此村建于清初。因当时一户蒙古人从和林格尔迁来,取村名多合林,又因在乾隆年间被洪水冲毁,居民迁到原址一华里处建村,得名“倒合林”(倒是汉语方言搬迁之意),而《呼和浩特市郊区地名志》又进一步说明:《土默特沿革》(荣祥著)记载“捣黑楞”是明代阿勒坦汗儿子黄台吉的绰号(拐子之意),黄台吉住驻牧此地,人们以他的绰号取名。荣老所说的倒,接近此含义。笔者认为此名,与和林格尔县名毫无关系的蒙语历史地名,据《蒙古及蒙古人》一书记载,归化城东部一个村名叫“道高隆”。

《大黄册》记载蒙古族贵族的绰号 *Dōg long* 。名字叫宝来台吉（音译）。荣老指的黄台吉的绰号，黄台吉腿不拐，手有残，所以宝来台吉的绰号之说，蒙文古籍是准确的（见《大黄册》249页注2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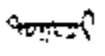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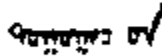
〈古楼〉一名，有关地名书籍把不稳定用字的蒙语地名说成“古路”，并说什么通往西京（大同）的古路是错的。笔者认为一是明代人名古禄格的谐音，二是清代人“古噜”。笔者在此村与金峰（现在师大历史研究所）一起考察见一古钟（是乾隆年间的），古钟上记为“古路”。蒙语地名特点之一，用汉字记录时用字不稳定，从而进一步认定是蒙语地名。因所用之字是记录音的，而不是记录意的。汉语地名“崞县窑”不能记为郭县窑一样，汉语地名不能更动，而蒙语地名却不然，可用这字也可以用其他字。从而可以证明古楼也好，古路也好，是人名得名的地名。“古禄格”一名在史料上常见，这一“格”字是蒙语  *Huleg* 是辅音，记录于汉文中往往省略。上默特地区类似情况很多，屡见不鲜，如：“哈拉乌素”简化为“哈素”，“道高隆”省略为“合林”，“塔布秃利害”简化为“塔利”，“阿尔嘎顺”、简化为“尔胜”，举不胜举。所以笔者认为古楼是“古禄格”的谐音转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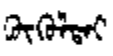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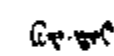
〈大窑〉一名，社会上人们都认为是汉语地名，笔者却认是人名，而且是明代著名台吉。《地名志》却认为是采火石挖出的窑，采火石一般随地可拣，没有挖窑之可能。一九八四年笔者会同金峰副教授新发现的达尔架小东营庙碑（现保存在内蒙古大学图书馆门前）金峰同志命名为“达腰·古什·台吉碑”。此达腰一名与地名相一致的音，大概不是历史的巧合。


〈大阳〉一名，《地名志》定为汉语，是“大营”的演变。不大可能，古人也不会把大营叫成大阳，相反是人名 *Dayan*  汉文作“歹安”。是百斯户勒台吉之孙，而百斯户勒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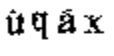





名上演变为百什户，和百只户。这也不奇怪，奇怪的是明代贵族为什么如此用自己的名字命自然村，更奇怪的是现代人把它变成汉语。

〈讨合气〉一名，《呼和浩特市地名志》采用“炊事员”的含义。笔者认为此地名有可能是人名。据《土默特史料》八集《土默特部大事年表》（明代部分）上有两个不同写法的人，一是托郭齐少师，另一是陶固齐。此名与地名讨合气相似。在蒙文古籍上为  Tögöq 而不是  （做饭者）Tögödöq 在蒙古族姓氏也有 Tögödöqid  蒙古姓。看来以此含意得名的地名也是可能的。笔者认定二者之间的前者。

〈古红岱〉一名（原名〔古公岱〕），《呼和浩特市地名志》和《托克托县地名志》都采用“浅河谷”的含义。笔者认为人名  Huhul᠋ᠳᠠᠢ 《蒙古源流》记载：库库带而蒙文同上。所以笔者认为受土默特蒙语语音的影响演变为“库库带”，“库库带”变成古公岱。而“浅河谷” Gunhur᠋ᠳᠢ  是猜测。

〈牛牛营〉一名，在土默特左旗就有两个自然村。《呼和浩特市地名志》都采用明代奴奴台吉蒙文 Nūnūn  的谐音。在明代汉文古籍上常有用贬义词来表示的现象，如把丙图台吉写作丙兔、安兔等。牛牛也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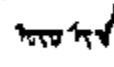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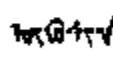
〔伍把什〕一名，《呼和浩特市地名志》采用清代乾隆年间的人名“伍把什”，也许是有根据，笔者认为明代人  ūqāx  伍把什。巴图孟克达延汗八子格埒森扎四代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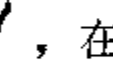
〈毛恼亥〉一名，人们说赖狗之意，不准确。据史料记载《大黄册》记为  Mōlhai 和  Mōnohai 不是“赖狗”之意。古代人名难以搞清含义，成吉思汗一名，学者们争论不休，不是成为至今尚待研究的课题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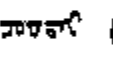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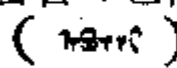

〈达尔架〉一名，《呼市地名志》记载，该村小东营姓云之蒙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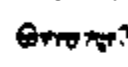
族祖名。笔者去该村多次实地调查，小东营姓李之多尔计老汉保存的他家家谱，共有九代，高祖为“达尔架”，次高祖叫“妥妥岱”。而这两名都出现在土默特地名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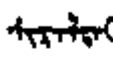
〈妥妥岱〉一名，《呼和浩特市地名》采用清乾隆年间此地为妥妥台吉的草场。此名不仅出现在家谱里，出现在明代人名中，即阿拉坦汗义子托克托呼（恰台吉）。故笔者认为明代得名的村。也是与达尔架村有关的地名。

〈五申〉一名，《呼和浩特市地名志》：明代建村，因该地是阿拉坦三侄儿五申的驻牧地。蒙文作  或  两种写法，音一样。

〈兰灿和安鞮〉，笔者认为是一音译的地名。在有关历史资料上有“也林金”蒙语 *Riqin* ，在蒙语口语上“也林金 *Eriqin*。是阿拉坦汗重孙。



〈潮岱〉一名，《呼和浩特市地名志》采用“出名的好地方”的含义。蒙文  *Qutai*。笔者认为与此含义相近的人名，阿拉坦汗之孙朝兔台吉或他重孙晁兔台吉的简化。或阿拉白汗侄孙，朝台吉（也作朝哑不害台吉）的谐音。蒙文作   
(  ) 

〈补还岱〉一名，《呼市地名志》采用“牯牛”的含义，不准确。笔者认为明代人 *Buhantai*  即百斯户勒台吉长子白洪大的谐音。在土默特地区地名中带“岱”字者如什兰岱、大岱、善岱、古公岱大多数人名加封号台吉的简化。

〈什兰岱〉，一名《呼和浩特市地名志》采用明代人名 *Xaradai*  是正确的。

〈界台〉一名，《呼和浩特市地名志》有这样的记载：“据考证此村前有战国赵长城，是赵武灵王所筑，在遗址附近有烽火台，叫界台”。这一说使人费解。什么叫烽火台的界台？笔者在史料上看到蒙族古人叫“哲台”或“者台”的人这两名似乎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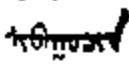
名相似，或许是人名。

〔班定和班头〕，对此两名，《呼和浩特市地名志》采不同含义。一名多地的班定一律采用小喇嘛的含义。而班头一名，采用汉语人名。以小喇嘛的称呼得名当然有可能，但此名有贬意，同时相比之下，**Bāndi**是无名鼠辈，相反，有无可能喇嘛学位**Bāndi**  得名后简化演变的谐音转义。另外明人名也有班兔、班的·思克，蒙文作  **Bāndi SeKe**。究竟何义需要探讨。

〈什力邓〉一名，《呼和浩特市地名志》和《托县地名志》都记载是元代人，并有这样的来历记载：据传元朝商人沙尔登从乌苏里江去鄂尔多斯，经商途中住此地，形成村落……如果这相传是真的，那么武川县什力邓又如何解释？这个人走到哪儿就会得地名之理？经商途中住就可以得名之理？成吉思汗走遍欧亚两洲，只有一名（黑龙江省小火车站名），笔者认为“什兰岱”一名的谐音。而且在《托克托地名志》蒙文上采用了此含义。但汉文上仍然记为此来历。

另外，在土默川地名中与历史人物名相似的也不少，如坝堰、公布、关布、根堡等。这些人名，不仅古代有近代也有，难以考证，特别象乌兰巴图、吉雅太、那苏图、三卜树、丹巴、沙金图、巴彦桑、桑庆、桑达来、博彦（路）等，笔者虽然认定是人名但尚未找到历史依据，有的《地名志》也未说清，尚待考证。

## 二、以蒙古姓氏得的地名

〈什报气〉一名，《呼和浩特市地名志》采用“驯养猎鹰的猎人”之含义，蒙文作  **Xūbúúbin**。《绥远通志稿》记为由庙名得名。“驯养猎鹰”，是杀生，庙会得此名否？笔者认为是与猎人毫无相干的蒙古族姓。据蒙文《大黄册》记载：达

延汗时期永谢布万户十鄂托克，其中有叫什报气（或什报沁）的鄂托克名，另外和林格尔县的地名“脑木气”，也在十鄂托克中出现。所以笔者认为古部落姓氏演变的鄂托克名。故得庙名也是可以的。据《汉译蒙古黄金史纲》蒙古家谱作“石包沁”部。《金轮千福》记作“失宝赤”乌珠穆沁部的鄂托克名。《鄂尔多斯蒙古族姓氏作  $\text{ᠬᠤᠫᠤᠨᠤᠨ}$  Xūqūnbin。

〔泉子什〕、〔巧尔什〕，笔者认为，同一含义而用字不一的两个地名。《呼和浩特地名志》采用前者为“有泉子的地”，蒙语朝勒实”。有泉的地方 Bulāgtai 不是“朝勒实”。“朝勒实”一词为笔者提供了一条好线索，就是蒙古姓 Qōros  $\text{ᠬᠣᠷᠣᠰ}$ 。根据《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86年三、四期）布和放岱、关其格的文章《蒙古姓》一文，收集了近四百条蒙古姓。并记录了现在的演变，有的虽然与“百家姓”一样的字但有截然不同的来历，如现在蒙族姓赵的是 Zālair  $\text{ᠵᠠᠯᠠᠢᠷ}$  和 Zālaid  $\text{ᠵᠠᠯᠠᠢᠳ}$ 。蒙族姓钱是蒙语 Minggāp  $\text{ᠮᠢᠩᠭᠠᠫᠠᠫ}$  而姓孙是 Sulzis  $\text{ᠰᠤᠯᠵᠢᠰ}$ 。变化莫测，难以辨别。或是头一个音、或中间音，或含义。

〔塔布子〕一名，是更替名，现在是塔布赛。此名的来历含义《地名志》称“五户之意”。这条线索为笔者提供了 Tabnūs  $\text{ᠲᠠᠪᠨᠠᠰ}$  的蒙古族姓氏，如果是姓氏，那么与“五户”无关，与汉族姓牛、姓马与牛马无关一样。此姓又作 Tabūd  $\text{ᠲᠠᠪᠤᠳ}$ 。

〔祝拉庆〕和〔祝乐庆〕的地名，《呼和浩特市地名志》一律采用蒙文 Jūragin  $\text{ᠵᠦᠷᠠᠭᠢᠨ}$ ，圆匠的含义。《托克托县地名志》（笔者译蒙文）采用“点灯者” Jūlgin  $\text{ᠵᠦᠯᠭᠢᠨ}$ 。现在看来蒙文字是对的，但含义错了。不是“点灯者”，而是蒙古族姓。在古代人名和蒙古姓中想找出什么含义，搞清什么意思，乃是徒劳的，只能造成随心所欲的解释而已。

〔五申〕一名，笔者在前一问题中提出人名，但蒙古族姓氏申

也有此姓蒙文 Uxin <sup>ᠤᠬᠢᠨ</sup> 古人往往有把人名与姓混淆的现象。故认为人名与姓氏之间，两者必居其一。

〔什拉〕一名，一般都认为黄色之含义。但需要进一步考虑，是否有省略简化地方或拉音丢字处。古代蒙古姓氏 中 Xār nūb Xār bohaS 等。

〔毫沁营〕一名，《呼和浩特市地名志》采用“旧”之意。笔者过去一直认为古代部落 名 HuūbiP <sup>ᠬᠠᠭᠤᠪᠢᠯᠠ</sup> 蒙文字是对的但含义不是“旧”。来历是蒙古部落和姓氏，也就是氏族名。Huūbin <sup>ᠬᠠᠭᠤᠪᠢᠨ</sup> 和 HuūbiP <sup>ᠬᠠᠭᠤᠪᠢᠯᠠ</sup> 一音之差。而且后者的“P”为辅音，用汉文记载时往往会省略。

〔哈达图〕一名，《呼和浩特市地名志》采用“有岩石的地方”之含义，是对的，但与石无关的姓氏，蒙文与此相同的音。












〔台什和尕不浪〕，笔者过去认为是封号封衔。但在蒙古姓氏确有同一含义同一字的姓氏。或许是封号变为姓氏。更奇怪的是“板升”一词人们都认为“房子”或土木建筑的房子，但姓氏上也有，现在演变为姓“白”。

〔毛岱〕一名，是土默特右旗的乡名，《内蒙古地名志》、《包头分册》采用“毛都太” MōPtai <sup>ᠮᠣᠫᠲᠠ</sup> “有树”之含义。笔者在《蒙古姓氏》中看到 MōPai <sup>ᠮᠣᠫᠠ</sup> 的姓氏。作者在笔者家乡巴林右旗收集到的现在演变为姓穆。



以上是笔者在研究土默特蒙语地名中的收获，大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望研究地名的有识之士，多加指教。

注①②此文采用之罗马文字母为汉语音是按中国地名委员会少数民族语种转写规则书写。

## 编者附注

- ☆ 1、“  ”汉音译是图雷·台吉。
- ☆ 2、跌波儿：蒙文当是： 。实际是  。
- ☆ 3、“出院”：蒙文   。
- ☆ 4、“道试”：约指：“刀什尔”。
- ☆ 5、土默特蒙语接近鄂尔多斯方言。“、呼”发“库”的音。  
 与满语“。”同音。例： 即发音库孟。
- ☆ 6、古楼：作者考是  ，人名音转译。证：清初土默特旗左翼都统即是其名。也就是丹津都统，田玉副旗长之第一代祖先。

另：编者系该村人。假如按汉意解：“古路”是古代直达北京的两条古道之一。俗称“南路”经大同、张家口入京。然而有“古楼石碑”所记，当信其碑文。

- ☆ 7、“  ”即乌古辛、乌审之音译。

本注未经作者同意，请谅！

责任编辑：万青林

1986.11.29

# 蒙藏学校土旗籍学生名单

孙继祖

(1935—1936)

- 高中三年级：云文翰 丁贵和 李春山 巴文灿  
高中二年级：王吉厚 成以博（克力更） 多琳秀  
高中一年级：李焕文 荣宝麟 荣光清 补洽邦  
初中三年级：（1936年夏季毕业）  
李成林（寒峰） 丁林秀 锡振华 云瑞卿  
云文霖 云文林 云奎英 云得善 富光耀  
黄广奇 王裕厚 富存仁  
初中二年级：（1937年夏季毕业）  
孙继祖 袁鸿举 云麟宝（墨志清）  
张家麟 章文秀 贺国昌  
初中一年级：  
孟 绍 伊锦文 贺书昌 袁绍瑛 武国甫  
云惠元 富得永  
补习班：成俊 袁继璞

以上这些人的姓名及所在年级似无差误，但不敢说一无遗漏，也许不止这些人，望知情者补正。

# 小召简史

## 兼述“七大召、八小召、 七十二个绵绵召”

王庆先生忆述

赵国恩 整理

按：王老先生，自幼出家，是小召的最后一位主持喇嘛。文工蒙满汉藏，解经释佛，尤为其擅长。文内所忆各召之简史，不啻宗教正本档册。据所述及，既可使呼市十五召史外生辉；又能给宗教传说锦上添花。况年已八十过五，仅凭口忆，诚属难能不易。

核：“七大召、八小召”记，除太平召外，大都与蒙文版召庙档相符；尤对“七十二个绵绵召”的解述亦切题含真；引经据典也近乎实际。深望史家、识者，不吝指正之余，善考本文并丰富呼市宗教史。

编者 1986.11.15

根据土左旗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万全林、小赵同志的来邀，让我简单地讲一下小召的历史。



既然讲小召的历史，就必须和小召的佛爷※ 太佛爷联系起来。因为小召的扩大与变化、以及在历史上起过什么作用，都是与太佛爷分不开的。

太佛爷是什么人呢？他正是明末清初的人。他可能是出生在新疆境内，就是过去的四厄鲁特（注一），嘎尔丹·图尔古特部族，据说还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太佛爷他既然是贵族，可能还是按过去来说是小罕国的一个小罕（注二），也就是酋长。是世袭网替，他还是个继承者、世子，已经娶妻生子了。

那么，他因为甚要出家呢？蒙古人不是尚武吗？在二十九岁上。有一次出去打猎，他用箭射住个骡马——野马。过去那种箭的箭头大，正射在这匹马的腹上。这匹马已经怀上了马驹子，也就快下了，而这支箭射得也太巧了，正好把那个胎胞射裂了。这匹马什么也没顾，扭回头就把那箭咬住了。箭头一拔，那伤口顺势裂开，那个马驹子也就从伤口上掉出来了。虽然小马驹掉出来了，可是这匹马不但没有那么惊惶失措地跑，反而折回头来舔着它那个马驹子。太佛爷这个人，当时就起了侧隐之心。他心里在想：牲畜尽管受了这样大的惊吓，也不是只顾自己逃命，而是顾着自己的亲骨肉，何况咱们是人，为什么还不如牲畜呢？从这开始，他就起了一个出家的心愿。以后，一个阵儿地找些佛经佛传看。他看见个什么佛教，是颂扬皈依的。皈依就是起初对神佛的一个信仰。念这些经的时候，他经常跟家里的人说，他要出家，去这儿去那儿。可是，他的家是那样的一个世家，舍不得让他走，而且家里边也仅有他这一个儿子，又怕绝了后。于是，家里边就找了很多的看守人员来看守他，怕他跑了去。就这样，他在那儿看书、念经，看守人员也在那儿陪着他。有一天，他正在那儿念经。突然来了一股大风，把他念的这一部经里边的一页子

---

佛爷：喇嘛们对本召“活佛”的尊称。

刮上跑了。那些看守的人怕荡上土，不敢露面。只有他一个人追上这一页子经跑，一下跑了个没踪影，一直没有回来。从此，他走了许多年，过了好些地方，象拉萨这样的佛教圣地也去过了，并且学到了不少的东西。从那以后，他的神通也广大了，还有好多不可思议的神话。这个没根据，我就不说了。

后来，这个喇嘛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背着个背夹子，周游四方。最后，他游到了呼和浩特，进了大召。大召正是阿勒坦汗时，索纳木扎木苏修的。他来大召的那会儿，大召的规模已是很可以的了。他一进大召，大召的喇嘛正在念经。他就凑到喇嘛念经时坐的那长条矮凳子上，坐在末尾，也参与喇嘛念经。不一会儿，就被讲经堂那个执法的格斯贵（注三）发现了，他就让赶出去了。人家一边赶一边还骂：“哪的个野喇嘛啦，来这儿来了。”他被赶出去以后，转来转去就转在个小召。在那时，小召是个规模很小的召。这个召是一个贵族的家庙，可能是阿勒坦汗的孙子，叫文布台吉呀什么（这个名字记不清了）的家庙。这个庙里也有少数几个老喇嘛。因为他是很有学问的，所以，直接就被这些老喇嘛敬奉起来了，后来就当了这个召里边的佛爷——太佛爷。

太佛爷从小召就修行到了古楼板那儿。那里有个额尔德尼喇嘛，额尔德尼就是宝贝的意思。古楼板那儿有个洞，就是东喇嘛洞（这个洞就是在去四子王旗的那条战备路的沟口子里边，现在不知道在不在了）。他就在那里修行了好几年。有一天，施主们敬奉给他一个骑乘，是个黑色儿马。有的人就说：“骑马还骑儿马呢？应该骑骗马。”“不，儿马是马种呀，对我们佛教的传教是很有帮助的，到处可以撒种子啊！我就喜欢骑这个。”于是，骑着这个黑色儿马一直到了蛮汉山（即革命根据地蛮汉山）。蛮汉山那儿有个石洞山，上边有个石洞，山顶上有两块大石架碰了头（注四），底下有个窄豁廊，他又在那里面修行去了。这个

山的西面便是土默特旗，北面是四子王旗，东南面都是我们察哈尔镶蓝旗。那儿的施主们也有好多，就给他拿石条（用石匠修出的石条）修了个洞。那个洞如今还在，有咱们现在的半间房大。据说，太佛爷在那里修了十二年。在这十二年当中，他跟察哈尔镶蓝旗啦，察哈尔八旗啦，一直到圪什腾、喀喇沁，以及当时的科尔沁公爷府啦、王爷府啦这些个王爷都认得。这些王爷在请他的时候，是一个旗一个旗地请，一直请到哲盟的科右中旗。科尔沁不是十个旗么？郭尔罗斯左翼、图舍图左翼旗啦等等。他们正在图舍图那个地方修了个庙。这座庙叫白音哈少素木（注五），就这么把他敬奉起来了。

在这个时期，满清还没入关，还在沈阳。顺治入关以前是两个皇帝，一个是天命，一个是天聪（注六）。他们知道了这些事以后，就把太佛爷请到沈阳去了。没入关的满清皇帝就把他敬奉起来了。敬奉起来以后，对各个蒙旗（科尔沁、哲盟、昭盟等）的一些蒙古王爷们归属满清这方面起过很大的作用。那些蒙旗原来供奉的是珊满教，搞个祭祀什么的话是大批地宰杀牲畜，连牛马都宰杀。太佛爷去了那里，把这些恶习都改了，都改成了佛教的大慈大悲。那里的人们逐渐地信仰起了他。这样，珊满教就逐步让佛教取代了。太佛爷他以佛教的力量在那里传教，很得民心，度的徒弟也不少。在那个地方，男男女女都念经。过了些时候，满清入关了，他还在这个地方传教，并且跟满清很有来往，被敬奉得挺什么的。在沈阳被供奉的这一代就是托音·一世。这一世一直到康熙年间才去世。

这里面还有这么一段：前面说到太佛爷已经娶妻生子，他的儿子继承了他的爵位，也就是他们那儿的酋长。在太佛爷圆寂以前，也就是在沈阳被供奉的那个时期，他的儿子带着自己的老婆看他爸爸来了。他的儿子和媳妇来了以后，一进门，就把他当年出走的前因后果讲了个清楚，说得有根有据。由于他不想再认白

己的儿子，所以，当时就吞吞吐吐地说了这么一句：“啊呀！我没有……我没有娶妻生子。”接着，他又很干脆地说：“没有娶过老婆，哪有儿子呢？”他的儿子和媳妇见父亲不认，心里很难过，跪在那儿不吃不喝地哭。就在这个时候，左右的人都上前劝说，说是你就认一认吧，看他们这个样儿怪可怜的。就这样，你劝一句，他劝一句，太佛爷也就动心了。他思忖了老半天才说：“认，可以，儿子削发当喇嘛，媳妇削发为尼，都出家。”于是，儿子和媳妇都削了发，最后又和他们见了一面。分别的时候，太佛爷说：“我不能回去了，也不能过多地叙说我们的父子之情，因为我已经走了这个路子（就是当了喇嘛），不能再还俗。你们回去，自己生活吧，咱们可以各走各的路子嘛，这也挺好吧！”就这样，儿子和媳妇被打发走了。回去之后，一个当了喇嘛，一个当了尼姑。

接下来，我再谈一下太佛爷和珊满教斗争的故事。前面我已经讲到，太佛爷是很有神通的。珊满教曾经反对过他，这个教的首领还有法术呢。据说，他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想叫下雪子就下雪子，想叫下雨就下雨。他们有这样的法术。由于佛教的广泛传播，珊满教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几乎没有人敬奉他们了，因此，珊满教的那些首领们把太佛爷看成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总想寻找个机会报复他。据说是在一天夜晚，太佛爷正带着三十二个徒弟，住在一个小帐篷里讲经。突然，乌云密布，狂风大作，霎时间，鸡蛋一样大的冰雹下了起来，一直下了好长时间。按他们的估计，这场雹子下过以后，可能连小帐篷也会被打成碎片。他们那个首领非常得意，于是，带着他的土著徒弟们看去了。他们是想看一看那个帐篷究竟怎么样，埋了没有？老喇嘛死了没有？谁知他们去一看，离帐篷很远的地方都堆着雹子，帐篷的附近什么也没有。再到门口一看，地上只有两把雹子。一揭那个门帘，刷地一下，里边就撒出一堆雹子来。原来，这些雹子

都在太佛爷的怀里兜着呢，见他们来了，就这么撒出去了。太佛爷一边撒一边还说：“唉！拿走吧！”“你说拿走就拿走。”那个首领一面回答一面接收雹子。哪知道，太佛爷这么一撒，就把他们那个鼓打烂一面。从此以后，珊满教的鼓就一面有皮子，一面没皮子。据说，这就是让太佛爷的雹子圪旦给打烂的。而太佛爷那三十二个徒弟呢？据说是太佛爷把他们盖在喇嘛用的那个摇铃铃里面了，一个也没伤着。这三十二个徒弟，以后来咱们这儿的还不少。他们都念蒙古经。蒙古经就是从太佛爷那儿传下来的。如：东喇嘛洞、西喇嘛洞、乌素图召、西公旗的墨尔根庙等，都念蒙古经。每个蒙民也都念蒙古经。乌拉特前旗的最后一个佛爷叫老不生什么来着，比我大几岁，“文革”当中死在了这里。他是个挺有学问的喇嘛。

托音·一世圆寂以后，又要请二世佛爷了。因为命名第一世的时候，满清的理藩院已经备案，所以请二世佛爷的时候还得通过理藩院。第一世本来是个很了不起的佛爷，满清皇帝也知道这些，因此，当把二世请回来以后，正赶上征噶尔丹，康熙皇帝就驻蹕于此，住在小召。现在拆去的那个小召的后面有七间楼房，已经做了学校，下面是办公室，上面是教室。过去，上头还有琉璃瓦，前头也有琉璃瓦牌楼，起名叫康熙行宫。现在，东西房大概都拆了，只是那个楼没有拆，和原小召山门前头的那个牌楼也没拆。康熙去征噶尔丹，折回来时也驻蹕于此。这里边还有舍力图召的佛爷，也就是今世活佛扎木苏的上几辈。在这个时候，他也和康熙有过来往，也同样受到了尊敬。

另外，小召里头原有两个石碑，镌刻着蒙、满、藏、汉四种文字。这些东西在“文革”期间拆了小召以后，不知哪里去了，我不好过问。因为我还俗了，同小召也脱离了关系。小召的存在与否，跟我的命运关系不大。但是不是心里头还有一点舍不得的样子呢？还是有的。

咱们再接住前边的讲。康熙打了胜仗以后，就把用过的战刀、盔甲一起留到了小召作纪念。那些东西一直保存到日伪时期，据说是旗政府的日本顾问下令拿走了。这些纪念品，在过去的一年两次（正月十五、六月十五）念大经的时候，还要被抬出来，抬在小召前头，弄个架架支起来，叫做亮甲会。这时，地方上各行各业为首的以及商务会的会首们，都穿着长袍马褂，排着队，轮流地站在那儿，接应敬奉的香客和观赏的来宾。人们来了以后，烧香磕头，整整热闹那么三天。这盔甲和战刀，白天黑夜都在那儿摆着，念完经，就把它收回，保存起来。


听说那刀和盔甲解放后就要回来了。然而这把刀，是否就是当年康熙赠送的那把，也不好说，因为抗战以前人们说荣祥老总管去伪中央时，带去献给了蒋介石啦。是真是假没法弄清。抗战胜利以后，要回来的这把刀就放在当年老旗长（就是荣祥旗长）的旗政府办公室。在这里，我顺便插一句。就在去年，内大的还是师大的一个文物保管方面的小后生来我这儿了解。他问我：“小召有没有过一个盔甲和一把战刀？这些不知哪里去了？”我回答他说：“据说是让日本人拿走了。”他又说：“我也听说过。据说是博物馆经过了许多波折，把这些东西从日本要回来了，现在就在博物馆保存的了，是不是请你去辨认辨认？”我说：“啊呀，不好说，多少年的事了，我那会儿是认得，也不是成天揣摸这玩意儿。我是知道有过这些东西，盔甲的尺寸是挺大的，蟒袋里面包着铁片。现在让我辨认去，我不好说。”这把刀是挺长的，一般人拎不起来。这些可能还在博物馆，如果需要了解了解、看一看的话，我们可以按参观者的态度去看一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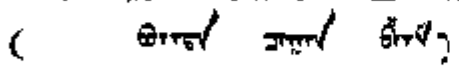
接着我再讲一下第二世。第二世据说是生在乌盟的茂明安旗，也是个贵族。过去各旗不是都有贵族吗？贵族就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因此，请这个佛爷也得通过理藩院，由理藩院注册，康熙皇帝批准。这些前面已经讲到。从此以后，二世佛爷就被满清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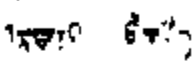
帝请上去，每年念《冬历经》。数九天皇帝洗脸时，就给念《洗脸经》。念《洗脸经》的活佛大概有四个，一个是太佛爷，一个是席勒图召的席勒图活佛，还有弘庆召的佛爷，另一个是太平召的佛爷，这都是够上格的。还有小召的一个扎萨克喇嘛，也是当时跟太佛爷的时候管财政的，是一个很能干的喇嘛，把他那些布施什么的积累起来就有好几万。二世佛爷还去过一次拉萨。去拉萨的时候，二世佛爷问他这个管财政的扎萨喇嘛：“啊呀！过去咱们这儿的施主布施也不少，我见你花得也够厉害的呀，现在我去西藏需要钱啦，你这儿究竟有没有一点积蓄呢？我可用着了！”这个扎萨克喇嘛回答说：“需要多少？还有一点儿。”他说：“还不得几千？”“你说个具体数目吧，三千？五千？”“嗯！还不得个三千五千？”扎萨克喇嘛说：“行，有，尽管吩咐！”说着拿出了大约七千两银子递给了二世佛爷。二世佛爷拿上这些钱到了拉萨，应该做的事都做了。这都是由于这个老扎萨喇嘛理财理得好。他确实很有办法，名声很快就传播出去了。这个老扎萨克喇嘛虽然不是佛爷，但是，除前面讲到的那四位佛爷外，只有他有资格念《冬历经》，其他喇嘛就没有这个念《冬历经》的资格。每年冬季，二世佛爷就带着小召的喇嘛，特意去一次北京，见着皇帝后，给他念完《洗脸经》就又回来了。据说，皇帝的赏赐还不少。从这以后，满清皇帝就下令扩建小召，就是咱们拆除以前的那个规模。后面有旧时的七七四十九间大殿，共两层。前头还有两个大佛殿。左右还有两个召，东面是那个所谓十殿阎王（说时带笑声），十大护法；西面楼上是护法，楼下的后殿是药王。前头还有好多排房。这就是扩建以后的小召规模。

咱们不是常讲“七大召、八小召吗？按地位来说，小召就是在“七大召”里居第四位。第一是大召，叫“无量寺”；第二是席勒图召，叫“延寿寺”；第三是现在的敬老院那儿被拆除的那

个召是彭顺召，可能叫“崇寿寺”；第四是小召，叫“崇福寺”；再下来是乃莫齐召，可能叫“隆寿寺”，在民市街的北头，现在拆得也不多些了；再一个是“弘庆召”，在南柴禾市；还有太平召，叫“宁祺寺”。这就是七大召。

下面咱们再数“八小召”。巧尔齐召叫“延禧寺”。小召前头有个“广福寺”，这个没有殿名。下来是美岱召（土右旗），那正是葛根·阿勒坦汗自己修的家庙，是“八小召”的一个。再过来就是 （即山里的四隐

者）也就是四个隐者在山里面修行的意思。喇嘛洞——西喇嘛洞，那叫阿勒定葛根。最老的那个很有神通的嘛嘛叫宝格德察干喇嘛，（  ）就是神圣的喇嘛的意思。

这就是坐在衣钵里头圆寂了的那个喇嘛（即原存放在喇嘛洞白塔内的木乃依）。下来就是阿勒定葛根，就是一世一世地在五当召给佛爷讲经的那个喇嘛。最后那个是日伪时期圆寂了的。他的后一代正是生在毕克齐南面的恰台基，名字叫王铎扎木苏，现在还在。四隐者指的就是东喇嘛洞、西喇嘛洞、乌素图，还有一个是什报齐被拆除的那个召。什报齐那个，理藩院也注过册，可能叫“慈寿寺”。西喇嘛洞这叫“广化寺”。下来就是乌素图召。乌素图是察哈尔喇嘛，是第一世，他是在察哈尔生的。这个召叫“庆缘寺”，是属“十五召”所管。还有几个发起的寺院，如：“长寿寺”，这已经是它的属召，打不成这“八小召”里面的。还有一个额尔德尼喇嘛，就是古楼板（东喇嘛洞）那个，也就是太佛爷修过身的。额尔德尼（  喇嘛）就是宝贝的意思。这个召可能叫“崇禧寺”。除这些以外，哈拉沁沟北口子那儿还有一个哈拉克沁班迪达。这个召也属于喇嘛印务处所管。哈拉克沁的意思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的那个癸。

以上所讲的都是“七大召”、八小召比较大一点的召。还有一些不在十五召数字里边的，象“五塔寺”是小召的属召；过去



咱们这儿马莲滩还有一个叫可兰召，大概是叫“隆福寺”，那是乃莫齐召的属召；还有一个霍寨儿召，那是大召的属召。这些都不是“七大召、八小召”里边的数。还有象朱尔沟等地的召也不少，这都是象样的召。

除“七大召、八小召”而外，还有“七十二个 绵绵召”。


“绵绵召”是些什么召呢？据我估计，就是各个蒙古人聚居的地方，十家八家也好，三家五家也好，都要修一个召。人家越多的地方，召的规模也越大。比如，包头有召梁，那个召不小，祭素齐、毕克齐那些召都不小啊！就象那个把什尔的召也是个象样的。各村子都有。究竟是不是“七十二个”呢？可能比这个少，也可能比这个多。象东村儿博尔合少是个大村子，那个召规模不小。咱们这儿麻花板是个大村子，规模也不小。这个召以后变成学校了。南面公喇嘛是个大村子，那个召也不小。还有什么阿林长板呀、羊盖板呀等等，每一个村子都有召庙。最小最小的就是咱们现在这个黑兰不塔、八太营子，那是三、五人家的村子。我的爱人是那儿的姑姑家，在她姑姑家里边还吃过那召上的“食”※。阳历十月二十五“点灯节”时，还要散饼子，她还吃过人家的那个饼子。西边那个八太营子村越发小，我们还去过那个村村，记得那个小庙庙在“文革”前还在，走在京包路上还能看见那个召，现在可能不见了。所谓“绵绵召”可能就是这些。

我们这儿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召呢？我可以和《阿勒坦汗传》

---

※ 食：以大米为主，加黄油、葡萄干、红白糖、红枣煮成的粥（类似八宝粥），凡参与者皆可分食之。

里面写的那个所谓“建庙多处”※联系起来谈一谈。阿勒坦汗跟明朝打完仗以后，年岁已高，偃武修文了，也皈依了佛教，并且请上桑纳木扎木苏来修大召，念《开光经》。从此，咱们这儿就开始修建召庙。这里边还有一个传说。据说咱们这一带在很早以前，也是珊满教的首领，也要宰杀好多的牲畜。当时，阿勒坦汗有一条腿经常疼。腿疼的时候怎么治呢？就是把马宰死，把肚子豁开，趁热把自己的病腿伸到马肚里边。马肚里的温度很高，就这样烫一烫才能见点儿效。以后他把这些珊满教的恶习也除掉了，变成了佛教。从此以后，他的后代，凡是住在土默川这一带的，只要有几户人家，就要修一个召庙，还有那个麻咪宏圪旦。那上边都刻着“六字真言”。“六字真言”的功绩，《阿勒坦汗传》里已经写到了。“六字真言”的六个字是救苦救难的意思，如六道轮回的灾劫啊，一起都能救渡过来。这些在《阿勒坦汗传》里都有记载，用不着多说了。



接下来，我再简单地谈一谈牛牛营子那个白塔的情况。据说，第四世达赖云登扎木苏是生在阿勒坦汗的孙子这儿，是一个贵族家庭。西藏在过去请佛爷，都要按佛爷的出生地、姓名等来请，而贵族家里边的世子们是最不容易请到的。这对西藏来说，还是个很挠头的事儿。因此，请这个佛爷是费了很大的劲儿的。云登扎木苏的意思就是法海的意思。“法”就是“护法”的那个法，“海”就是有道德有学问的意思。索纳木扎木苏的意思是福海。（）。索纳木扎木苏是三世。二世叫什么，就不清楚了。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一世一世的传略，图书馆里有，是汉文版的，谁写的，我记不清了。

至于牛牛营子那个白塔的建筑情况，我记不清了。据说，云

※“建庙多处”：在苏木沁村有个补子庙，是明万历八年（一五八〇年）修的。该庙门匾（石刻）上镌有五种文字，除蒙、汉、藏外，其余两种不认识。是阿勒坦汗孙腰台吉建。今存内蒙古图书馆。

登扎木苏是在那个地方出生的，在那儿还修了个塔，也可能是仿照宗喀巴出生地的那个西宁塔尔寺修的。塔尔寺就是“塔”的意思。据说，那个地方埋过他的胎包，并且长起一棵檀香树来。这棵树很优美，等长高以后，又怕它折断，还怕牲畜什么的破坏了，所以，上边修了个庙庙。以后，这庙庙就变成个塔，塔上边又修了个宫殿，金顶金瓦。顶上就是用那种“风磨铜”的铜，这些金黄色是烧上去的，不是抹上去的。把那些铁打成片，然后用铆钉铆起来，这就叫金瓦寺。这个金瓦寺可能就是为了纪念云登扎木苏的诞生而修的，也叫西白塔。“文革”以前，我年轻的时候，来回去包头、毕克齐一带，在路上还看得见，也好象是在路南。那个塔不怎么好，是个藏式的塔，不和白塔那塔一样，一层一层还有佛爷。牛牛营子的这个塔还没有舍力图的那个塔大。汉语里边有这样一句：“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浮屠”就是塔。塔里边大概一般是供佛爷的骨灰，也有的供佛象。

注一、四厄鲁特之一的图尔古特。

注二、罕，即蒙文  不是  是一个部落的部落首领。

注三、格斯贵：诵经时的执法喇嘛。

注四、碰了头：即两个山峰互相连了起来，形成一个人字形的帐篷之意。

注五、苏木：不是佐领所管的区，而是庙宇的称谓。

注六、“天命”，是努尔哈赤的年号；“天聪”，是皇太极的年号。

（此文作者系内蒙政协委员，是小召最后一个主持喇嘛，在内蒙图书馆工作，现已八十五岁高龄。）

# 呼和浩特火居道与 城隍庙孙氏家族

孙 明 亮

## (一)

道教是中国固有的宗教。他尊春秋时的思想家李耳（老聃）为教主，以《五千文》即《道德经》为教理基础，以清静无为为宗旨，讲阴阳，尚丹术，修炼精、气、神，以达成仙之目的。又提出道生于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观点。

道教源于巫术，至东汉的张道陵（也称张天师）的“五斗米”道兴，道教才算定型，以后，又分为南北天师道。东汉末年张角的太平道，三国时张鲁的五斗米道，一时成为农民起义的旗帜。唐宋两代，南北天师道、上清、灵宝、净明等派系很多，以后逐渐归并于正一道。王重阳以改革道教在北方创立全真道，至元初，道教正式分为正一和全真两大派。元初的全真道长春真人丘处机曾盛极一时，在北方传播极广。长春真人主张性命兼修，摒弃飞升炼化之术（即炼外丹），不饮酒，不茹荤、劫情欲、不娶妻，澄心静气，返本还真，以达修炼目的。入清之后，尚黄教（黄教喇嘛），抑道教，道教衍化为以龙门为主的小宗派，以北京的白云观和山西的永乐宫为基点，流传各地。

全真道创始于金代，盛于金元之交，是清修派的出家道士，称王重阳为老祖，王重阳的七大弟子，一般称之为北七真。长春真人丘处机是北七真之一。

道教进入土默特约在明末清初，多属龙门弟子，丘处机西游，也没有来过这里，目前可以考见的，大体有：

1、呼和浩特五道庙巷的梁道，来自山西，很可能是永乐宫系的道士；

2、呼和浩特城隍庙和玉皇阁的孙道，信仰道教较早；

3、呼和浩特大召西夹道的杨道，小召前的王道，小西街的解道，来这里比较在后；

4、绥远城的十二家道士，随军进住绥远城；

5、察素齐的李道；

6、毕克齐的边道；

7、呼和浩特南三留儿村的郭道等。

已知梁道来自山西，是龙门弟子。绥远城十二道士是由北京白云观派出，随军来到新城。三留郭道，说法不一。总合说来，也是龙门弟子。城隍庙、玉皇阁孙道，是当地蒙古族信奉道教的，其余没有找到记录，不知从何而来，因为都是龙门弟子，大概不出白云观和永乐宫这两个基点。此外大多为后来的云游道士，来去无定，不在此数内了。

上述这些龙门弟子，除三留村郭道始终保持龙门原样，以全真证道外，其余都娶妻生子，改为火居道了。为什么全真改火居道？恐怕是不能没有原因的。依据情况，可能有以下几种：

1、平时信仰道教，不操道士业而家居修行，后来建庙成为职业道士，自然有了妻子；

2、由于政治上禁止游方道士居留，云游道人娶妻留了下来；

3、也有为了保护其苦心经营的产业而娶妻传子。

## (二)

呼和浩特城隍庙，是孙姓道士，经历祖孙四代，历时百年，卖尽全部家产修建起来的。寺宇庄严，建筑塑画的艺术价值很高。遗憾的是在解放后全部拆毁，实在可惜！

孙道原为毕克齐人，人多户众是一大族，坟地坟堆即有二百多个，早年一部迁往毕克齐南的沟子板申村，先牧后农、居留下来，至今还有二十多户在那里住着。迁到呼和浩特的，共有六户。长门桑布，信道教，二门齐密多尔济，土默特骁骑校，三门忽气必勒克，是笔帖式（机关文书），四门朝克应巴图，出兵阵亡，五门孙教龄，入道住玉皇阁，六门孙永贞当教师，三、四两门无嗣绝户，现存的有长、次、五、六四家，信教业道的只有长、五两门。他们原先不姓孙，长门桑布业道后改为孙布，于是才姓孙。不入道的还不姓孙，到了民国初年新建户口时才全族都改姓为孙的。

孙氏什么时候信仰道教的？没有传言记载，已难考证。记得在1980年摊祖坟时，有些族人想转迁他处，只挖了四、五个坟堆，就有一具身穿道装的棺木，这就说明孙家迁往呼和浩特之前在毕克齐就有信奉道教的人了。

孙道是全真道龙门弟子，业道之后，历世都依龙门百字辈排辈，即来、复、本、合、教、永、元、明。来、复两世由毕克齐迁到呼和浩特，系在家信道。从复字辈起改为职业道士即孙布（桑布改）、孙本元、孙合贞、孙教龄、孙永福、孙元亨，孙明亮※七辈就有二百多年了。

孙道先人奉命到呼和浩特北门外羊岗南坡修建城隍庙，在移

• 孙明亮，不是职业道徒，以教学为主（编者加注）。

住呼和浩特时，即将毕克齐牧畜家业卖掉一部，正式走上职业道士的路，原以为积善寻福，修得未来。恰恰相反，走进了灾难深渊，让以后几代人在坎坷泥泞的路上挣扎。城隍兴建工程开始不久，又遇战乱，工人逃散，工程已难进行，当时的人，生命没一点保障，又不能离开工地他去，顶着性命来度时光，以后战乱虽过，建料耗散，直到康熙年间重修青城时，孙本元已年过八十，不得不再率其子孙合真继续未完工程，延至第四代人孙教龄接办城隍庙工程时，已把毕克齐财产全部变卖一光，都投进城隍庙兴建事业。孙氏也进入艰苦生活的下坡路，一直煎熬到嘉庆初年，城隍庙才算初具寺庙规模，耸立在羊岗南坡上。

城隍庙具有明代特征，是庄严雄伟的庙宇。古人传说，城隍是守护城池，保佑人民的神灵；张说、韩愈、杜牧不是都写过祭城隍的名文吗！后世把城隍又封为王、公、侯等爵位。呼和浩特城隍是灵应侯爵。

### （三）

城隍庙建有正殿十四间，内塑城隍坐像和城隍出马像，塑站殿的四人，正殿东西，各有宫门一座通寝宫。寝宫：北屋三间，东西配房各两间，是一住宅布局。正殿前，东西为十殿阎君各三间，再前有东西曹官殿各两间，下为钟鼓楼左右分立，中前为牌楼，雕绘极细，结构精巧，由上十三层，下七层拱斗托顶，四柱就地支架，上大下小，临风似有摆动迹象，铁马叮当。但在风雨中颠簸了二百来年，没有出过一些细小事故，结构之巧是呼和浩特建筑中的一个特点。牌楼左右各有看台一座，西南方有孤魂殿一间，东西各有马殿间半，中间戏台连大门共九间，戏台两侧各有山门一座，门外东西南三面，设有栅栏，对门之南有照壁一，东西长二丈五尺，照壁之南有东西河流一，沿河东南为呼和浩特十

景之一的“十字流河水不混”的古迹，庙院东墙外为孙道住宅，内正房五间，东西配房各三间。街门一座。

呼和浩特城隍庙，是孙道卖尽家产，经数世艰苦，受过战火洗礼，苦心经营建造起来的。她是青城发展的见证；也是呼和浩特的艺术宝库；又是当地唯一的蒙古族信仰道教的寺庙。民国初年的孙永福，由于生活穷困而早逝。家留老母寡妻幼子。当时其子孙元亨只二岁，饱经兵匪战乱的岁月，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又曾有两次霸占城隍庙的举动。历经调查，一致认为城隍庙是孙道家传庙产。在地名叫羊岗时，这里没有住户就有城隍庙和孙道。地名叫十间房时，城隍庙孙道就是十间房之一，在庙里所有碑文也都有孙道世代相传的记载。基于上述证明，城隍庙确实是孙道家传寺庙。迫于事理，才作罢论。遗憾的是在党的领导下，在民族政策及宗教政策保护下，却以不能再过迷信的住庙生活，要发展生产为理由，强把城隍庙拆毁，把神象砸烂，彻底破坏。建庙的孙道第七代人，也被迫离开祖传住宅；孙元亨以忧闷于五七年秋去世。一座具有历史意义、艺术价值很高的城隍庙，就这样夷为平地了。

责任编辑：云文翰

孙明亮：呼市土默特学校老园丁协会

主席，呼市政协委员。



翫 輓 瘦 賍

上联

鑿 擲 駢 趨

瀾 瀾 豔 簫

下联

彩 檣 犛 儲

儷 酒 濼 桃

# 道家对联一则解

边福全供稿

横批：原稿解为：“天 官 赐 福”

上联： 锤离点石把扇摇      国老骑驴走赵桥  
      洞宾背剑清风客      国舅瑶池品玉箫

下联： 彩和手执云扬板      拐李先生得道高  
      仙姑奉敬长生酒      湘子花篮献蟠桃

按：此“对联”是土左旗毕克旗镇内道士——边福全，家中所珍藏历代道家师徒代代相传的一则对联。

一、全联计十六个“字”、加横批共二十个字。

二、这十六个字，是由偏旁编插组合而成。

三、全联以“八洞神仙”的具体特点，组合成一首类似《七律》的古诗。除对仗、格律欠工外，韵脚不差。（见所附原诗）。确切地是“七古”。

四、横批：原释为：“天官赐福”费解。愿识者待解。

编者

1986.11.18.

# 满泰小传

程景华

满泰，字子舒，蒙古族，内蒙古土默特旗人。一八八三年出生于鄂尔格逊村。幼年时期在本村私塾读书十年，勤奋好学，通晓四书五经。一九〇七年，山西同盟会派遣王建屏、李德懋等人，赴包头、萨县一带，联络塞外有志之士搞革命。李德懋系大同人，精通拳术，住在鄂尔格逊村，以收徒教拳为掩护，秘密从事革命活动。他与该村塾师富日新先生结为盟友，经富先生推荐，李收满泰为徒，教以武功。这个独具慧眼的教师，“相中”了满泰，断言其为“可造之材”，重点培养，并加强了武术道德教育，明确指出：学武术之目的，“是练筋骨，扶正义，斗邪恶”。李还将同盟会印行的刊物介绍给满泰，由此他接受了新思想。

满泰从师学武以后，勤学苦练，每天五更起身，头顶星斗，一直练到旭日东升。经过几年时间，对轻重拳和少林派的长拳，形意、太极、八卦诸门都已通晓，思想境界也大为开阔，最先被吸收为同盟会员。其后云亨（字嘉会，蒙古族，土默特旗水涧沟人）、安祥（字子政，蒙古族，土默特旗善岱村人）、经权（字子衡，蒙古族，土默特旗善岱村人）等也陆续加入同盟会。这些蒙古族健儿在辛亥革命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九一一年，阎锡山率革命军进占了包头城以后，绥远的坤轴将军调集了谭涌发的部队和满洲常备队的炮兵，赶到萨县城堵防，当时满泰见县城内来了清朝的军队，连夜赶奔包头给革命军

报了信，使阎锡山的部队迅速攻占了县城。

满泰在任萨拉齐蒙古谘议员时，和云亨、安祥、经权等同盟会员联合一起，对抗守旧派，成为当时蒙古族青年进步力量的核心。

满泰敢于抨击时弊，敢于同害民的军阀、政客作斗争。一九一五年间，曾与当时任萨县第五区地方团队的领导人安祥起兵反对蒋雁行都统在绥远大种鸦片的反动政策，得到地方绅士的协助，向北京政府告倒了这个北洋军阀。

一九一六年以后，满泰在萨拉齐任萨——武两厅管带（警备队长）期间，目睹军阀、政客横行，广种鸦片，聚敛财物，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一面进行舆论抨击，一面提出了“绥人治绥”的倡议。与云亨、安祥、刘会文、李雨山一起，发起“五英雄”起义，争取摆脱军阀的统治。满泰等率领警备队、矿巡队和各区团队向东进攻，直捣武川县境，与军阀队伍奋战，因弹药不足，陷于敌人包围。结果，刘会文受伤，李雨山阵亡，满泰逃往五当召，充当喇嘛。

后来他怀着强烈的革命愿望，投奔绥西清乡司令玉禄部任副职，保佑乡里。不久，升任骑兵第一团（即老一团）上校团长。玉禄率队伍往河西东胜剿除股匪刘喇嘛、苏雨生伙众，在杨三虎圪卜阵亡。满泰深为痛悼，他厉兵秣马，为继玉禄未竟之志，率老一团歼灭巨匪，屡建奇功。以后，满泰升任骑兵第一旅少将旅长兼剿匪司令，又晋级为骑兵第三师中将师长，兼三十一军副军长及绥西镇守使。他爱乡爱国，志在守土安民，素不参与各方内战。

当奉系军阀汲金纯任绥远都统时，委任他为绥远护理都统。不久，汲以赴前方剿匪为名，向东撤退了。附近的杂牌军金宝山等乘机闯入归绥（今呼市），纵兵抢劫扰害地方，接着王英也率袁占鳌、杨守成两个旅从包头乘火车赶到省城，一时新旧城秩序

大乱，满泰挺身而出，立令各部军队撤出归绥，安定了省政。接着晋系军阀高震带兵赶到，接了都统，他重返包头。一九二八年解甲归田后，被挽留为上默特旗总管。以往历任总管的工资是每月五百银元，办公费也是每月五百元；他接任伊始，便说：“从现在开始，把我的工资和办公费都缩减一半，各为二百五十元。其他官员一律不减。”这样减轻了民众的负担。

一九三一年，晋系军阀阎锡山利用他在蒙古族人民中的威望，委任他为乌、伊两盟十三旗蒙边司令及绥西绥北两路护路司令，他综理军政，事必躬行，劳累过度，身体衰弱，于一九三四年夏，积病逝世。

满泰一生以热爱桑梓为主旨，是上默特旗蒙古族的一位深明大义的著名人物。

（一九八三年六月再稿）

全文转载《内蒙古文史资料》第18辑文。

政协土左旗文史办

# 巾幗奇人白大姐

张 尔 杰

美丽的土默川，不仅山河美，人物更美——美在心灵，美在行动，美在忘我和不吃老本！巾幗奇人白大姐就是其中的一位。

白大姐即白秀峰，乳名蝉儿女。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岁月里，因她孤胆斗敌，贡献奇特，故被人们尊称为大姐而不名。

## 不幸的遭遇

白大姐于一九〇八年出生在土默特左旗大岱村一家贫苦的蒙古族家里。她从小干农活，放牛羊，操家务，尝够了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的苦。成人后，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保同河村蒙古族李银柱结为夫妻。

李银柱是老一团的班长，在他们婚后，该团官兵经常来往。

白大姐经过和李银柱生活、相处，通过和老一团官兵的来往、接触，逐渐认识到老一团这支蒙古族武装不仅歼灭股匪、除暴安民，而且还掩护那些敢于反对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的造反分子。她打心眼里喜欢这支队伍的官兵，从而更爱自己的丈夫李银柱。从这时起，白大姐逐步养成了慷慨好义、东施西舍的习惯。她为了让丈夫进一步当好班长，主动地当起了家务总理。无论养鸡、喂猪、女红、耕作，还是内政、外交，她都无条件地承包下

来，真不愧是李银柱的贤内助。

白大姐和所有勤劳善良的普通家庭妇女一样，憧憬着儿孙满堂，决心创造一个不缺穿吃的幸福家庭。她自己不生育，就抱养了一个男孩，起名俊俊。就在白大姐奋发图强的时候，怎奈昊天不仁，造物无情，李银柱突然因病去世，白大姐成了少年寡妇！

当时的社会，寡妇是受人歧视的。土默特旗蒙古族的传统是少年寡妇有“老女归宗”陋俗，白大姐只能回到大岱村的娘家居住。

## 逼上大青山

白大姐“老女归宗”以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悲惨际遇是可想而知的，但她所关心并为之而斗争的却不是因为自己衣、食、住、行所引起的丝恩发怨，而是有关民族尊严的土地所有权的大是大非。

原来，大岱村西北有一块百十顷的碱滩地，地权虽属土默特旗公有和大岱村蒙古人私有，但因不能耕种，便自然地成了周村群众放牧的牧场。人们习惯称之为“大西滩”。一九三八年夏季，暴雨成灾，洪水淹没了“大西滩”。水涸之后，“大西滩”被淤上四五寸厚的黑土层，一下变为最理想的耕作土壤，真可谓沧海变桑田。面对这块膏腴之地，蒙古族人民无不欢喜万分。就在这时，大岱村的大地主于家、田家和刘会元圈子的刘家，都跳出来指认地段。说什么祖宗先人曾在这里置有土地多少多少顷，并有地约可凭等等。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伪土默特旗公署，根本不顾蒙古民族的利益，强说“大西滩”都是旗的公有地……

面对现实，白大姐挺身而出。她联合大岱村蒙古族赵明登、那那村蒙古族鱼鱼儿女子，据理力争。他们向伪旗政府兴讼上诉。第二年春播时，于、田、刘家分别威胁白大姐，赵明登

说：“这地是我们的，你们种上也不行！”果然，当庄稼成熟时，刘家派人抢收。赵明登前去阻拦，被打倒在地。其妻不服，也被剥去裤子打伤在地。面对这些横行霸道的大地主，白大姐怒火难遏，义不低头。她积极串连蒙古族群众，决心和这些恶霸分子斗争到底。并表示，如斗不出个谁是谁非来，誓不罢休！

白大姐的一言一行，那些恶霸分子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们在理屈词穷的情况下，只好仗势欺人，以钱压人——标出赏价：“不论是谁，只要打死白蝉儿女，奖大烟板子五块（每块一百两）。”在这种情况下，白大姐被逼上了大青山，参加了八路军。至于“大西滩”的土地斗争，直至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经过萨拉齐县长于维欧和土默特旗总管荣祥协商才得以平息。结果是一份为旗公有地；一份为蒙古人私有地；一份为学田地（三者均不等）。

## 战斗在土默川

白大姐自参加了革命，在奎壁、杨植霖的直接领导下，开展抗日斗争。经过革命的洗礼，她思想觉悟不断提高，革命意志更加坚强了。

一九四二年，白大姐被调到绥蒙政府（在山西朔县）工作。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以她为首的地下工作队又活动在土默川上，为解放全中国艰苦地工作。在解放大军围攻绥包的时候，他们积极动员群众捐款捐粮，支援前线。土默川的群众在他们的动员下，捐了很多钱、粮。如仅从南漳村冀声杰那里，一次就把学田地的储存糜米十三石捐献出来。

一九四六年，白大姐把保同河村作为根据地，并选择该村大地主刘琨的场房子作为联络站。她安排云飞龙的父亲住在场房里，给“看管”场面；云的弟弟给刘琨“放马”。每过一段时



间，他们把各方面的情报由一位“似呆非呆”的年轻人向绥蒙政府汇报。

一九四七年，白大姐奉命以供给部主任的职称带队打游击，战斗在土默川。她的夫弟李德全、夫侄李文奎也秘密协助她工作。他们征发给养、搜集情报、调查各村的民团枪支。他们不仅动员了大量的粮食、肉类，而且还从祝乐沁、满水井、淖尔上、合同营子等村民团内搞出大枪五十多支。

白大姐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严峻任务，从不管刮风下雨、严寒酷暑。她常常独自活动在敌人的心脏地带。有时为了隐蔽，往往行迹在麻田谷地或荒野乱坟之中。在那战火纷飞、斗争激烈、自觉革命的日日夜夜里，白大姐处处关心她所领导的战友。哪怕是吃饭，她也往往先人后己。自己总是推推辞辞，不是说头晕肚子疼暂不想吃，就是说爱吃剩饭。惟恐战友们吃不饱或吃不好。然而，白大姐作为一个女同志，她也和千千万万个女同志一样，有妇女特有的生理现象，但在那艰苦的革命岁月里，有谁能给她一个“例假”？当然，又有谁能不说她是一位吃苦耐劳、忘我为国的奇女子？

## 巾 幗 奇 人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土默川上盛传白大姐“神机妙算，来去无踪；座骑驰骋，四蹄生风；双手打枪，百发百中。”她常常穿插迂回于日寇的岗哨碉堡之间，纵横出没在国民党部队的枪林弹雨之中。广大蒙汉群众虽对她敬仰赞叹不已，但又无法见到这位巾幗奇人。

谁说白大姐不是位神奇的人呢？那还是她参加革命不久，日寇对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封锁得很严紧，根据地粮食异常困难。群众支援的粮食又无法运到山里。就在这种情况下，白大姐受组织

委托，独自下山了。她从南平川满载了一车粮，自己扮成一个普通家庭妇女手提包袱坐在车上。以到山后打换为名，粮车向根据地运行。每当路过敌人的封锁线，白大姐总把手伸在包袱里扣紧大肚匣子的扳机，随时准备应付意外情况的发生。就这样，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从敌人的眼前“不慌不忙”地把粮运到根据地。

解放战争时期。有一天，白大姐正骑一头小毛驴活动在南平川，不巧被国民党地方团队发觉。敌人随后追来。白大姐发现尾追的敌人来势汹汹，她就近溜进了白庙子村云章元院。进院后，焦急地对章元说：“快把毛驴拉到外边去，以免招来敌人！”云章元领会了她的意思，二话没说，接过缰绳拉着毛驴即走。当云章元把毛驴隐蔽后返回时，只见敌人正从他家返出。他毛骨悚然，正为白大姐的安全惊恐万状的时候，忽见白大姐神态自若地从家里出来对后边的敌人说：“老总走好！”云章元倒吸了口凉气，这时才把惊飞的魂又附了体。

原来，白大姐见云章元拉走了毛驴，自己进了家。进家后，她见章元的妻子不在，炕上却放着半截未纳完的鞋底。就在这个时候，已听到敌人吆五喝六地进村了。白大姐急中生智，顺手揪了块毛巾罩在头上，“逍遥自在”地坐在炕头上纳起鞋底来。敌人进来里里外外搜寻了半天，哪有骑驴的女八路？他们又见白大姐应答如流，招待得体，只好灰溜溜地返出去找骑驴的女八路去了。

又有一次，白大姐真让国民党地方团队抓获了。她面对敌人的屠刀，沉着冷静，首先胸有成竹地摆出一副盛气凌人、满不在乎的架势。深夜，当敌人刚刚提出“白大姐”三个字审讯她的时候，白大姐即装出副怒不可遏的样子大骂：“瞎了狗眼的东西！什么白大姐、黑大姐？你不认你姑奶奶，可认你姑爷爷李耀清不？”她边骂边要上去打那个审讯的敌人时，却被另一个敌人拉住道：

“噢！原来您是李太太。误会、误会！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看样子，这家伙是个当官的。他向白大姐献媚后，即指责审讯的敌人：“你们真是饭桶，还不给李太太陪个不是，愣什么？”审讯的敌人一听抓来的人是国民党地方要员李耀清的太太，早吓得魂飞魄散，原来的威风一扫而光。他又见上司的指责，活象只丧家犬。除了陪笑脸、认不是、求宽恕而外，再什么也不提了。

白大姐见时机已到，即给敌人可下的台阶。她“不耐烦”地说：“好了，好了，以后办事睁开点眼就是了。”旁边的上司见机行事，呵斥道：“还不快把李太太送回去，愣什么？”就这样，白大姐大摇大摆地让几个大兵送回了原处、脱了险。

白大姐虽只抱养了一个儿子，但从不溺爱，要求极严。当儿子结婚以后，她回去赠给儿子、儿媳一份“厚礼”。只见这份“厚礼”长七八寸、宽四五寸、厚寸许，外面用布包得严严实实。儿子儿媳心想：“这是什么？是大烟板子？是金银？是……”当白大姐离去后，小两口打开一看，原来是块青砖。他们夫妇迷惑不解。事后，慢慢地才领悟到：“额吉之所以赠我们青色的砖，不仅要求下一代作有用的人材，而且要求青出于蓝胜于蓝！”

白大姐赠送儿子、儿媳这份“厚礼”，难道不比金钱更珍贵吗？

## “只有香如故”

在全国即将解放的时候，活动在土默川的白大姐的一大笔活动经费不幸被一个皮毛、料面贩子拐骗走，自己还差一点丧命。为此，她又羞又气，想了好多。特别是组织对自己的关怀和战友们的牺牲，她想得更多：那是一九四八年九、十月间，自己随部队撤到丰镇。突然旧病加剧，全身浮肿，不能行动。虽经多方治

疗，病情仍在恶化。这时，日夜繁忙、身负重任的杨植霖主席不仅亲自来照料自己，并告示：“不管是谁，只要能治好白秀峰的病，就奖给现洋三百块。”后经人介绍，说集宁城有一位老中医能治此病，杨植霖主席又找来这位中医，并亲自领到床前为自己诊断、治疗。自己的第二次生命还不是组织上给的？

一九四九年夏，奉绥蒙办事处指示，在宝塔附近的郭勒作村，派李德全和荣才才与潜伏在国民党骑兵十三旅的李有明接头，意欲策动该旅起义。不料事机失密，荣才才竟在临解放时被敌人用电椅子杀害了……

回忆一桩桩一件件往事，白大姐感到自己的受骗没脸向组织交待，更对不起为革命牺牲的战友。“九·一九”绥远和平解放后，她销声匿迹地隐退了。

十年浩劫期间，白大姐受到无情的迫害。面对残酷的现实，她跑了。她从武川跑到托县，又从托县跑到和林，凡是她从打游击以后接触过的人，都被打成“内人党”，她就是他们的总领导——“内人党”党魁。往哪儿跑呢？只好返回武川，束手待擒。

白大姐被扣捕了。在武川城里游斗时，她已被折磨得不能起立行动了，是背着黑牌子，爬行着挨整的。

造反派把白大姐囚寄在一位五保老太太家里，三天后的深夜又提走了。自此，人们再没有见到她。白大姐这才真的销声匿迹了！放翁有词云：“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怀念巾帼奇人白大姐的广大群众，也只好以此来宽慰自己了。

按：本文资料为王板头老伴、李德全、李文奎、冀声杰、张希孟、王秉义、李存龙、丁金全等人提供，除向各位致以衷心的感谢外，因限于写作水平，文中错误当必甚多，敬希知情者补正为盼。

（责任编辑 王奎元）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改定

# 记绥远在辛亥革命时期的

## 刘会文

长 城

刘会文名巨章，以字行。世居萨拉齐大岱村（今我旗大岱乡大岱村）。光绪十年生（一八八五年）。幼时在村塾攻读四书五经，后毕业于归绥中学堂甲班。长得魁梧奇伟，浓眉、大眼、通鼻、高颧、厚唇。多须髯，美如墨，飘拂过胸，故乡人誉称刘胡子。

光绪末年，在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里，有清末优贡（山西崞县铜川西坡头村人）续桐溪者，奉山西支部之命，派同志王建平、王建基、郭鸿霖、弓富魁、徐文翰、李德懋等二十余人，分别潜赴绥远丰镇、归绥、萨县、包头一带，进行秘密活动，结识英才志士，储备起义力量。刘会文即因归绥中学堂校长王定圻之介绍，加入同盟会，并与侯斌臣（字宪章）、安祥（字子祯）、满泰（字子舒）诸人，结为异姓兄弟，互策互励，誓为“恢复中华”共勉。

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阴历十二月二十六日，同盟会员青帮大龙头卢占魁、率部攻克萨拉齐县城，以“天下兵马塞北都督飞虎上将军”衔，布告安民，使刘会文赞叹不已。因此，有必要夹叙卢占魁才能写清刘会文。

民国五年（一九一六）阴历正月初四，卢部被迫撤出萨县，再陷托克托县城，村间受害，乡镇骚动。绥远都统潘矩楹查悉卢氏此举，为王定圻所操纵，遂即将王杀害。王字屏章，萨县包头镇（现包头市）刘宝窑子村人，据《绥远通志稿》卷九一载，宣统二年“任革命党西北方总指挥”。公开身分是归绥中学堂校长，他把学堂变成发展党员、培养干部的大本营。曾以“京议员”身份反对袁世凯称帝，在投票时故意把袁世凯写成“袁世凯”。此次促使卢占魁倡乱，也是为了声讨洪宪，所以被害。

刘会文亦于是年担任萨拉齐县教育科长，意图借此职务，掌握该县警察，作为发难资本。后因武川县知事王朝烈兼任武川警备司令，需人赞助，遂又趁机潜入，当上副官。旋以策动王部“叛乱”谋泯，刘即径赴上海去找孙中山，请求支持直接在绥远发动武装革命。孙中山对绥远幅员多大，人口若干，社会情况，垂询甚详，即以“绥远武装革命尚不成熟”将他婉谢。

因此，刘会文负气离沪，游荡于江（江苏）、浙（浙江）、湘（湖南）、鄂（湖北）、皖（安徽）、豫（河南）、直隶诸省，广交各地英雄，结识革命党人，目及全国，眼界大开，进一步激发了打倒军阀，救民于水火，实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雄心壮志。

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阴历十月，天津人蒋雁行继潘矩楹为绥远特别区都统，十一月间收抚卢占魁部为绥远骑兵旅，任卢为旅长，驻防河套境内。民国六年初（一九一七年），蔡成勋接任都统，以卢不遵命令，图谋不轨为由，调动李际春、沈广文、高在田、靳永泰等四个团及李润青等四个营兵力，兴师动众，步、骑、炮配合，企图解决卢占魁，以根除其隐患。卢也分兵三路，布防于乌不浪口、狼山口和宴安和桥，准备迎击。九月廿日晚接火，激战至廿三日晚，卢部伤亡惨重，即令其第三团团团长喜顺老四段俊英（字希雄，山西大同人，外号二长命）从西山咀渡黄河挺进伊盟境内待命。自率一团烂头老二张得义（山西崞县石封

村人)部和二团格尔计老五耀威(蒙族)部,经高台梁、武川、兴和,由绥东转到绥南,从清水河县渡黄河,到达伊盟与段俊英会师。

与此同时,刘会文为配合卢占魁的行动,与武川警察管带(营长)满泰,萨县警备三路队长李雨山,萨县五区团总安祥会议,起兵讨蔡,要“作一番惊天动地大事业”(刘语)。他往返奔走,联络、游说于萨县第一、二、三、四区各团总之间,决定同时举事,可以聚集千骑,意欲趁虚会攻归绥城,推翻蔡成勋。詎意各区团总届期爽约,仅集满泰、安祥、李雨山等所率二百余人,未能按原计划进行,即改拟从准格尔旗过黄河,与段俊英会合,但准旗也轻食前言,不许假道出入,于是只好把部队拉到大青山,拟先占据武川县城再图策动举事。此时,蔡成勋已派出马德润营跟踪追击,遂被包围于黑牛沟。

黑牛沟的攻守战,打得相当激烈,从巳时一直打到未末,安祥腿部负伤,起义军弹尽援绝,刘会文促安祥突围。安祥喟叹道:“您们走吧,我无面目见家乡父老了!”马德润也在墙外高喊:“安团总,你是好样的,你出来,我保你原官归职”。安祥不屈,白杀殉义。

突围时,李雨山不幸牺牲,刘会文大呼猛冲,一颗子弹从他的右颊穿口而出,虽未伤及牙齿,但已挂了重彩,而在一位素不相识的起义兵士的照料下突围后,将他搀扶背负,辗转到达沙尔沁村,隐藏在一家贫苦人家里养伤。护送到这个村家,正是这位兵士的舅父家,其舅父系兽医,兼通医人外伤。舅甥二人为刘洗伤换药直到伤愈。这位士兵,就是后来当上刘部团长的马骥。而满泰只身跑到五当召,投奔他的叔父林丹片尔大喇嘛,化装成小喇嘛,去青海唐古特召躲避。

刘会文备受马骥及其舅父精心服侍治疗的恩遇,因而在枪伤痊愈,探悉卢占魁所部,经清水河已渡黄河到达伊盟的消息后,

遂偕骥去投卢占魁。此时，由于在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八月，国会议员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公推孙中山为陆海军大元帅，组织护法军，与北京皖系军阀段琪瑞政府展开斗争。马凌甫、焦子敬等奉孙命北上，陕人纷纷响应，成立了陕西靖国军，并邀于右任为总司令，编卢占魁部为靖国军第六路，任卢为司令，弓富魁为副司令，刘会文正好刚到，被任为参谋主任。

从此，刘佐卢、弓，出兵南下，会师三原，然后转战于武功、扶风、岐山、郿屋、雒南、韩城、郃阳各地，直下陇县，拟攻西安。刘会文为卢占魁部此次长征出谋划策、决疑定计所作的贡献是不难想见的。同时也为六路军能够配合陕西靖国军一路郭坚部和滇军靖国军第一军叶荃部，与段琪瑞政府任命之以许兰州为总司令的军阀部队，相持于吉杏镇打下了基础。

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十二月，陕西靖国军解体，卢占魁率部随叶荃入滇，弓富魁去辅胡景翼。刘会文以胡部参议名义返回绥远，策动地方武装。民国九年阴历夏季，刘会文到达家乡，他利用同乡、同学、同志及帮会关系，积极进行秘密活动，企图在绥远能够为革命党建立一支由他自己掌握的武装力量，以与北洋军阀相抗衡。

卢占魁率部随叶荃入滇后，改编为滇军骑兵第八旅，卢被任为旅长，因协助叶荃改革滇政，与滇督唐继尧部激战于潞江一带，被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趁虚占领昆明，推翻了唐继尧，自任都督，坐收渔利。又设计解除了叶、卢所部武装，迫使二人偕赴香港。卢占魁即持叶荃亲笔书信，经越南到上海，晋谒孙中山。卢向孙行三叩九拜礼，使孙中山大惊失色，当面批评了他这位党员的封建落后思想，内心颇觉不快。但因叶函对卢推介甚力，故又对卢多方抚慰。此时孙中山正制定联张（张作霖）反直计划，卢即奉孙命北上，绕道大连，进入东北，通过张景惠见到张作霖。张作霖正欲扩大势力范围，鞭及绥远，遂任卢占魁为东北军



骑兵第三旅旅长，令他即返绥远，收容旧部。卢占魁回到固阳，招抚小杨五（杨万祯）和赵半吊子（赵青山）不果，转返察哈尔境内，仅得何全孝（绥远中学堂毕业生）七八百人，流窜于凉城县内。从此，卢逐步走上流寇的歧途，在绥境为患的劣迹当不容掩盖，但因此而抹煞其早期的革命活动，也是不公正的。

此时，刘会文因与萨县保卫团团总侯斌臣有同学兼契友的关系，促侯当机立断，率部举事，以响应孙中山的联张反直。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三月，侯斌臣把保卫团拉到兴和公喇嘛，拟与凉城境内的卢占魁联合，会攻归绥城。旋因侯斌臣轻信绥远都统马福祥所许的诺言，被诳到归绥城南郊杀害。致使刘会文在绥远不能立足，跑到北京躲藏。侯字宪章，萨县只几梁村（现属土左旗）人，归绥中学堂学生，为人短小精干，其貌不扬，却有孤胆，当马福祥邀他亲到归绥面商时，不听劝阻，只身赴约，致被诬杀。

当时北京军阀政权已落入直系曹锟之手。马福祥为了扩大财政收入，让绥远广种鸦片，得利不少。曹锟向马福祥索贿，马因善财难舍，仅给进贡了三万元，曹锟嫌少，心怀愤懑。刘会文息影北京，获悉此一信息后，即联合绥远旅京学生，上书曹锟，控告马福祥在绥远种烟毒民，苛政自肥等劣政。马福祥得知这一市场变化，深恐曹锟借助学生舆论进行报复，除派人送给每一学生学用补助费一百元外，并召刘会文回到绥远，委以绥远警备第三路司令职务、藉以堵口息事。

刘会文的警备第三路（后改为第一路）起初仅有九棚步队和四棚马队，共约二百多人。当时苏雨生、赵有禄等匪伙共有两千余人，在归、萨、托、和境内奸淫抢掠，民不聊生，匪势十分猖獗。刘率所部剿匪安民，绥靖地方，起到很大作用，为乡人所称道。在此期间，也发展壮大了自己的部队。民国十四至十六年间（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间），曾调驻后套（现巴盟），一九二六

年九月十七日，冯玉祥五原誓师，于右任代表国民党授冯锦旗一面，刘会文以警备分司令身份应邀出席大会。会后，刘会文回到察素齐天恒粮店驻所，冯派邓宝珊到家约他率部南下，刘以“我留在本地比率部南下对革命有利”谢绝。他在后套，负担剿匪任务，协同满泰、玉禄各部，对流窜于后套、固阳、伊盟各地的匪伙如刘喇嘛、赵半吊子、陈得胜等，给予严重打击。例如民国十五年春，匪首大辫四子五百余人，攻陷隆兴昌，大肆抢掠，损失达百万之巨，驻五原刘会文正当东调，启行闻报，回师往救，兼程并进，掩击匪众，毙匪多人，夺获枪马及被掠财物很多，从此匪每闻刘名丧胆远遁。民国十六年刘会文与奉军马占山会合剿匪，在今呼包一线痛歼赵半吊、苏八音等匪伙约千人。自此绥包东路通行无阻。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奉军人关，张作霖扩编警备第一路为警备第一师，任刘会文为中将师长，并指挥警备第二师陈玉甲部。

刘会文就任警备师长后，精神振奋，雄心勃勃，他深感于过去靠“哥老会”乌合之众，难成大事，乃聘请萨县人刘盛五（抗战时任马占山挺进军骑二旅长）为参谋长，陈志仁（解放后任内蒙文史馆副馆长）为秘书长，马可一（后任东胜县长）为军需处长，李秉方为军医处长，以及天镇人苗国华（解放后任内蒙人委参事室参事）为副官处长。这些人又都是大学生，也想辅佐刘会文创造局面。借此壮大自己的力量，配合北伐战争，以实现其“绥人治绥”的愿望。他曾在察素齐车站广场集合全师官兵训话时说：“我们要聚集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作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第一团团团长乔静植（名泉清、清水河县人，归绥中学堂学生）。第二团团团长马骥（萨县沙尔沁村人，依刘起家）。第三团团团长戴海源（字茂山，萨县戴家圪卜人，土匪出身）。

戴海源乳名戴鱼儿，原系第二十军军长，绥西镇守使满泰收编的队长，后率部哗变，被刘会文招抚为团长。因此，满泰恨他

的刘义弟刚愎骄横，妄自尊大，不讲义气。刘会文也嫌他的满泰盟兄老奸巨猾，暮气沉重，丧失大志。二人言和意不和，互相拆台。

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阴历正月十一日夜，马骥偶得一梦，梦见自己驾着一叶小舟，在陆地上任意划行，毫无阻碍，其速如飞。他让书记官张巨礼（字静安）为他圆梦。张说：“你如果讲迷信的话，这梦凶多吉少，因为陆地行船，不合情理，就是倒行逆施。”马骥听了怫然道：“什么不合情理！非常的人才会有非常的事。”盖因马在驻地朝号村与田宝宝之妻姘得如胶似漆，不理军政，官兵多有怨言，故疑张语是借梦讽谏，所以发怒。不过这总归是迷信，姑录之以存其实。

绥远民俗，每年正月十四至十六日要闹元宵，龙灯、旱船、秧歌、高跷以及鼓吹、焰火等杂耍，在三官庙前表演，俗称“红火”。民国十七年正月十五晚，驻在武川（可镇）县城的乔泉清团的士兵，因看“红火”与当地十大区区兵，由口角发展到打架以致开枪。十大区的兵多，就收缴了乔团士兵的四五支步枪。刘会文据报发怒，召集各处长商议，决定派乔泉清亲去武川索取枪支。但乔走后，刘又虑乔不济，续令马骥率部继往。乔泉清于正月三十日夜由武川返回归绥（现呼市），向刘作了汇报——经与武川十大区负责人面商，已得到圆满解决，被缴枪支如数退还并致歉意。马骥率部队二百余骑，于二月初一早由驻地朝号村出发，奔向武川，中途接到师部传骑送达刘会文的指令：“着该团长停止待命。”马骥却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继续前进！”当晚宿营于贾家野马兔村。

次日（二月初二）午前，部队进抵可镇城郊，张巨礼向马骥提议：“我在城里有朋友，我先进城见他们，如能协商解决，岂不是好。”马骥瞋目道：“悄悄价吧，没有闯天的胆子，哪有闯天的事业？”“冲锋！”

马骥所部，本是刘会文几年来打土匪的劲旅，一声令下，无不边打边冲，势如风驰电掣，刹那间便攻入城中，守卫城垣的十大区士兵，自觉不是对手，慌忙弃城远扬。二百余骑涌进城里，大肆抢掠，马骥止喝不住，放声大哭，忙问：“静安！静安！你看怎么办？”张说：“赶快吹紧急集合号！”

部队集合起来以后，马骥令把一切什物就地放下，所有士兵马上驮的，手里拿的，背上背的，堆在街上叫失主认领，但是揣在怀里和压在鞍鞅下面的贵重东西，好不容易刁到手里，却没有交出来。马骥到归绥向刘会文复命，刘也不责其违令进军。这就是马骥刁可镇的全部经过。

马骥刁了可镇（武川）以后，刘会文部下的几位处长，认为如此败坏军纪，何异土匪，纷纷建议刘会文“自己的狗疯自己打”。劝他主动惩办马骥。武川县西部士绅梁永芳（字兰斋），东部士绅石良筠（字子璋）与刘会文都有旧交，以武川县代表身份，向刘控诉马骥促他平息民愤，但刘会文连好气也没有给。石梁二人一怒之下，就正式向绥远奉军都督郭希鹏上告，恳求为民作主，依法查处。奈因郭都统为人稀松（当时绥远人称郭希鹏为郭稀松），刘会文不把他放在眼里，曾对幕僚们说：“立起一只鞋卜子，他也得吓一跳。”所以除遵令将驻在武川的队伍都撤回归萨境内，以避免再起摩擦外，就连郭希鹏希望的“你若有困难，可把他（马骥）交府，我替你处理”的话也不听，致使石梁二人怒上加怒，无法下台，就让正在北京上大学的武川县人于存灏出头露面。于字静漪，写作颇佳，他缮就一份呈词，以学生身份，径到顺城王府的大帅府告状。竟因此一鸣惊人，为以后步入社会上层，参加山西李冠洋为阎锡山组织的“中社”，成为绥远“于派”的创建者奠定基础。

再说张作霖见状，十分震怒，即于阴历二月下旬，派他的健将汲金纯接替郭希鹏为绥远都统，授意借故铲除刘会文，以防生

变。汲金纯曾任热河都统，在奉军中以青年有为，精明干练著称。他到任后，亲去造访刘会文，看望陈玉甲，说了许多鼓励的话，根本不提武川之事。又去拜会满泰，虚心征求治绥意见，满泰以“要想坐稳绥远都统，必须重用刘会文”为对。这种藏而不露，意在言外的话，汲金纯当然能够理解。但也表示请满泰多给帮忙，以匡不逮。满泰以“自己老朽，无大作为，不过还能作到听从都统指挥”等语回复。

汲金纯以上媚下的行动，也曾引起刘会文幕僚们的敏感，都再次建议刘会文处决马骥。陈志仁说得尤其恳切：“马骥对你有救命之恩，但将来华棺彩礼，金顶玉葬殓埋他，既报私义，又肃军纪，岂不是两全其美！”刘会文听了后矍然道：“说得对，明天将他扣捕。”因会议是在刘的卧室里开的，陈等辞退后，刘妻王氏进言道：“众人都嫌马骥不好，过去救你命的不是马骥吗？他们都叫你杀马骥，将来你如再遇难，他们这些念书人都跑了，马骥已杀了，谁肯救你？人总该有良心，怎能忘恩负义，不顾将来呢？”

隔日，众人不见下令扣马骥，又去促刘会文。刘作色道：“马骥是虎将，过去和将来都少不了他，未可轻易处决。”大家只好谋其次。沉默许久，众人献计道：“如不杀马骥，就嗾使他率部哗变，师长以剿抚为名，带卫队离开归绥，纵然调令开会，也派别人代理，以防不测。师部的事由我们这些人看家，以待大局变化。”（指国民党正在进行的北伐战争）。刘会文又重复他那句“立起一只鞋卜子，他们也得吓一跳”。显然，他把汲金纯也看成是郭希鹏了，而不考虑张作霖是为了铲除他才派汲金纯来的。

与此同时，汲金纯也在暗地作试探性工作。他召见满泰，在交谈中婉转地问到兵力问题：“如果绥远有队伍叛变，你的部队能不能对付了？”满泰说：“我有两挺俄国水鸭子机关枪（当时

的先进自动武器），可以打他两团人。”

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阴历三月上旬某日，绥远都统府（现呼市新城鼓楼西街双石狮子院）秘书处奉都统谕，通知刘会文、陈玉甲二师长，务于明日上午八时率团长以上主官，齐到都统府开会。是日薄晓，在刘会文私邸周邻屋顶上发现枪哨林立，刘在院内操手踱步，思虑良久，刘对王氏说：“不必自扰，人家不一定要干什么呢？”遂令驾车（轿车）赴新城。马骥甫到，正好跨坐，众人在府外下车，一进府门，刘会文、刘盛五、马骥、陈玉甲四人即被预伏在两侧的武士铐捕。刘会文在旧城的公私邸署，同时抄查一空。

当晚，区别对待。留乔泉清、戴海源等在都统府打牌。次日，令乔“暂代”刘职。释乔、戴返防，并安慰戴、乔：“你们司令暂留府待几天就回去，绝无他意。”为的是稳住军心。王氏哭赴大召卦摊问卜，占得一课是“耗子入了猫口，有进无出”。陈志仁去求满泰援手，这叫“明知不是佛，事急也磕头”。满泰当着陈面，抱起小孙子吻了一口，上街洗澡去了。陈志仁碰壁而返，以递民情方式，历陈刘会文剿匪安民，造福桑梓等功绩，请求释刘，内有“数年以来，刘师长剿匪安民，歹徒敛迹，乡闾宁靖，桑梓被福，父老无不加额而颂曰：‘刘活佛’……”。怎奈绥远才子生花之笔，难回都统必杀之心，遂在“纵兵殃民，蹂躏地方”八个字的案由下，枪毙于新城西门外，死年四十三岁，距捕不及旬日。行刑前数日，汲金纯曾派他带来之白旅长乘火车到察素齐车站广场，集合刘部全体官兵点检，戴海源及马骥团连长小若解（蒙族）、聂文运（蒙族）力主将白扣捕，挟白换刘，为乔泉清所拒绝。张巨礼与乔有金兰之谊，私问其故，乔说：“侍候谁也一样。”可见乔泉清由于“暂代”二字，已想入非非了。白旅长步出车厢，见刘部应点官兵，横眉怒目，行列杂乱，不敢久留，慌忙登车而去。

刘会文为响应国民党针对张作霖正在进行的北伐战争，故而拥兵自重，待时而动；汲金纯借口“可镇事件”，将他铲除，理所当然。这是在张作霖“有党皆杀”的血腥镇压下遭到与在北京枪杀李大钊一样所不可幸免的结局。刘死后，为绥人所怀念。于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年）经萨县七十四村父老捐款，《绥远民国日报社》主编张元文书丹，为之勒石树碑，以旌其功。《绥远通志稿》有如此记载：“案武川惨案发生，师长刘会文亦以统属无状，褫职讯办，后竟与马骥同抵法。会文自民国十二年成立警备队以来，训练士兵极严，剿匪多著功绩，驻防各地，民皆爱戴。及改编为师，遂不无变通收匪，迁就编制之举。而卒以此被祸，惨遭暴刑，绥人皆痛惜其名绩之不终也”。（见《绥远通志稿》卷六十二）。因王屏章、侯宪章、刘巨章三人，政治背景与结局相同，故时人称为绥远在辛亥革命时期的绥西“三章”。又合称满泰、云亨、侯斌臣、李雨山、刘会文为辛亥革命时期的“萨拉齐五英雄”云。

至于卢占魁的去向，陈玉甲和刘盛五的释放，以及乔泉清、戴海源的归宿，都没有必要在此继续赘述，仅以马骥在刘会文捐躯之当日，亦被解送到武川县城镇压，作为本文的结束。

（本文根据刘会文的堂弟，现年八十七岁，当年任马骥团军需正的刘巨善老人忆述，和我在幼年时亲闻撰写而成。舛错不实之处，尚希补正。）

责任编辑 刘鸿君

# 回忆灾年当丐童

陈铁生 口述

张尔杰 整理

天灾有时是人祸造成的！人祸促成了天灾，天灾又加重了人祸！

## 天 灾 人 祸

绥远省（现内蒙古西部）自一九一四年改划为特别区以后，就成了军阀派系斗争的“城火殃鱼”之地。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阎冯大战，晋军占领了绥远，国民军败退，晋系商震取代了冯系李鸣钟成为绥远都统。国民军从察绥撤退时，被萨拉齐和达拉特旗的土匪掳走了近百十来支步枪，出现了郭秃子（郭春山）、苏八音等多股匪伙，刁抢于萨（萨拉齐县）、托（托克托县）境内。民国十六年，张作霖的奉军又把晋军赶跑，主宰了绥远，并将所有土匪，收编在“绥西镇守使”满泰的三十一军和绥西护路司令王英的三十军里边。奉系汲金纯又当上了绥远都统。由于奉军是“有党皆杀”，所以利用马骥刁抢可镇事件，枪毙了第一警备司令刘会文，逮捕了第二警备司令陈玉甲，并将两部编遣，不啻充实了土匪实力。民国十七年，晋军又将奉军撵走，李培基统治了绥远，又把满泰、王英两部，分别编遣为师或旅。由于所有编遣官兵，不作生活安置，所以，大部分官兵又干起老本行，当起土匪来。以致形成了赵半吊子（赵青山）、杨猴小（杨耀



峰) 为首的特大匪伙, 蹂躏整个绥远境内。

在此期间, 绥远人民除交纳完应征田粮外, 还一次又一次地向各派系驻兵“支差”派丁。国民军是素称纪律好的队伍, 但起码也需就地供给人吃马喂。奉军则是“妈拉巴子鳖羔操, 老子手卡盒子炮”。而李培基派出剿匪的晋军, 竟是追击时土匪遗弃财物, 撤退时官兵留给子弹, 在互通有无的默契下, 土匪越剿越多, 势且愈炽。可见时局动乱, 人心不安, 农田荒芜不少, 人们逃脱了匪灾, 避不开兵灾, 躲过兵灾, 又来了瘟灾。

民国十七年冬, 萨拉齐城外, 黄老鼠与灰老鼠成群结队, 互相嘶咬, 打了一黑夜仗。次日天明, 死下一城壕鼠尸(此事见美国新闻记者斯诺所著《西行漫记》和《绥远通志·灾异志》)。当时医疗条件不备, 也无人关心, 不懂得老鼠本身在闹鼠疫, 只视为灾异传说。结果就在萨拉齐、托县境内流行开鼠疫, 使村村不相往来, 户户不敢通问。患者先头昏, 继而吐血, 很快死亡。特别是这年雨量稀少, 农作物普遍歉收。到第二年(民国十八年)从春到夏, 滴雨未降。于是旱灾横扫而来, 饿死的人就更多了。我自己竟然是从死神嘴里挣脱出的幸存者之一。

## ， 丐 童 生 涯

我家祖居萨拉齐县城, 父亲是个毡匠, 单凭手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由于兵荒马乱, 百业萧条, 父亲住了手, 我们就住了口。就在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冬, 父亲只好将我母亲以一百二十元现洋的身价卖给当地张七斤为妻, 并在卖身契上写明把我弟弟随娘活带三年。但因年景不好, 米珠薪桂, 一年后, 张七斤即将弟弟赶出门外, 不给饭吃了。当时, 河北、山西各地坐火车到萨拉齐贩卖小孩和女人的人很多, 许多与我们同样遭遇的人家, 都把妻子儿女卖给他们, 以求一饱。我父亲也领着弟弟去

卖，但因弟弟紧抱父亲的脖颈，哭着不上火车，才把他留下来。

弟弟虽然没有卖走，但谁也不能不吃饭。当时我是十一岁，弟弟才七岁，于是我就领着他，每天在县城里挨门逐户地讨吃。为了多走一个门子，父亲就和我们分开去讨。这年正是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街头巷尾，到处是男女老少乞丐，能温饱的只有官僚、地主、士绅、商人和兵匪。中产之家，也一天比一天接近了断炊，城外的野菜根被挖绝，树皮被剥光了。因此，我讨到哪里，哪里不给。饿死的尸体，随处可见。年轻的乞丐，看到别人买了一个焙子，就从背后扑上去抢到手里，赶紧在焙子上唾口水，边吃边跑；我和弟弟年纪小不敢抢，只靠乞讨。我终于饿倒在当街。

当时，城镇有专门清理“尸体”的车，一见人饿倒，不管是否绝气，就拉出东门外，扔进大坑里。在他们正要拉我上车时，可巧我父亲来了。他见一伙人围着看什么，也凑上去看，这才发现是自己的儿子，便把我背起来，给我买了两个焙子。我吃完后也慢慢硬了起来。但那是各奔逃生的灾年，父亲是没办法经常照顾我们的。

再说我领着弟弟到处讨饭，因他年幼，我就在每进一所院子前，教给他叫“爷爷、奶奶、叔叔、大爷、婶子大娘们，可怜可怜吧，把你们的剩饭给上一点吧，救救命吧！”可是从早到晚也讨不到一口吃的，弟兄俩就只好蹒跚到“善人堂”求乞两碗糠炒面。吃的时间长了，弟弟大便干燥，屙不下来，他跟在后面哭喊，我只好向他哭一哭、劝一劝，然后让他蹲下来，替他从肛门里掏一掏。一天，我又遇见了父亲，把弟弟的情况告诉给他，他背上弟弟送到耶稣堂。因弟弟年龄较大，耶稣堂起初还不要，后经父亲再三恳求，瑞典牧师鄂必格才把他按婴儿收养起来。从此，弟弟改姓为鄂。骨肉分离，手足失散，我独自一人经历着丐童生涯。

夏天的夜里，我住不起一宿要付五文铜制钱的“讨吃店”，就在天大的房子，地大的炕上，躺在铺檐下，头枕破砖，脚蹬墙角，辗转入睡。吃惯饿尸的野狗，在我身边游来转去，闻闻看看，见我还没死，它失望地又走了。狗，这种东西是最讨厌的，特别是看家狗，死见不得穷人，每当我进院讨要时，总是狂吠不已。还有那耶稣堂的钟声，扩散出报丧似的声音，硬往耳朵里送，不想听也不行。悬在高空的星月，也好似挤眉弄眼，讪笑我饿肚子。多么冷酷、自私、黑暗的社会啊！

秋天的日子里，我除了到“善人堂”求乞一碗糠炒面充饥外，还能拣到一些水果把子和西瓜皮来“改善生活”。夜间就蜷缩在露天铁匠炉收工后的炉台上睡觉。蜂窝似的破棉衣，没有一处不透风。秋风瑟瑟，街心寂寂，越发显得黑夜漫长了！

初冬之际，十月天寒，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我，竟然绝路逢生了！国民党萨拉齐县党部，在城里的奶奶庙设立了赈粥厂，凡是揭不开锅的鳏寡孤独及贫民乞丐，每天下午可到厂里领吃一大碗小米稀粥，而县委马建功（注）就是亲手放饭者之一。至于赈粥的小米，并非当地政府或国家拨给的，而是黑龙江省安达县杜家私人的粮。杜家的主事人名叫杜延年，他是北平万国道德总会的理事长，也是安达县的大地主。他家以慈善为怀，是一家“为富好仁焉”的人家。除绥远而外，还赈过河南及苏联，此是后话。

腊月中旬，父亲病倒在“讨吃店”，由我领粥要饭服侍，少铺没盖，饿病交加，又付不起店钱，愁得我哭哭啼啼。除夕之夜，爆竹声声，催人遐想，我抱了一番孝心，趁“接神”之际走出“讨吃店”，打算给父亲要几个饺子吃。进了一家四合大院里，哀告了好久，一个中年妇女给我拿出十来个核桃大的冻山药，我用烂袄襟包起来带到大门外扔掉，流着眼泪回到“讨吃店”，并将经过告诉给父亲。父亲的病越来越严重，就在正月十六日上午我出去讨饭时，他与世长辞了，经两位“叫花子”朋友

把他草埋在北门外的乱坟滩里。

民国十八年三月，萨拉齐地方绅士徐子文，给“世界红十字会”和“万国道德会”办理灾童收养事宜，灾童们纷纷都去报名，他们有的把双脚指头冻掉，有的把耳朵冻坏，我高兴地也报了名。四月间把我们送到归绥市牛桥街收入所，住了四十多天。大部分的孤儿赤身露体，我全身只穿着一件烂背心，不少灾童有病不能及时治疗，死了好些人。五月中旬，把我们一百五十多名灾童用专车送到北平。十三岁以上者送到天津、营口等地到工厂当学徒；十三岁以下者暂留北平东四三条胡同十二号“万国道德总会”，每人发给新衣及被褥毯子。四十天后转到黑龙江省安达县喇嘛甸子，在杜延年设立的正本小学校读书，我开始“又一村”了。

## 触目惊心

我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了。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早已退休，并被聘请为旗政协委员，我的儿女除五小子外，都已成家立业，独立生活了，可以说我是心情舒畅、幸福晚年啦！但是，当我散步在街头小巷时，就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好端端的馒头块儿，烙饼片儿，油条圪截，孩子们吃不完就扔在地上，多么触目惊心的造孽啊！说它是小事，也不算大，说它是大事吧，也未免夸张，不过勤俭持家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呐！

当然，我所经历的灾年丐童惨剧，在我国现实生活中，肯定不会重演，即便一时失误，有党和政府的关怀，也不至于落到民国十七八年那样，可是孩子们信手扔掉他们吃的剩余食物，我想孩子们是没有责任的。

这事有时与老同志们谈起，听说呼包二市也有类似现象。这固然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粮食问题，已经奇迹般的得到解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们不把粮食当成“宝”的浪费行为。所以我再重复一次说：“孩子们是没有责任的。”这就是我忆述灾年当丐童的起因、动机和居心用意所在。

（责任编辑 赵国恩）

（本文口述者系土左旗政协委员，把什学区离休教师。）

---

（注）马建功土左旗善岱村人，曾在北京师范大学英文系肄业半年，任国民党沙拉齐县党部委员时，主持过赈灾事宜。解放初土改时被捕。无罪释放。城镇农会的两位负责人请他在饭馆吃饭时说：“民国十七年是你把我们两位救活的。”别时每人赠送他十个烙子，并嘱咐他好好劳动。可见不论什么人，只要对人民有过好处，党和人民就不会忘了他。

# 解放前的毕克齐商业概况

宿耀武

(1932—1945)

一九三二年五月，我由山西来到毕克齐。刚刚落脚，正赶阴历四月初八奶奶庙会，小镇里人群熙攘热闹非凡，街道上铺店敞开市场繁荣，买卖兴隆，农工商发达。当时毕克齐有八大行业，形成了以大商号为主的商业贸易网络，主导毕克齐镇的经济。这八大行是：钱当、粮食、米面、油酒、山货、百货、肉业、茶饭馆。八大行属商务会所管。

钱当：最初是天合店的一家姓许的当掌柜，后来逐渐消失另姓取代，资金不多，以小件典当赚取利润。

粮食、米面、油酒缸坊叫“六成行”、如庆德泉、万和兴（掌柜孙存贵）、双全长、庆记粮站、天合店（掌柜常仁德）。

山货：德聚成（李发）、万义勇（周义）、

百货：较大的主要有刘怀，其次有：永泰祥（曹喜贵）、鸿号（傅子珍）、双合兴（孙凤山）、清云堂（宿富元）。

肉业：万得亨（庞连升）亨丰岁（常铁旦）。

茶吃馆：兴和元（张明义）、兴美元（贾玉林）。

当时货币流通以银元为基础，有当地商出的纸币，票面分百、吊、十吊，四百兑换银元一枚，交叉流通的有绥远、平市官银局、交通银行、中国银行。零钱以铜元四个为一分，四百个为一元。

工农产品价格低廉，最好白洋布每尺七分，白土布每匹一元

上下（行唐、平山白土布，劳动人可穿三年），面粉每斤二分五，莜面每斤二分，小米每斤一分五，绥远产五塔面粉每袋（40斤）壹元贰角，菜籽油、胡麻油每斤壹角五分，白酒每斤一角二分，牛羊肉一角上下，猪肉一角四分。商业职工工资每年最高六十元，最低八元，农业零工日工资一角二分，木工日工资二角五分，瓦工三角。这种情况基本维持到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上半年。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七·七”事变后，社会逐步动乱，纸币下跌物价上涨，人民生活下降，政局越来越不稳定。十月初，日军进了毕克齐，他们横行地方，蹂躏百姓、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生命财产毫无保障。经受了日本人的第一、二、三次强化侵略，衣、食、住、行一天比一天紧张。尤其是商业，再加上汉奸、特务压榨，实难维持营业。一年下来做不了多少买卖，营业额不过几千元，每月五六百，一天卖十元八元就不错了。那时所获利润很低，如卖水烟（河南）、纸烟（山西）、砖茶（汉口）等根本获不上几个利。

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一年期间，我作为“清云堂”商号的商界人物，接受了给大青山游击队当采买的任务，最初和大青山区小队联系，是通过什报气冀来燕介绍，他后来是和大青山游击队的区小队李区长联系。所采买的物资到白天就提供给“防共二师”，因为游击队和韩伍有联系，当时把守城门的就有韩伍的人。

我主要是给采买办公用纸、笔、蜡纸、手电筒、电池、冰糖、白糖、蓝洋布、蓝土布。每次弄布十匹、八匹，鞋的数量比较大，一弄就是三十双五十双，百二八十双。这些鞋是直接在北京通县定做，这种鞋叫帆布洒鞋，也就是“牛鼻子鞋”。电池、电筒也要买上海、广州的产品，如电池要“三枪牌”，电筒要“大无畏”这些名牌。在当时，采买这些物品是要没收的，如有一次在呼市出西口子被查住了，没收了五十多个电筒。41年以

后，人家就不卖了。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后，大青山的游击队到了毕克齐后，我被选为毕克齐商务会主要一员，负责搞商业支前工作。

责任编辑：王永常

宿耀武：土左旗政协委员 毕克齐供销社退休职工。



# 政协土左旗《文史资料》

## 编辑方案

### （摘要）

《文史资料》是搜集和刊出一个地区的史料荟萃集。是历史行程、人物活动交织起来的第一手素材。同时也是综合社会进展的可信记录。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史资料又肩负着新的使命——“教育人民，惠及后代”；为史学科研服务，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因此，势必形成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做好本项工作，切需遵循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贯彻。

## 一、认真做到一个“认识”， 两项“坚持”

### 1、认识文史资料的意义和作用

意义：具有深远的现实和历史意义；众所周知，现实是历史的继续。文史资料却是这一继续的纪实。也就是“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传之后代”的宝贵遗产。其目的在于“教育人民”。

作用：对老年人，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进一步提高撰写文史资料的水平。从而发挥其自觉性和积极性，为四化服务。对青年人，通过文史资料的学习，启迪他们热爱社会主义社会，献身祖国建设并向往共产主义的美好未来。藉以达到“惠及后代”的

目的。尤为主要的是：对史学研究、文明建设以及爱国主义等方面，提供可靠的依据，也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 2、坚持文史资料的爱国主义和实事求是

(一) 坚持爱国主义：其所以必须坚持，它是编辑文史资料的正确方向。具体一点讲是符合新时期，新形势的现实要求。偏离了这个方向就会谬之千里，不符合这个具体要求就会失去历史前进的动力。从而对促进四化，实现祖国统一也就无从谈起。

(二) 坚持实事求是：是编辑文史资料的根本原则。是研究现代历史的科学态度。也就是“只有忠于实事，才能忠于真理”的具体表现。不忠于这条根本原则，就会贻害万代；放弃了科学的求真态度，严格地讲，就是一种犯罪行为。从而秉笔直书，惠及子孙，实质上就是一句空话。为此，切实做到：不因政治的需要而以假乱真；不因个人的好恶而混淆是非。

## 二、编辑《文史资料》的具体程序

1、集：广征博采，抢救遗产。这是文史资料工作的基础，也是征集资料的重点。

2、选：存真求实，重在“三亲”。这是关键。

3、核：严格审定，加强核实，疑难大题，会议讨论，做到对历史和人民负责。杜绝谬种，贻误后人，这是生命。

4、编：基本做到系统化、专题化、时期化、以供史家研究。

5、刊：在“三亲”的基础上，做到三自——自编、自印、自发行。（即内部发行）

与此同时，相对做好下面几项工作：（一）有的放矢。了解撰稿人的资料占有情况，走访到户，选题到人，消除余悸，秉笔

直书；（二）贯彻“三不主义”，做到畅所欲言，藉以激发其爱国主义的热情，促进其精神文明的建设；（三）选择重点人物和重大事件的史料，及时抢救，做到边集、边核、边刊，以免贻误时机；（四）把好“三关”：史料关——真实；文字关——准确；政治关——不出原则性的错误。

### 三、认真贯彻两个特点

内蒙古自治区是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占多数和满、回、藏以及其它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地处边疆、广袤无垠，具有明显的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土左旗恰是这个特点的缩影。

#### 1、地区特点

背负青山，面临黄河，中亘一漫平川。河道纵横，草木茂盛。它经历了漫长的岁月，留下了各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值得探索的烙印，特别是走过由牧转农的艰辛历程，等待着人们去发掘和研究。

金长城、清界石、拂云堆、喇嘛洞和黑牛沟、红山口、白道梁等，由上到下装点着大青山脉；蒙藏板申，汉、回蒙村，什么“昭君墓”、“公主坟”、七个“打尔架”、八个“塔尔号”，还有“七十二个绵绵召”等，从东到西布满在土默川上。

山间壁画，地下文物，姑且不论，就在地上秦汉古城，唐宋废墟、辽金塔碑、元明建筑，以及满洲城、民国堡和什么洋教堂、“四十顷地”高山平原比比皆是。都需要人们深研细考。这些丰富的遗产正是文史资料搜集的荟萃，“惠及后代”的瑰宝，史家的必需。

#### 2、民族特点

百年来就在这块美丽而富饶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地上，遍集着晚清、军阀、国民党等政权的罪恶。

生活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各族人民备受着三座大山的残酷压迫，他们同患难、共命运一代一代地谱写着各自的血汗史，于是反映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一系列问题上，概括起来讲：落后；思想、认识上复杂。然而这些落后和复杂，恰是寻求进步，创建文明的开端。突出地表现在各族人民的实践上，就是寡妇多、“上匪多”、土地争讼多、疑难问题多，从而老革命也多。这就是雄辩的客观史实和铁证。也是所以强调两个特点的中心所在。一句话：文史资料工作的荟萃势在必行。

##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名单

(附件之一)

主任：郑守恪

副主任：刘玉、万青林。

委员：殷石麟、康济民、白祯、胡志英、陈铁生、王秉义  
张尔杰、张希孟、云庆庆。

# 政协土默特左旗 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征集资料参考题目录

## 政 治

- 1、清廷边政概述。
- 2、戊戌变法对绥远地区的影响（重点叙述土默特地区的影响）。
- 3、绥远安定将军对满民的措施。
- 4、贻谷统治下的土默特旗。
- 5、“义和团”在土默特旗的活动及其影响。
- 6、辛亥革命期间同盟会在土默特旗境内的活动。
- 7、土默特旗境内的辛亥革命事迹略记。
- 8、安祥在万家沟的起义始末。
- 9、辛亥革命后土默特旗的政治及其变化。
- 10、民初“土默特特别旗”的由来。
- 11、略述土默特旗的蒙汉分治。
- 12、试溯“都统衙门”、“总管衙门”和“土默特特别旗”的沿革。
- 13、哲布尊丹巴的“独立运动”与土默特旗的联络和参与。

- 14、“五四”时期绥远蒙汉青年的爱国反帝运动的纪实。
- 15、马福祥主政绥远略说。
- 16、李鸣钟主政绥远略说。
- 17、汲金纯主政绥远略说。
- 18、商震主政绥远略说。
- 19、李培基主政绥远略说。
- 20、张绍曾主政绥远略说。
- 21、满泰代都统时的政績。
- 22、陈玉甲的蒙务事略。
- 23、吉鸿昌在绥远的活动。
- 24、黄绍竑在绥远的活动。
- 25、潘秀仁在绥远的活动。
- 26、张遐民在绥远的活动。
- 27、土默特旗的建政及其机构（包括历史建政之沿革）。
- 28、十二参领和土默特。
- 29、道、厅、巡检衙门与都统衙门兼述。
- 30、从满泰到荣祥任土默特旗总管说起。
- 31、亢仁、森额两总管简介。
- 32、说说土默特总管衙门的“班房子”。
- 33、土默特旗派往南京政府参加“内蒙古自治运动”代表被骗记（荣祥任总管期内）。兼述十二条的桃僵李代。
- 34、土默特旗“国大代表”选举经过（1947年）。
- 35、“绥境蒙政会”
- 36、土默特旗宣慰使署。
- 37、“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内幕。
- 38、“蒙古青年励志社”在土默特的活动。
- 39、“西蒙自治运动”始末。
- 40、杀害蒙政会代表——贺耆寿的内幕（1942年？）。

- 4 1、首席参领都格尔扎布的政绩（荣祥老先生之父）。
- 4 2、旗县合并经过。
- 4 3、绥远“九一九”起义土默特旗的参与者。
- 4 4、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土默特旗的爱国活动。
- 4 5、召河和土默特旗的政治历史关系（从戊戌以来到解放初期）。
- 4 6、土默特大事年表（1898—1966年）。
- 4 7、国民党时期土默特旗的“督导处”。
- 4 8、土默特旗蒙汉人民反屯垦运动纪实。
- 4 9、土默特旗派参领和玉禄的谈判（武川县）。
- 5 0、孤魂滩事件始末记。
- 5 1、土默特旗镇国公及其后代拾遗。

## 军 警

- 1、戊戌变法前后土默特旗境内的军事形势记略。
- 2、北洋军阀在绥远地区的混战。
- 3、北洋军阀派在土默特旗的历任都统大事记要。
- 4、刀什尔战役详析。
- 5、奉军进驻绥远纪实。
- 6、阎锡山解除土默特旗常备兵武装的内涵。
- 7、土默特旗兵备沿革纪实（清末到解放前夕）。
- 8、“老一团”建军始末。
- 9、保商团建军始末。
- 1 0、清末民初在土默特地区所建立的“陆军小学”考。
- 1 1、“老一团”活动范围的概述。
- 1 2、“老一团”在蒙古人民共和国。  
“老一团”在四子王旗驻军前后。

- 1 3、 “保商团”和银海喇嘛。
- 1 4、 玉禄之死。
- 1 5、 王禄墓葬碑文考。
- 1 6、 云继先率土籍“百灵庙保安队”暴动经过。
- 1 7、 蒙旗保安队——白海风部归绥抗日片断。
- 1 8、 伪蒙疆军官学校。
- 1 9、 德王府幼年学校。
- 2 0、 傅作义部围缴蒙古军军官学校纪实（1 9 4 5—4 6 年之间?）
- 2 1、 云继先部兵变叛归百灵庙前后纪要。
- 2 2、 云继先之死。
- 2 3、 章文锦之死和云继先部兵变的前因后果。
- 2 4、 蒙古军官学校学生在狱中亲临记（1 9 4 5 年）。
- 2 5、 耿三魁（又名耿殿章）部游击队在古路板村殉难记（1945年）
- 2 6、 驻晋业详伪警察部队中的土默特旗人。
- 2 7、 卜子嘉部（警）中的共产党人。
- 2 8、 伪“防共二师”和“大青山游击队”的关系。
- 2 9、 韩伍部被歼记。
- 3 0、 伪蒙古军中的土默特旗人。
- 3 1、 大青山区纯蒙村舍对革命的贡献（重点在军警方面）。
- 3 2、 山老区人民对革命的贡献（重点在军警方面）。
- 3 3、 国民党新三师内的共产党人。
- 3 4、 从二十年代——四十年代蒙古青年散记。
- 3 5、 巴音巴图（咀尔沟人）司令员的游击队（1 9 4 5 年?）。
- 3 6、 李存义游击队在呼市东郊的活动见闻（1 9 4 5 年?）。
- 3 7、 荣继珍率蒙古军起义（或投诚）  
点滴：（备忘：以毕力格巴图尔的活动为主）
- 3 8、 王秉义部的起义及其在绥南活动的亲临记。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土默特文史资料第一辑

作者 =

页数 = 190

SS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